

文

博

信

息

采集自互联网的最新资讯

www.beijingmuseum.org.cn

首博网站



2004 3

总第18辑

首都博物馆
资料信息研究中心 编印

目 录

2004 年 第 3 辑 总 18 辑

博物馆

- 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要求加强博物馆宣传展示和社会服务工作(1)
- 冯骥才倡建民间文化博物馆(2)
- 傅庚辰委员建议设立音乐博物馆(3)
- 国家博物馆明年开工 改扩建工程规划需做调整(3)
- 尽快建立国家摄影博物馆(4)
- 靳尚谊委员建议: 故宫藏画“移居”国家博物馆(4)
- 首家国内首家蜂胶博物馆落户顺义(4)
- 中国首届博物馆博览会将办(5)
- 博物馆免费开放, 谁来埋单(5)
- 广东启动“博物馆网络” 30 多家博物馆联合办展(6)
- 贵州筹建喀斯特地质博物馆 黄果树瀑布群为中心(6)
- 名枪亮相公安博物馆 规格最全珍贵程度最高(7)
- 青海博物馆馆藏书画开展展(7)
- 山海关长城博物馆扩建启动(7)
- 全国最大简牍文化中心将在长沙建成(8)
- 中国首家微雕博物馆在杭州萧山开馆(8)
- 阿根廷垃圾工人的“战利品”成为博物馆精品(9)
- 埃及请求英国归还珍宝 希腊同类请求遭拒绝(10)
- 国际乒联博物馆(10)
- 意大利为旅游巨资改建博物馆(11)
- 印度首都新德里西南部建立了一家厕所博物馆(11)
- 英国国立博物馆的免费参观政策(12)
- 足球天堂及足球博物馆(12)

考古与文物

- 北京长城百年大修开工 国庆前竣工并开放(14)
- 北京密云县古北口发现明代精美彩绘壁画(14)
- 北京通州马驹桥发现 43 座汉唐墓葬群(14)

北京亦庄挖出大型汉墓 精美随葬品十分罕见(16)
国家文物局：不达标单位不得保存三级以上文物(16)
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在京考察南水北调工程文物保护工作(16)
加强名人故居宣传 促进北京历史遗迹保护(17)
政协委员呼吁救救流失海外文物(17)
千年云居寺拟申报世遗(18)
“龙山文化”、“宋代墓葬”同现山东(19)
阿炳故居修复方案已确立(19)
百色出土旧石器时代手斧 东方文明不逊西方(20)
布达拉宫九成文物有了“个人档案”(20)
千年文物遭殃 江西修水黄庭坚文物在呻吟(20)
费用高达 20 多个亿 平遥古城搬迁陷入困境(21)
佛冈惊现晋代古墓——距今千年(22)
甘肃 10 余万珍贵文物建立电子档案(22)
南京今年投入 7000 万元整修 17 公里明城墙太平天国壁画也将集中展示(22)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库区新发现大批明清砖木建筑(23)
宁夏西夏王陵三号陵文物修复面世(23)
抢救民族文化遗产 蒙古文《大藏经》将脱尘重光(23)
清朝名将丁汝昌故居祠堂残破大量文物流失(24)
三星堆证明中国是犹太人后裔？(24)
三峡考古揭出一跨越五千年的完整“文化积层”(25)
三峡首现唐卜甲将古代甲骨占卜史延后数百年(26)
山东齐国古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26)
山西省文物保护全面推进“四有”工作(26)
山西首次发现一处大规模陶窑遗址(27)
山西闻喜发现 6 座金元时期砖雕墓葬(27)
山西武乡发现距今 4000 多年的龙山文化遗址(27)
陕西岐山出土周人甲骨文 专家京城研讨其价值(28)
四川发现我国年代最早的汉代摩崖石刻(28)
新疆搜救出 9000 多件民族古籍(29)
重庆发掘三峡库区“墓葬王” 所葬何人仍未知(29)
郴州西晋简牍是宝贵遗产(29)
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大突破：陶寺城址考古(30)

历史研究

“地方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征文(36)
近代史所召开关于“中国知青与口述历史”学术报告会(37)
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37)
首先应当对“规范”加以规范(38)
儒生与关羽崇拜(40)

中国史学家考证平定“安史之乱”的首次大捷(40)

文化资讯

“中国文物保护标志征集大赛”日前启动(42)
城市地理：北京古建中隐藏着多少“秘密”？(42)
读北京文化建设的“不求所有 但求所用”(44)
国家大剧院等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45)
建设部要求各地五月底前完成世界遗产监察报告(45)
龙新民：文化产业要成首都新经济支柱(46)
全结构式网上中国现代文学馆正式运行(46)
人文地产渐成时尚(46)
首届中国收藏界年度排行榜入围名单揭晓(47)
文化保护 立法先行(47)
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发出通知
 要求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向未成年人等社会群体开放(48)
安徽省历史文化名城得到有效保护(50)
河南信阳保护民间文化成为热门话题(50)
昆山市周庄喜获“文化遗产保护奖”(51)
南京将举办“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博览会”(52)
我国发现最古老的凤凰图案(52)
无锡开创文化事业新局面(53)
西安将举办文化产业博览会(53)
新疆木卡姆被列入民族民间文化保护试点工程(53)
研究表明千年前敦煌是国际大都市(54)
张廷皓等三十一名代表呼吁我国“世遗”保护应立法(55)
政协委员吁保护杭州话 方言普通话之争引发讨论(55)
中国传统戏曲“活化石”——秦腔亟待抢救(56)
中国复原唯一的早期真人类型化石(57)
冯骥才：中国应确立一个国家文化遗产日(57)

展览动态

中国古籍图书展览在美举行(59)
广东历代书法展览在京举行(59)
“中国京剧艺术图片展”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开幕(59)
陕西：第八届全国书法篆刻展在西安开幕(59)
《世界文化遗产在中国》图片展在里斯本开幕(60)

文博法规

关于拍摄电影、电视有关文物的暂行规定(61)

关于使用文物古迹拍摄电影、电视故事片的暂行规定(62)

关于拍摄文物的几项暂行规定(63)

首博动态

首都博物馆 2004 年 3 月动态(64)

欢迎进入首都博物馆网站浏览

<http://www.beijingmuseum.org.cn>

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要求 加强博物馆宣传展示和社会服务工作

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部、文化厅（局）、文物局（文管会）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博物馆宣传展示和社会服务工作的通知》。

通知说，为进一步发挥博物馆宣传展示和社会服务功能，更好地保护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和自然遗产，增进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亲融和谐，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博物馆作为保护、展示历史文化遗产和人类环境物证的文化教育机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宣传其文明成就和发展水平的重要窗口。新时期博物馆建设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坚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原则，紧紧把握时代脉搏，充分体现博物馆文化的先进性、科学性与群众性，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将文物藏品这一凝聚着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载体，转化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激励广大人民群众振奋精神，团结进取，投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

二、陈列展览是博物馆直接面向社会与公众的阵地和窗口，是进行宣传展示的重要手段。要认真总结、借鉴1997年国家文物局实施精品工程以来各地涌现出的优秀陈列展览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反映时代精神，强化精品意识，不断提高陈列展览的水平。要按照“三贴近”的要求，对已经举办和拟推出的陈列展览进行效益评估，提出改进意见和措施。举办陈列展览要加强预见性和计划性，从社会发展和群众实际需要出发，研究制订陈列展览中长期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在创意、设计、制作和宣传推广等各个环节上，引进新理念，尝试新模式，运用新技术，做到导向正确、主题突出，手段先进、方法新颖，努力实现思想性与艺术性、科学性与观赏性、教育性与趣味性的完美结合。针对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欣赏品位和文化需求，当前陈列展览尤其要注重科学性和艺术性，深入挖掘文物藏品的丰富内涵，反映最新研究成果，增加文化含量，力求使陈列展览在品位、档次和水平上取得显著提高。要积极探索展示艺术和表现手法，注重高新技术和材料的合理运用，不断增强展览的吸引力、感染力。

三、加强规划和管理，为博物馆顺利开展工作提供保证。注意从自身资源优势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出发，因地制宜，对本地区的博物馆发展进行合理规划。要以加强宏观调控和依法管理为手段，以建设功能齐全、设施完善、作用明显的地区性文化保护中心为目标，着力完善现有博物馆的社会功能，重点发展各具特色的专题博物馆，改善博物馆的品类布局。新建、改建博物馆要把增加数量与提高质量结合起来，避免千馆一面和重复建设，切实扭转博物馆发展中重建筑轻功能、重硬件轻软件、重设施轻管理的不良倾向。对社会功能不健全的“挂牌馆”要提出整改措施，有计划地加以清理整顿。

四、坚持以人为本，强化服务意识，把社会和观众的需求作为博物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面对观众文化需求的不断变化和文化市场的日益丰富，博物馆要做到定位准确，树立良好形象，改进服务理念，突出自身优势，向社会提供独具特色的文化产品。积极推出丰富多彩、生动活泼、引人入胜的社会普及活动，通过新闻媒体和其他方式进行广泛宣传，实现博物馆与观众的相互认知，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要注意与人们日益增长旅游休闲需求相结合，注重营造高雅的人文环境与舒适的参观环境，以优美环境、优质展览和优良服务奉献观众。善于借鉴国内外博物馆依靠社会力量，特别是借助博物馆之友、会员和志愿者促进博物馆发展的成功做法。激励和培养公众参与意识，积极探索博物馆联系公众、服务社会的新思路和新举措。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有条件的博物馆，要对中小学生学习参观实行免费或优惠。

五、当前我国正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机遇期，博物馆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各级各类博物馆要增强社会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解放思想，转变观念，锐意创新，以改革的态度对待、分析和解决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积极探索符合形势发展，充满生机活力的博物馆新型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运作模式，努力开创博物馆建设的新局面。

六、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博物馆工作，把它作为发展先进文化的一项基础性任务，摆上应有位置。要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加大博物馆建设力度，纳入当地文物保护、文化发展和城乡建设总体规划，统筹安排。各级党委宣传部门要加强协调指导，会同有关部门定期研究工作，及时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文化、文物部门要切实负起责任，加强对博物馆工作的领导，在人员、编制、待遇等方面给予关注和支持。教育部门要结合教学活动，组织学生到博物馆参观实习。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要根据各自特点，积极支持博物馆工作，利用博物馆开展活动。

通知最后说，各地各部门要根据本通知，抓紧制订具体可行的实施办法，把组织开展工作的情况，作为考核有关领导干部、衡量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重要内容。适当时候，中央有关部门将就贯彻落实情况进行一次督查。

冯骥才倡建民间文化博物馆

来自《北京娱乐信报》消息：昨日，来自全国的100多位民间文艺工作者代表汇聚杭州，共同研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推进工作，会上宣布北京等11个省区市正式“加盟”抢救工程。中国民协主席冯骥才表示，北京有大批的学者研究队伍，抢救工程应该有质的不同，建立一座北京民间文化博物馆将是抢救工程的良好载体。

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发起和主持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于2003年正式启动。为保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摸清我国的文化家底，全国众多的民间文化工作者和专家学者加入了这一工程。目前，“抢救工程”已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刚刚结束的“两会”上，文化部确定正式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并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纳入其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在会上表示，“抢救工程”已变为一场文化行动，唤起了民众文化自觉，“不仅是对中华民族的贡献，也是对全人类的重要贡献”。

中国政协副主席、分党组书记白庚胜称，一年多来，“抢救工程”以点带面，以项目推进工作，抢救工作取得初步成效。率先启动的中国木版年画专项抢救工作已完成8个产地的前期普查、采录、编撰工作，明年将推出全部产地的抢救与保护成果。因为“抢救工程”的影响，日本民间艺术协会会长樋田直人和名古屋大学教授浅见汎拟将其收藏的千余幅木版年画和部分古雕版捐献给中国。河南省最大的房地产公司建业集团特意一次性购买朱仙镇木版年画5万幅，

并决定投入巨资对河南的古民居和古建筑进行抢救。

昨天“抢救工程”全面推进会上，首批重点实施省份进行了经验交流，并通过北京、宁夏、天津、广西、江西、福建、吉林、广东、安徽、四川、青海等11个省区市成为第二批实施省份。北京民协驻会副主席、秘书长于志海表示，将依托京城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的“智力优势”，在抢救的同时更加注重学术研究的价值。北京民协目前已在北师大刘铁梁教授等专家的支持下，制定出北京民间文化普查实施方案，并将把门头沟作为抢救试点地区。

大会还通过了全国“民间故事全书”专项工作实施方案及组织机构名单，落实了编纂计划及工作进度，对云南大理和湖北当阳的试编本进行了交流。冯骥才表示，今年将推出“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中国民俗文化普查及中国民俗志编纂”的县卷本，预计全国将有2500县每县一本；“中国民间美术图录”将推出省卷本；中国木版年画、民间剪纸两个专项的范本编纂已取得突破，将在全国推广。

中国文联副主席李牧透露，国家已投入2000万元启动“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冯骥才担任副组长并兼任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文联将进一步支持民协开展的抢救工程。

傅庚辰委员建议设立音乐博物馆

来自光明网报道：“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在辉煌的历史文化长河中也涌动着中华民族音乐的奔腾激流，从古至今产生了许多伟大的音乐家和伟大的音乐作品。我国迫切需要一个音乐博物馆，以充分发挥音乐资源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3月7日上午，在政协文艺界联组会上，傅庚辰委员走上讲台，郑重地提出了一份提案。

傅庚辰委员是军旅作曲家出身，曾任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现任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他对中国音乐史上杰出的音乐家和音乐作品如数家珍。“春秋时期的琴家师旷、师涓；汉代的李延年；魏晋时期的嵇康；隋代的万宝常；唐代的唐玄宗；宋代的姜白石；明代的魏良辅、朱载堉；汉代的乐府；唐代的大曲；宋代的词调；元代的杂剧；清代的小曲；近代的音乐家肖友梅、赵元任、刘天华、黄自、黎锦辉、华彦钧，特别是开辟了革命音乐之路、写出了《义勇军进行曲》的聂耳，写出了民族文化瑰宝《黄河大合唱》的冼星海以及他们的战友吕驥、贺绿汀、任光等。一部中国音乐史，丰富多彩、群星璀璨。”

傅庚辰认为，建立音乐博物馆，就是要给世人一个博览中国音乐史的艺术窗口，给青少年接受音乐文化教育开辟一个新天地。

傅庚辰说，现在这种空前的“音乐热”是中国音乐文化建设的大好战略机遇期，也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一支重要力量。“适应这一形势发展的要求，设立音乐博物馆正当其时，这是音乐事业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也是全体中国音乐人的心愿。”

国家博物馆明年开工 改扩建工程规划需做调整

来自中国网消息：“比邻国家博物馆除了要建一些其他的建筑外，同时，南侧还要打通一条东西走向的路，考虑到天安门广场的整体布局，所以原计划的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规划需做一点调整，本计划在今年底开工的这个项目可能要推迟到明年上半年。”国家博物馆馆长潘震宙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据潘震宙介绍，国家博物馆原计划在去年9月公开向全世界招标，2007年竣工，但从目前的进展看时间已经很紧张，估计要在明年上半年开工，竣工时间要向后推迟一些。为了加

快进度，今年2月设计招标工作已经开始，这次招标采取国际招标，目前正在回收方案。虽然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还在招标阶段，但展览陈列已经开始筹备。潘馆长介绍，时间已经很紧张，目前所缺的展品还要想办法征集。

据介绍，扩建后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建筑面积达15万平方米，其中包括15个专题展厅、4个临时展厅、5个国际交流展厅和4个捐赠品厅，还包括数字影院、典礼大厅、图书资料中心、国内外学者接待中心、地下停车场、书店、文物商店、茶座、小卖部等。

尽快建立国家摄影博物馆

2004年03月13日 13:43 新民晚报 在过去的100多年中，我国产生了一批著名的摄影家，积累了一大批摄影精品。这些摄影精品见证了波澜壮阔的中国现当代发展史，已成为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的珍贵文献。

长期以来，由于条件所限，很多珍贵的历史文献照片，没有得到有效整理、保存，有的散失，有的被国外摄影博物馆和收藏家高价收藏。建立国家摄影博物馆，可以系统地收集整理和保存100多年来为中国摄影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摄影家的珍贵作品，为中国现当代历史研究和中国艺术史研究提供翔实的图片资料；收藏和保存在中国摄影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的摄影器材，填补我国文化事业的一个空白。

近年来，老一辈摄影工作者，如吴印咸、黄翔、石少华等人都已经去世，去年侯登科、王毅等中年摄影家也因病去世。他们生前保存的珍贵资料如何处理，引起了摄影界的极大关注。有些摄影家去世之前，也一再表示希望能有一个机构妥善保存他们的作品。建立中国国家摄影博物馆应该提上具体日程，建议尽早立项、落实。

靳尚谊委员建议：故宫藏画“移居”国家博物馆

来自中新社报道：中国美协主席、中央美院院长、全国政协常委靳尚谊11日表示，在成立国家博物馆后，故宫藏画都应调拨到国家博物馆。故宫的定位应是宫廷博物馆。

“如果这批名画不调拨到国家博物馆，在故宫只能长期被馆藏。由于故宫是古建，没有条件展出，这些画平时都放在仓库里，每年十月份拿出来晒一次。而国家博物馆的各种设备一应俱全，有利于这批画的保存和展出。”

靳尚谊相信，这批画能使国家博物馆进入世界一流博物馆的行列。国家博物馆目前馆藏主要有革命文物、古代文物两类，藏品仍有限，影响力尚欠缺。他介绍，目前故宫藏画主要包括清代末代皇帝溥仪出宫时携带的一批名画，主要有唐五代以来的人物画，其价值不亚于台北“故宫”现藏的宋以来的山水画。

靳尚谊认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国家博物馆的关系，应该类似法国的凡尔赛宫和卢浮宫。前者展出宫廷建筑、用具等，后者展出国家的精华艺术品。这样才能使这两个重要的博物馆定位明确，更好地发挥影响力。

首家国内首家蜂胶博物馆落户顺义

作为我国蜂胶产业化发源地和北京蜂胶原产地的顺义，不久又将成为国内首家蜂胶博物馆所在地。记者今天获悉，中国蜂产品协会蜂胶专业委员会已与顺义三高农业示范区签订了项目入区协议，用不了多久，国内第一家蜂胶博物馆将在这里崛起。

中国是世界第一蜂胶生产大国，而顺义是中国蜂胶产业化的发源地，又是“北京蜂胶”的原产地。为弘扬蜂胶文化，丰富旅游文化市场，中国蜂产品协会蜂胶专业委员会决定，投

资 1200 万元在顺义三高示范区内筹办中国蜂胶博物馆。

新建的中国蜂胶博物馆将以实物、图片等多种形式全面展示蜂胶形成的全过程、中国蜂胶产业化发展的历程和丰硕成果，以专家讲座和游客参与等形式传播健康知识，让游客认识蜂胶、感受蜂胶，体验健康。游者还可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作为“专题健康体验者”，尝试如戒烟、糖尿病治疗等蜂疗法。

据悉，整个博物馆建设将在 2007 年底前全部完成。

中国首届博物馆博览会将办

本网消息：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中国博物馆学会、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北京市文物局联合主办、中国农业博物馆承办的首届博物馆及相关产品与技术博览会，将于 2004 年 5 月 18——21 日在中国农业博物馆举行。

自 2003 年 11 月组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后，引起各地博物馆界及相关行业的极大关注，组委会招展热线应接不暇。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 90 多家博物馆报名，其中包括国内许多知名博物馆和港澳地区的博物馆，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下属的 12 家博物馆。

本次报名参加展示新技术、新产品的企业类型涵盖了博物馆藏品保护、展览设计、软件多媒体开发、标本、模型制作、安保设备以及礼品、纪念品等博物馆各项业务范畴。除国内一些大型企业如清华工美、广州集美、上海美术设计公司等率先报名参展外，一批眼光独到的国外企业也看到了博览会的巨大商机，踊跃报名参展，如在东南亚博物馆规划设计领域享有盛名的新加坡金明国际展览设备公司、日本丹青社、韩国奇兴声展览展示公司、德国格拉斯堡展示设备公司、美国爱可声语音导览系统有限公司等。此外，港澳台地区不少公司也报名参展，以拓展内地市场，如香港东汇传播拓展公司、台湾（美商）活跃动感科技公司、澳门科技学院先皓电子有限公司等。

本届博览会设立的博物馆馆长论坛吸引了国际博物馆界专家学者的目光。预计本届博览会将有近 200 名博物馆馆长参加研讨交流，国际博物馆协会、国际博物馆协会亚太地区的高官也将获邀前来参加博物馆高峰论坛。

本届博览会不仅是博物馆界高水平的学术论坛，也是全国博物馆展示风貌、交流业务的平台，同时又是博物馆相关行业推广新技术、新产品的舞台。

博物馆免费开放，谁来埋单

为了让市民和游客更方便地了解当地的历史和人文社会面貌，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免费大餐。上海博物馆规定今后完全对中小学生免费开放，浙江博物馆也推出免费措施。

博物馆，门票收入是支柱一石激起千层浪，全国各地都对博物馆免费极大关注。在安徽省博物馆，记者了解到，每年的 5 月 18 日“世界博物馆日”，该馆实行免费开放，但是许多人并不知悉。另外，根据当地规定，博物馆对 60 岁以上老人实行免费。对于外地博物馆免费，他们感到很无奈。目前，门票收入仍是其主要的经济来源。为了吸引市民和游客，该馆也推行优惠措施，使更多的人能通过参观了解安徽。

安徽省博物馆馆藏十分丰富，现有馆藏文物 23 余万件，其中以商周青铜器、楚国货币、汉画像石、文房四宝、元代金银器、新安书画、徽州雕刻和古籍善本、徽州契约文书等最为突出；尤其是著名旅法女画家潘玉良的 4000 余件作品，为国内外所瞩目。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先后来馆视察。可是，如今该馆馆内参观者却很少，各个展馆显得比较冷清。为了增加收入，博物馆经常举办一些展览，如科普知识展、爱国主义教育等主题

展，弥补了一些经费上的不足。

免费开放，谁来“埋单”博物馆作为市民接受教育和游客参观的场所，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浙江博物馆免费开放后，春节 7 天长假接待了 7 万多人次，相当于去年大半年的客流量。中国印学博物馆、中国丝绸博物馆接待量均创下纪录。可以看出，票价仍然是阻碍公众进入博物馆的最大障碍，即使是经济发达地区也不例外。

浙江明确将博物馆列入纯公益性的文化机构，由政府全力扶持。“免费开放带来的门票收入损失，将通过省政府财政的方式予以补贴。”心有余而力不足，一些文化单位门票收入仍然是主要来源。其实，免与不免，并非问题的关键。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做好博物馆的公益与经营，如何使博物馆的公共价值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一些展览力争做到免费开放，让更多的市民参观，而引进的一些展览，如一些地方高昂成本引进的“埃及国宝展”，就要酌情收取一定费用，在安徽省博物馆，4000 幅潘玉良藏画就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目前在福建等地展览，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广东启动“博物馆网络” 30 多家博物馆联合办展

新快报讯 昨日“广东博物馆陈列展览协作交流网络”正式启动，全省 30 多家博物馆将联合起来办展，以节约展览成本。

据介绍，该“博物馆网络”是一个以广东省博物馆为中心的分级辐射展览网络系统，它将整合全省的博物馆陈列展示资源，分阶段筹备一批不同类型和规模的展览，然后在各地博物馆中巡回展出。省文化厅厅长曹淳亮表示：建立博物馆交流网络将大大提高对省内各馆历史、民族民俗、艺术品、自然标本等文物资源的使用效率，同时又能有效地节约成本，降低运营费用。

据悉，目前加入的 30 多家博物馆今后每年将制作 10 个展览在这些博物馆中进行巡展，预计覆盖人数 4000 万，其中山区县人数高达 1000 多万。

贵州筹建喀斯特地质博物馆 黄果树瀑布群为中心

新华网贵阳 3 月 22 日电贵州是一个喀斯特地貌强烈发育的省份，喀斯特面积占国土面积的 73.6% 以上，达 13 万平方公里。以行政区划比例来看，贵州堪称为“喀斯特王国”。

据介绍，喀斯特是斯洛文尼亚一处石灰岩高原的地名，那里的岩溶形态最早被欧洲地质工作者所研究，人们便将石灰岩地区所出现的地表山峰奇特、洼地和落水洞众多、地下多洞穴和地下河有大量岩溶泉出露的自然景观称为“喀斯特地貌”。

贵州全省有喀斯特分布的县、市多达 83 个，占全省县市总数的 95%。贵州作为“喀斯特王国”，拥有喀斯特所有的地面地下形态。这里峰耸岭峻，岩峭石美；这里洞藏山河，鬼斧神工；这里瀑布千姿，柔情缱绻；这里林呈万态，四季盎然……集奇山险洞丽水美林为一体，气象万千，美不胜收，被誉为“世界喀斯特地貌精品”。

建设部风景名胜专家委员会委员宋林华介绍，贵州最具特色的锥状喀斯特景观堪称全球第一，这里的锥状喀斯特是全球发育演化过程最完整、保存相关遗迹最丰富、锥状喀斯特集中连片分布面积最大、地貌景观最典型的景观，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和美学价值。而拥有黄果树和龙宫两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安顺市，就是这一地貌的典型代表之一。

安顺市正计划筹建以黄果树瀑布群为中心的喀斯特地质博物馆，并拟开辟喀斯特科普考察体验旅游项目。

名枪亮相公安博物馆 规格最全珍贵程度最高

日前，上海市公安博物馆首次正式展出了来自 17 个国家的 200 余款各式枪支。这些枪原来散落在其它展馆和枪库中，经该馆一年时间的收集和整理，形成此次展览。

此次展出的各类枪支，规格之全，珍贵程度之高，堪称世界之最。其中既有各个时代的代表枪支，还有各种著名品牌、型号和伪装成普通用品的枪支。特别是一把由孙中山先生使用过的勃郎宁手枪，被视为镇馆之宝。此外，旧上海滩风云人物——青帮头目杜月笙、流氓头子黄金荣使用过的水果刀手枪、三寸金枪也在展品之中。

上海市公安博物馆馆长汪志刚介绍，目前，我国只有北京和上海两个公安专业类博物馆；而在世界范围内的公安、警察博物馆中，上海市公安博物馆都可算是规模较大、藏品较多的一家。

为满足观众需要，上海市公安博物馆从去年开始筹备世界名枪展。博物馆工作人员一方面将散落在各个展馆中的枪械重新排列组合，同时在全市各枪库中寻找年代久远的各色名枪。至办展前夕，上海市公安博物馆总共找到了 238 款有确切资料的枪支。

汪馆长介绍，其实，此次展出的这些枪支仅仅是上海众多枪库藏品中的极小部分。由于上海枪库的专业化程度极高，枪库中恒温恒湿，所有不使用的枪支都用粘度很高的枪油封住，所以多年来没有发生过枪库内枪支生锈的情况。这给展品的质量提供了坚实的保证。

另一方面，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上海就对枪库建立起了严密的防盗和管理系统，所有枪支都登记在册，通过电脑就可以查出枪的来源、以前是何人拥有、现在为何人使用。所以从未发生过失窃事件。

此次展出的一些枪支，无论是其自身蕴涵的历史背景，还是使用者的特殊身份，以及其所代表的高超枪支制造工艺，都大有说头。

此次展出的枪械，大致是三个来源。一是 1949 年上海解放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国民党警察局枪支陈列馆中接管过来的各种枪械；二是进入和平时期后，南下的干部上缴的枪支；三是一些特殊的上海市民向有关部门上缴的枪支。此外，还有一些枪支是从土匪、帮会中收缴的。

如果按国籍划分，展出枪械有美、英、德、比、俄等十几个国家的。如果按种类划分，有各式手枪、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还有执行特种任务使用的无声手枪、曲射枪、小刀枪、钢笔枪、毒弹枪、手杖枪、钩枪、瓦斯枪等。如此丰富的展品，非常罕见。

青海博物馆馆藏书画开展展

来自央视国际消息：青海省博物馆日前敞开馆门，展出了大量珍贵馆藏书画。

这次展出的 110 幅馆藏书画有许多艺术大师的抗鼎之作，如张大千的《仕女图》、谢文枬的《人物图》以及方大猷的《四条屏》等。这些藏品大部分是在 1986 年青海省博物馆建馆时，从全国书法、国画艺术家手中征集来的。当时博物馆一共收到了 400 多幅作品，但由于受经济条件和馆舍条件限制，这些作品中只有 80 多幅曾与观众见过面，其他作品一直深藏于库中。

山海关长城博物馆扩建启动

据新京报报道，我国三大长城主题博物馆之一的山海关长城博物馆扩建改陈项目日前在素有“天然长城博物馆”之称的河北山海关正式启动，沉寂地下 300 多年、新近出土的长城防御火器“红衣大将军”铁炮已入馆存放。

山海关长城博物馆是我国第一个以长城为主题的博物馆，与八达岭长城博物馆、嘉峪关

长城博物馆并称为我国三大长城主题博物馆。该馆 1991 年建于“天下第一关”城楼南侧 200 米处，建馆 10 多年来，其“中国长城暨山海关长城”的陈列主题集中展示了“上下两千年，纵横十万里”的长城历史渊源、形式构造、人文风物和军事烽烟，突出展现了万里长城精华地段--山海关长城博大丰富的内涵及珍贵的历史遗存。

山海关博物馆扩改工程预计总投资 3000 多万元。从现在起到 2006 年，基本建设和改陈布展两期建设将逐步展开。扩改后的山海关长城博物馆的陈列面积将由现在的 1200 平方米扩大为 7600 平方米，分为“长城印象”、“长城纵横”、“长城沧桑”、“长城体味”4 个单元和“长城军事厅”、“长城文化厅”、等 9 个展厅。将继续突出长城陈列主题，通过山海关长城的独特风貌和山海关历史的重大事件，采用静态、动态的历史文物、图文资料以及现代声光电的表现手法，充分展示万里长城的古老与辉煌。同时，新设“长城历史感受苑”，通过动手演练或制作与长城有关的参与性内容，增加中外参观者特别是青少年对长城文化的体验。

扩改后的山海关长城博物馆将成为我国规模较大、馆藏内容较为丰富、展示手段较为完备、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高水平长城专题博物馆。今年，将陆续完成扩建展厅、基础设施配套及部分展厅的改陈。目前，文物征集工作已在全国范围内展开。3 月 8 日，一尊沉寂地下 300 多年的长城防御火器“红衣大将军”铁炮在山海关老龙头北侧出土，现已存放该馆。

全国最大简牍文化中心将在长沙建成

3 月 15 日讯记者今天从长沙市简牍博物馆获悉，国家文物局和财政部最新追加投入 700 万元对长沙吴简进行清理保护，与此同时，主体建筑已经完成的简牍博物馆正在积极筹备前坪拆迁绿化和陈列布置工作。一个全国最大、功能立体化的简牍文化中心呼之欲出。

1996 年 10 月在长沙市中心的走马楼平和堂建设工地中发掘出来的三国时期孙吴纪年 简牍，包括竹简、木牍等，共计 16 万余枚，超过中国历年出土简牍数量的总和，成为考古历史上的盛举。为了让这批数量空前的文物充分发挥其文化功能，长沙市和国家、省主管部门联手启动了一个以简牍为中心的文化工程。

一方面政府投入巨资对这批数量巨大的简牍进行清洗、释读、整理。据简牍博物馆馆长宋少华介绍，前期已经投入 200 多万元，主要用于清洗保护，“自 1996 年简牍出土以来，我们洗了 7 年的泥巴，下一步主要着手整理出版，我们组织了世界范围的专家队伍从事整理、释读工作，准备将简文出版 15 卷，每卷分上中下册”。

另一方面，长沙市和国家文物局共同投资建立全国唯一的简牍博物馆，业已投资 6600 万元完成了主体工程的建设。简牍博物馆刘书记透露，馆设陈列都将按照国际一流博物馆标准建造，长沙市已经作出了后期投资预算，陈列布置还需 1000 多万元，前坪的拆迁绿化需要 5000 多万元，这样总投资将超过一个亿，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建成后的简牍博物馆将集吴简的保护、研究、展览于一体，可以充分向世人展示我们祖先创造的辉煌文明。

据悉，长沙简牍博物馆将于今年 10 月首次开放。

中国首家微雕博物馆在杭州萧山开馆

来自文汇报的消息：一块邮票大小的象牙，刻上了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国旗，一支普通的钢笔，刻上了 5 万多个汉字，甚至在著名笑星赵本山的一根头发上刻上“人品皆高是本山”7 个字……类似的 200 多件微艺作品，聚集在一起，成了中国首家微雕博物馆，而且由一位艺术家个人投资。

博物馆设在杭州萧山区江寺公园内，全名“杭州天石微雕艺术馆”，馆内集中了中国古今

微雕艺术的精华，包括汗毛微雕、赵本山毛发微雕、台湾沙粒微雕，等等。所有微雕作品都需要用特制的显微放大镜观赏。

微雕艺术馆的主人是中国的微雕艺术大师冯耀忠，冯先生已经获得并保持了 6 项吉尼斯之最的纪录。对微雕情有独钟的冯耀忠近年来为建一座中国微雕博物馆上下奔走，杭州萧山区委、区政府将微雕博物馆视为文化载体，无偿提供场地，冯耀忠个人出资 147 万元，终于建成这座中国独一无二的博物馆。

记者在博物馆现场看到了来自美国、马来西亚等 20 多位国内外微艺名家的珍品，还看到了中国古、近代的微雕艺术珍品。有不少是闻所未闻的珍品。如大头针帽上的油画，写有 5 万字的一支钢笔，在直径只有头发三分之一的汗毛上雕刻的“为国争光”等 10 字，还有微雕作品《世界和平万岁》，它将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国旗刻在了邮票大小的象牙上。冯耀忠最新的作品是在赵本山的一根头发上刻上了“人品皆高是本山”7 个字。而冯耀忠最为满意的是他的新作“毛泽东”，在 0.506 平方毫米的象牙片上，通过显微镜可以看到，毛泽东头戴军帽，笑容亲切，神态丰满。这里堪称是一座弘扬微雕历史文化的教学课堂。

据了解，这家博物馆虽属“民办”，却不收门票，平时下午开放，双休日全天开放。从今年春节期间试开馆至今，观众已超过 5000 人次。

阿根廷垃圾工人的“战利品”成为博物馆精品

中国西部网消息在阿根廷的许多城市，都有一群定时乘着特殊的白色火车往返于城市与乡间的旅客。这是阿根廷经济危机后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垃圾工人。每当夜幕降临，他们便开始行走在一个个城市的大街小巷，不厌其烦地翻捡着一栋栋大楼里清出的生活垃圾，渴望找出能换钱的废弃物件。到深夜时分，这群人就拉着满载“战利品”的车子，搭上火车返回郊外的家园。他们的生活标准不高，没有过多的奢望，只希望明天能够有更多的垃圾等着他们。可如今，正是这群从白色车厢里走出的垃圾工人，经过一位荷兰艺术家的“包装”，一段时间里竟成为了荷兰恩多芬 VanAbbe 博物馆艺术展览的“主角”。

2001 年年末，经历了“打砸抢”风潮、市民敲锅示威和总统的频繁更换之后，阿根廷的国家形象随着一声“进入紧急状态”的号令而在世人面前崩塌。一时间，阿根廷吸引了世界的目光，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艺术家等纷纷云集到这里，把它当成了针对新自由主义经济、针对社会福利研究的研究室。而荷兰艺术家马丁西斯·德·布鲁伊奈则是其中独树一帜的一位。从到达阿根廷开始，他就另辟蹊径，把目光对准了危机后出现的“新生事物”——人数众多的垃圾工人。他遍访各省的垃圾工人，与他们交谈，甚至跟他们一起生活相处。正是这无间的友谊和相互的坦诚，促使德·布鲁伊奈产生了一个念头：用他艺术家的头脑在经济上为这个群体尽一点微薄之力。

德·布鲁伊奈不再漫无目的地跟踪采访了，他注意到很多垃圾工人在闲谈中都提到了自己的梦想，尽管那些他们梦寐以求的东西折合成欧元也就是三五十块钱的样子。想想看，也许帮他们实现这些梦想不会太难，于是他便开始着手筹划一个名为“廉价出让”的网站，从垃圾工人中征集他们捡到的自认为是“最有意义”的“精品”来上网拍卖。而后，为了扩大这个计划的影响和参与面，他又开始积极筹措在荷兰举办一场以这些物件为展品的艺术展。他的计划是，如果这些展品能够卖出去，那么他将把所有的收入如数寄给垃圾工人，让他们去圆自己的梦想。

可是这样一个具有明显经济目的的展览如何能进入以艺术品位著称的恩多芬 VanAbbe 博物馆的大雅之堂呢？这还得归功于德·布鲁伊奈的倾力说服。博物馆馆长飞利浦·万登·鲍

斯彻解释说：“一开始我们根本没考虑办这么一个有拍卖性质的活动，但是德·布鲁伊奈的艺术作品所具有的政治影响力说服了我。后来，我很惊讶于这个有经济目的的展览，在经过德·布鲁伊奈的精心设计后，竟然能跟我们这里的艺术气氛相匹配，这实在太让人赞叹了。”

从去年12月开始至今年3月结束的展览已经获得了成功。3万人曾在这里驻足，流连于丰富的展品、诸多有关垃圾工人生活的幻灯资料和相关的阿根廷国产电影之中。而到目前为止展品也已卖出了一半，德·布鲁伊奈没有食言，已经将所得收入寄给了每一个参与者。

埃及请求英国归还珍宝 希腊同类请求遭拒绝

新浪科技讯 近日，埃及有关方面表示，希望英国博物馆归还埃及的古代宝藏，而在此之前，希腊也曾经要求过英国不列颠博物馆归还其所藏的古希腊大理石雕刻。

埃及文物官员周日表示，希望英国博物馆归还拉穆塞斯六世法老的面孔雕像，目前这位法老曾经被打碎的石棺已经大部分复原了。

拉穆塞斯六世大约在公元前1156至1145年间统治埃及，他的坟墓与许多安葬在埃及国王谷的坟墓一样，在其死后不到100年内就被盗了，而其石棺也被打碎成数百片。

一个由美国国际开发总署资助的项目收集了大约250个石棺碎片，复原了石棺的大部分，但由于拉穆塞斯六世法老面孔雕像原物自1823年一直被收藏在英国博物馆中，研究组不得不使用一个复制的铸型。

埃及古文物高级委员会的会长扎西-哈瓦斯博士在复原后的石棺揭幕式上说：“现在我们把复制品放在石棺中，不过我希望有一天英国博物馆会归还原物，而拿复制品回去做纪念。”现在拉穆塞斯六世法老华丽的坟墓已经向公众开放了，只是其中法老的面部雕像是复制品。

哈瓦斯说：“雕像只有在原坟墓中才能显示它的价值，我相信英国博物馆将面孔雕像原物奉还是最好的做法，因为它在英国博物馆中毫无价值。不过目前我还没有递交归还的正式请求。”

此前，哈瓦斯曾呼吁其它国家归还埃及流落国外的古代珍宝。去年10月份，一家美国博物馆送回了一具被认为是在公元前1290年统治过埃及大约两年的拉穆塞斯一世的王室木乃伊。

拉穆塞斯六世的石棺最初套在另一个石棺的内部，但是这个外石棺也在几个世纪前被打碎了，法老的木乃伊曾经被转移到另外一个埋葬地点，现在躺在开罗的埃及博物馆中。

希腊雅典的帕台农神庙的大理石雕刻，是公元前5世纪的产物，而在19世纪的早期时候被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所收藏。此次雅典再三要求英国博物馆归还其宝物，但遭到了拒绝。

国际乒联博物馆

【南京日报报道】尽管国际乒联暂时没有针对中国乒乓球的限制措施，但国际乒联确实发现了乒乓球，特别是女子乒乓球正面临的危机，除去中国等亚洲国家，女子乒乓球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越来越差。正因如此，国际乒联的推广部门目前正在采取很多措施推广女子乒乓球，其中包括为一些女子乒乓球弱势国家培养教练等，但最有意思的却是国际乒联博物馆为此做的贡献。

国际乒联博物馆的展示结果表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女子乒乓球在欧洲非常盛行，在早期欧洲中、高级沙龙里，男士们在一起讨论国事，陪伴他们的女子在觉得无趣时便会在在一旁打乒乓球。自从专门有了锦标赛之后，一些欧洲的天才女运动员也层出不穷，在20世纪初期的世锦赛上，一个叫马瑞娜的运动员甚至连续6次夺得单打金牌，共获得18块金牌和50

多块银牌。在上个世纪早期，欧洲出现多名这样优秀的女运动员。

现在的欧洲找不到一个具有足够说服力的女乒明星，来做发展欧洲女子乒乓球的榜样。很明显，国际乒联正试图运用这种方式刺激现在欧洲女子乒乓球事业的发展。

意大利为旅游巨资改建博物馆

意大利目前正致力于将位于佛罗伦萨的 Uffizi gallery 改建为欧洲一流博物馆。该改建工程耗资 3800 万英镑，计划使展位增加一倍。

意大利文化部长 Giuliano Vrbani 说：“扩建后的艺术馆甚至将超过罗浮宫。”

该项计划竣工后，来访者将看到 800 件新作品，其中有很多目前由于展位不足而被迫存储在艺术馆的仓库中。

这项扩建工程是意大利 Silvio Berlusconi 政府的文化举措之一，旨在夺回被巴黎罗浮宫和马德堡的“艺术三角”夺走的文化旅游市场。

该扩建计划 60 年前便已开始，最近一次修缮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印度首都新德里西南部建立了一家厕所博物馆

当越来越多的印度人用上手机，开上进口轿车的时候，当印度的软件工程师研发着让世界人民期待的新版软件的时候，当印度航天技术人员正跃跃欲试地准备同美国同行合作开发月球资源的时候，仍有四分之三的印度人没能用上一个干净简易的卫生间，甚至仍保持着就地“方便”的习惯。一些印度有识之士已经开始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印度进行着一场意义深远的“厕所变革”。

经济发展卫生落后

印度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近年来，其经济建设特别是信息技术领域的发展呈现出了突飞猛进的态势，但印度滞后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关系到国民生活质量的厕所建设和污水处理却几乎仍处在“蒙昧”状态。

据统计，在印度 5000 个中等规模的城镇中，只有 252 个城镇建有下水道和污水处理系统。而这其中很多已经年久失修，各类生活污水也不经过处理便直接倾泻进河道。至今，仍有 89% 的印度人在使用随处搭建的临时厕所和条件简陋的公共厕所。

从“厕所革命”做起

事实上，印度的有识之士早已关注起了印度厕所建设的问题。早在 1970 年，出身高种姓阶层的宾德什瓦尔·帕塔克就筹措资金成立了一个专门为改善印度低种姓阶层居民卫生系统的社会服务组织。他们的目标之一就是，让印度广大低种姓阶层使用上现代化的厕所系统。

随着时代的发展，该组织还一直注意厕所技术的革新，开发生态型多功能厕所。经过几年的研制，他们给以往用清水一冲了事的厕所加装了两个蓄粪池，将收集起来的粪便经过干化等处理变成混合肥料，用于农业生产，同时还可以利用蓄粪池制造的沼气发电，为日常生活提供能源。

普及教育改变陋习

在投身“厕所建设”的同时，该组织还注意到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那就是应当在印度普通百姓中推广健康卫生知识，进行普及教育，只有从整体上提高印度人的文化素质，才能真正带动“厕所变革”。

该组织特意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西南部建立了一家厕所博物馆，专门展出 60 多个国家捐赠的厕所设施。在厕所博物馆旁，该组织还开办了一家专门为低种姓阶层孩子提供受教育机会

的学校，那些出身卑微的孩子可以在那里接受基本的文化教育，并有机会在假期接受缝纫、电工、家电维修、甚至时装设计和电脑应用等课程的培训。至今，已经有 6 万名来自低种姓阶层的青年人从这里毕业，他们大部分人都已经成为传播现代化知识，带动教育普及的中坚分子。

正像厕所博物馆讲解员所说的那样，在古印度时期，文化相当发达，古印度人的公共污水处理系统也相当完善，甚至比现代印度人使用的设备还科学、卫生，而且不分种姓贵贱，家家都有厕所。与之相比，现代印度人的卫生系统状况实在是糟糕透顶，现代印度人的卫生习惯更需要改变，这一切最终都需要通过教育的普及来解决。

英国国立博物馆的免费参观政策

英国政府一贯十分重视博物馆和美术馆的开放性和教育功能，英国国家政策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重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强调公众对文化艺术活动的平等参与，提高公众对文化遗产的欣赏水平。国立博物馆免费向所有公众开放成为英国文化政策的一个重要表现。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博物馆，大英博物馆长期以来一直坚持不收门票。但由于经费紧张，其他绝大多数国立博物馆一直实行收费参观。而长期以来文化艺术界就一直在为取消国立博物馆的收费参观政策而努力，早在三十多年前，当时英国最大的艺术慈善组织——英国国家艺术品收藏基金会就向政府提出了取消国立博物馆收费参观的建议。但英国政府由于财政紧张，一直未予同意。直到 2001 年，随着政府财政状况的改善，政府才在预算案中明确规定：今后凡取消门票的博物馆可退回地税和营业税。该政策成为国立博物馆（美术馆）取消门票收费的关键。同时为解决由于取消门票收费而带来的国立博物馆收入锐减的问题，与此相配套，此前一年英国政府主管博物馆事业的文化、新闻和体育部就特别向各国立博物馆增加了 2900 万英镑的拨款。从 2001 年 12 月 1 日开始，所有国立博物馆（美术馆）正式取消门票，除临时性展览外，免费向公众开放。为保证免费参观政策的持续性，在国立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的前一天，政府再次保证在 2003—2004 年以前，一定增加给国立博物馆的财政补贴。免费参观政策不仅受到英国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赏，而且得到外国旅游者的广泛好评。免费参观政策把公立博物馆（美术馆）的有形门槛下降为零，有利于吸引更多的社会下层观众。

足球天堂及足球博物馆

温暖的球场中，每个人都是贵宾

佩雷斯和拉波尔特如何来维持俱乐部庞大的经济开支？探星团在走访两家豪门时更深一步地了解了皇马巴萨的经营方式。足球俱乐部的收入无外乎以下几种渠道：电视转播、赞助商、销售套票和球衣销售。这几种收入来源的分配比例大致为：电视转播和赞助商 60%，套票 25%，球衣销售 10%，其他占 5% 左右。谁能在市场上分到更大的“蛋糕”，就看各俱乐部怎么“各出奇招”了。

以“巨星”吸引眼球

在访问中，我们印象很强烈的是，皇马是以其巨星阵容吸引球迷们的眼球。在西甲的 20 家俱乐部中，皇马独占电视转播权收益的 54%，远远高于巴萨的 24% 和马德里竞技的 12%，这部分收益占了皇马总收入的大头。也就是说，西甲高达 1 亿欧元的电视转播费中，皇马能分到 5400 万欧元。皇马的“巨星效应”不仅体现在电视转播中分得半数以上的收入，同时，巨星的照片、印有巨星号码的球衣销售价格也“高人一筹”。一张印刷的球星签名照片居然卖

7 欧元！一件印有巨星名字及号码的球衣比一般球衣贵 30%。皇马的 5 号、10 号、9 号和 23 号球衣销量接连破纪录，使皇马球衣的销量遥遥领先于欧洲其他豪门。

“暖烘烘”的球场场场爆满

在赴欧之前，我们都有一个担忧：天气变冷了，到现场看球赛的人还会多吗？但当我们置身于贝纳布球场观看皇马与维拉雷尔的比赛时，我们的头顶上不时有阵阵暖风，抬头一看，哇，好壮观的暖气管道！皇马球场的人性化设计使球迷们倍感温暖。同时，洗手间和看台过道也清理得干干净净。这才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现场看球真是享受啊！球星的精彩表演和良好的球场环境可以说是贝纳布之所以能场场爆满的真正原因。

灵活多变的球票销售方式

球票收入一直是俱乐部的主要收入之一。为了保证这部分收入的稳定性，皇马和巴萨都在球票销售上动足了脑筋。

为了减少球迷对年票被浪费的担忧，巴萨对年票的使用做了新的规定：购买年票的球迷如果某场比赛不能到现场看球，可以申请将自己的年票让给自己的朋友使用。年票所有者只需要打个电话，或者登陆俱乐部官方网站，告诉俱乐部自己朋友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就可以把年票暂时转借。这种做法使年票的销售量提高了将近一倍。

皇马在年票销售上虽然一直保持着自己的“豪门高价”，但俱乐部也会根据位置和级别的不同将套票分成了 10 多种，其中最低的为 116 欧元，最高的是 1083 欧元，贵宾包厢的价格从 3000 欧元到 12000 欧元不等。而且，两大豪门的球票价格都是随着比赛的不同而变化，上下浮动可以超过 10 倍。

打“文化牌”赚钱

巴塞罗那的阵容虽然没有皇马那样璀璨，但是，巴萨人却在“文化牌”上下足功夫，他们精心布置的博物馆，参观的人数居然可以超过毕加索博物馆。由于他们对足球历史那种细腻展示，以至于参观过博物馆的人都忍不住要买一些有历史纪念意义的球衣或其他纪念品。至今为止，克鲁伊夫、斯托伊奇科夫等球星的球衣依然热销。



北京长城百年大修开工 国庆前竣工并开放

来自千龙网消息：16日，位于怀柔区界内、全长12.4公里的黄花城长城开工大修。这一工程拉开了今年北京周边长城百年来首次大规模修缮的序幕。

黄花城长城全长12.4公里，此次的修缮范围西起撞道口，东至小城峪，全长约4公里，包括空心敌楼13座，城门2处，附墙台2处，实心敌台1处，东西城堡各1处，边墙约3300米，整个工程投资1274万元，将分三期实施。昨天开工的一期工程，西起金汤水库，东至小城峪，全长1686米，由市政府拨款400万元进行，将于国庆节前竣工并向游人开放。届时，此处“野长城”将成为京郊的又一处风景区。未修缮的黄花城长城部分，将设立警示牌，提醒游客，不向公众开放。

据介绍，黄花城长城地处京师北门，是历史上著名的军事要冲，所以这里的长城用石条筑就，工艺精湛，堪称“固若金汤”，又名“金汤长城”。本次修缮将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就地取材，用长城坍塌后原有的石条，和附近出产的部分石条，依照明代的古法修缮。黄花城长城修缮，是长城保护法公布后的第一个大规模修缮项目，工程将以抢险加固为主，确保长城的结构安全，对砖拱坍塌、开裂进行加固补强。

记者从市文物局了解到，随着黄花城长城修缮工程的开工，今年北京市还将对岔道口、古北口、司马台等处长城进行保护修缮，具体保护方案将在专家论证后的基础上，经批准后实施。

北京密云县古北口发现明代精美彩绘壁画

来自《北京青年报》：7日，北京市文物工作者在密云县古北口镇潮关村瘟神庙内，意外发现了明代精美彩绘壁画。

此次发现明代精美彩绘壁画的潮关村位于古北口镇潮河东岸，古为连接关内外的通路之一，过去潮河水时常泛滥，瘟疫流行，所以在村头人们建了这座瘟神庙。瘟神庙总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为硬山顶，面阔三间，进深两间，包括配房、耳房，庙前建有清代戏楼。庙内雕梁画栋，东、西、北三面绘有精美绝伦的彩色壁画，人物栩栩如生，色彩鲜艳、清晰完好。但发现的壁画是什么故事，表达的是什么意思，何人所绘，绘于何年代不详。

据北京市文物局文保处副处长王玉伟介绍，瘟神庙的壁画属明代风格，这样的壁画已不多见，需要好好保护。

北京通州马驹桥发现43座汉唐墓葬群

43座古墓沉封千年开发区施工意外发现

信报通州讯在马驹桥镇凉水河大桥新桥北侧，有一个在地上沉封了数千年的墓葬群。昨日，记者在古墓挖掘现场，看到了埋藏在地下千年前的尸骨。

挖掘现场：

死者尸骸混在泥土中

昨日，记者在通州区马驹桥镇凉水河大桥新桥桥北看到，马路西边的大片荒地里，有7、8处被挖掘的坑。坑都不深，最深的一个2米左右。记者发现，每个坑里都有被填上新土的痕迹，坑的四周散落着大堆青色的石砖，在石砖和泥土中，记者看到许多人的尸骸，有头盖骨、锁骨、腿骨等。在一个近40、50厘米深的坑里，隐约可以看见用青砖铺的地面，在所有的坑内记者都没有发现一具尸骨。

据在荒地不远处施工的几个工人介绍，昨天，这些挖掘的坑里还暴露着一具没有头骨的尸体，今天上午就被填埋了。

记者在采访回去的路途中还看见，马路东边也是大片的荒地，一群人拿着洛阳铲子在荒地里勘测着。

出土文物：

汉代陶制品、唐代瓷器

据了解，经过5个月的发掘，79号地发现南北两大墓葬群，目前已探明墓葬43座。南墓葬群区可断定为汉唐墓葬埋藏区，北墓葬群区则具有家族墓地的特征。

出土器物有汉代的陶罐及陶俑、陶鸡等典型陪葬冥器，同时出土有唐代的黄釉瓷罐、白釉瓷碗等。

有关专家表示，这一地区墓葬形制和风格与国内历代墓葬典型形制存在着一些差异，其中敞口土圜竖穴式墓中砖砌棺具有鲜明的地域个性特征，它将为我国唐代墓葬形制与地域分布情况的认识，提供了实际资料，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发现墓群：

工程施工意外发现

据通州区文物管理所所长郭生介绍，这个墓葬群是去年下半年时，亦庄技术经济开发区在编号为79的地里进行基础工程时发现的，上报后，北京市文物局文物研究所派人来此勘探，现在79号地已经勘探完成，正在发掘。

谈到最近的勘探进展，郭生说，79号地勘探完成后，现在已有一支专业的河南文物勘探队开始对79号地旁的80号地进行勘探。“平时，我每周总会过去2、3趟，一去就呆上半天，查看了解勘探的情况。”

当记者问到为什么墓地现场有一些尸骨裸露在外面时，郭生表示，一般来说，发掘后，工作人员应该把尸骨及时掩埋，出现尸骨裸露问题，应该是个别情况，但他会及时把这个情况反映给市文研所，让他们提醒工作人员注意。

专家释疑：

古时这里是个“富裕村”

通州区原文管所所长周良向记者介绍，79号地的墓群里大多埋葬的都是一些庄园主和平民，墓内一些珍贵的东西早在古代就被盗墓者盗走了，现在留下来的多是一些陶器、铜镜、钱币等。

那么为什么这块地方会形成这么大的墓群呢？周良说，在汉唐时期，今凉水河、高粱河流经这个地方，并在这里形成一个夹角，所以这里土地肥沃、农业发达，后来隋炀帝下令开凿大运河永济渠，源源不断的粮食物资从中原、江南经过这里，运输到当时的北方军事重镇——蓟城(今北京)，这对于巩固北方边防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使得沿岸的村庄居民都比较富庶，造成人口越来越多，并形成了大墓葬群。

新闻背景

79 号地位于开发区南端处在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凉水河北岸。据资料显示，历史上，自秦至唐及五代，人类在该地频繁活动均有记载。辽、金、元、明、清 800 多年以来，该地骤然成为政治活动、军事集结、商贸交通往来的重要地带，以致马驹桥演变为京南重镇。凉水河是运河文化组成部分，其历史研究价值一直为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所关注。

北京亦庄挖出大型汉墓 精美随葬品十分罕见

本报讯昨天，亦庄地区一座罕见大型多室汉墓被考古工作人员清理挖掘出来，其规模之大、随葬品之精美为北京南城之最。在出土的随葬品中，一柄铸造精良的青铜刀尤为珍贵，这是北京地区首次发现实用类的青铜佩刀。

记者在考古现场看到，这座大型多室墓坐北朝南，共有前室、两个侧室和两个后室，共五个墓室，加上墓室前方的一段甬道，格局颇似“五室一厅”。墓室长约 7 米，宽约 5 米，墓室底部距地面 3.7 米，全部为绳纹砖所砌。在前室通向后室的两条甬道上方，两个拱形的“船篷顶”还完好地保存着。考古专家说，一般前室上方应是穹庐状顶，但开掘时此墓已被盗过，“穹庐顶”被破坏。在这座大型墓葬中共发现 4 具尸骨，其中墓主人尸骨位于前室，一个侧室中的尸骨头骨较小，似是女性，估计应是墓主人的妻妾，后室中两具尸骨剩余较少且比较凌乱。

这座大型多室墓出土了近 30 件随葬品，陶狗、陶水牛、陶鸡、陶俑等制作精美，保存完好。根据墓中出土的一批“剪轮五铢钱”判断，此墓年代应为东汉末期。

在出土的随葬品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一把铸造精良的青铜佩刀。这柄刀长 69 厘米，宽约 2—3 厘米，刀柄长约 12 厘米。市文物研究所的专家说，从锋利程度和长度来看，这把刀属于实用类的佩刀或战刀，应该是墓主人生前随身之物。由此推断墓主人并非普通百姓，应该是有一定地位的大户或者武士一类。在以前北京地区发现的随葬刀具中，大多是只有 10 厘米长左右的削刀，用来刮竹筒等，属于“文具”，而这样的实用类刀还是首次发现。考古专家说，汉代由于战乱频仍，北方地区地广人稀，平民的生活条件不高，因此墓葬多以单室、两室居多，这样大型的五室墓葬实属罕见。

国家文物局：不达标单位不得保存三级以上文物

来自人民网消息：近日，国家文物局在相关通报中指出，各级文物行政部门和文博单位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务必高度重视文物安全工作。不达标单位不得展出和存放三级以上文物。

有关人员介绍，目前，有的文博单位由于文物底数不清、账物不符、保卫机构不健全，没有专职保卫人员、没有基本的防卫器具等导致文物丢失，通报要求抓紧落实《文物系统博物馆风险等级和安全防护级别的规定》的达标工作，没有达标的单位，不得展出三级以上文物，文物库房不得存放三级以上文物。

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 在京考察南水北调工程文物保护工作

来自国家文博网报道：3 月 14 日，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文物保护司顾玉才司长一行赴南水北调中线北京段主干渠工程途经的丁家洼聚落和镇江营两处遗址进行现场视察，并同市有关方面负责人进行了座谈。

视察中单霁翔局长详细询问了南水北调工程涉及地上、地下文物的情况，强调要保护好

文物，落实文物保护经费，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要保证工程的顺利进行。在座谈会上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汇报了南水北调工程北京段文物勘察情况及文物保护规划完成情况。

加强名人故居宣传 促进北京历史遗迹保护

北京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也是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因此北京有很多名人居住的历史遗迹可供人们追忆凭吊。在我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中就有相当数量是属于名人故居。由于历史的变迁，这些名人故居除少部分对社会开放以外，多数的名人故居都不具备对社会开放的条件，虽然有文物保护单位的标志，但都缺乏解释性说明牌，其历史和价值很少为人们所了解，使这些名人故居不能很好的发挥作用。

为更好地发挥这些名人故居的功能和作用，根据市领导的要求，我局于2003年11月召开四城区文委主任会议，决定由四城区文委将各自辖区内已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名人故居名单选出，并撰写详细的文字说明，我局下属的市古代建筑研究所负责说明牌的设计及说明文字审核的工作，在年底前完成说明牌的设计、制作，在今年年初由四城区文委进行挂牌。

经从我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中进行筛选，由资深专家把关、审核后，现已完成31处名人故居说明牌的文字稿撰写、设计、制作以及挂牌等一系列工作。

这31处进行挂牌的名人故居，均已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这其中既有一些近现代史上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过深刻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有关人士居住过的老宅，也有忠臣良士旧居、还有文人巨匠、一代名伶居住生活过的建筑。如位于西城区后海北沿46号的宋庆龄故居是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于1961-1981年在北京的居所，1982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西城区前海西沿18号的郭沫若故居是郭老1963年以后在京的居所。郭老是我国著名的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翻译家和社会活动家，为中国科学文化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余的名人故居名单如下：蔡元培故居、陈独秀旧居、老舍故居、梁启超故居、毛主席故居、茅盾故居、欧阳予倩故居、孙中山逝世纪念地、田汉故居、杨昌济故居、朱启铃宅、荣禄宅、左宗棠旧居、顾炎武祠、杨椒山祠、康有为故居、朱彝尊故居、京报馆、绍兴会馆、谭嗣同故居、纪晓岚故居、沈家本故居、荀慧生故居、李大钊故居、齐白石故居、梅兰芳故居、程砚秋故居、鲁迅故居、张自忠故居。

政协委员呼吁救救流失海外文物

来自《中国青年报》报道：正在召开的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上，陈铎等近20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一份提案，呼吁“救救大量流失在海外的文物”。

7日下午，人民大会堂东门外，正匆匆赶来参加政协十届二次会议全体大会的陈铎委员对本报记者连声称：“抢救流失海外的珍贵文物，迫在眉睫。保护文物，就是保护文明的根；抢救文物，就是让落叶归根。”

陈铎透露，在两会上，呼吁抢救文物的提案议案或建议，远不止由他起草的这一份。“目前应该是迎回流失海外的文物的好时机。”陈铎委员说。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文物大量流失到世界各地。据不完全统计，在47个国家的200多家博物馆中，馆藏的中国文物有100多万件；散落在世界各地民间的中国珍贵文物同样数量浩繁，难以计数。陈铎说，流失海外、收藏在世界各地藏家手中的中国文物，“绝大部分是以战争、劫掠、盗掘和走私等不正当途径流散出去的”。

事实上，炎黄子孙对流失海外文物回归故里的期盼，从未停息过。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政府一直关心流失文物的回归。据资料显示，上世纪70年代以后，我国政府相继签署了一系

列保护文化遗产的国际公约，并通过法律手段成功追索回几批流失文物：1998年1月，经中国政府严正交涉，英国政府将走私入境的3000多件（套）中国珍贵文物归还给我国；2000年，被盗运出境、面临被拍卖境遇的五代王处直墓武士浮雕像，经中国政府交涉，回到祖国。

企业、民间组织和个人也积极投入到抢救流失文物的行列中。1998年成立的保利艺术博物馆，至今已从海外抢救回数万件珍贵文物；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是国内第一家以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为己任的民间组织，自2002年正式成立以来，已为促成流失文物的回归，在社会上营造着较大的声势。社会知名人士也在为流失文物的回归倾注心血和财力。比如，2002年，全国政协常委、香港著名人士张永珍以创清代瓷器成交价世界纪录的4150万港币，拍得一件清雍正粉彩桃纹橄榄瓶，并于翌年将此罕见珍品捐献给上海博物馆永久收藏；2003年，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地区著名企业家何鸿燊，通过专项基金捐巨资，将流失海外143年的圆明园猪首铜像抢救回国，轰动海内外。

“目前，国内已形成了以政府为主体、民间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的抢救流失海外文物的良好局面。”陈铎委员说。加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归还“被无理剥夺的文物”、“原址保护”等主张，已成为国际组织的共识。

因此，由陈铎起草的提案中，提出5方面建议：由国家立项，政府牵头，社会各界集思广益，制定全面、系统的规划，统一领导抢救流失文物回归工作。摸清流失海外文物“家底”，进行调查登记。陈铎建议采取“民办公助”的方式，广泛利用各方面优势资源。多种渠道争取流失文物回归。“讨还当然是最好的办法。回购、回赠，都需要一大笔资金，这钱肯定不能由国家全包。因此，我的呼吁是，有力出力有钱出钱。”陈铎说。充分发挥政府和民间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对此，陈铎坦言，政府对民间组织、个人的现行政策及经济支持，还存在许多不足。例如，2002年出台的《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接受境外捐赠、归还和从境外追索的中国文物进口免税暂行办法》，并未涉及民间组织及民营博物馆，“有关部门制定法律法规时，也应对民间组织予以支持”。

采取国家拨款与民间筹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解决经费问题。建议动员社会力量，发掘民间财力，发行“国宝彩票”，解决回购文物的资金。

千年云居寺拟申报世遗

来自人民网消息：在刚刚闭幕的北京市“两会”上，相关代表就关于云居寺塔及石经申报世界遗产以及加快对云居寺隋唐石经保护再次提出议案。记者昨天获悉，云居寺申遗已经开始启动。

云居寺管理处办公室主任王艳华告诉记者，中国文化遗产委员会和世界遗产保护组织专家都曾对云居寺塔及石经进行考察并有较高评价。申报世遗现在已经成了全体云居寺人员的追求，希望云居寺有更多荣誉，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据悉，目前云居寺已成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小组，进行了文化遗产资源评估，开始制定申报规划，起草申报文本。房山区政府也向市政府进行了上报，并将此事列为重要议事日程。相关启动资金已下拨，申遗办公室已筹建。

云居寺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刻经事业历经隋、唐、辽、金、元、明六个朝代。绵延1039年，镌刻佛经1122部3572卷14278块。像这样大规模刊刻，历史这样长久，实属世界文化史上的壮举。这些石经多收藏在各个山洞。除了于1999年9月9日9时9分回藏到充氮地宫的10082块辽金石经之外，目前还有4196块隋唐石经仍然在1300年前的山洞中保存。由于山石渗水的侵蚀，石经已经有了严重的风化现象，部分文字开始脱落。有关专家告诉记者，房山

石经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保留了许多重要典籍的历史原貌，同时又反映了佛教及其典籍的沿革变化。

二、石经题记是丰富生动的社会民俗风情记录。房山石经的特点之一是经文后面随有大量题记，据不完全统计，在近 15000 块石经中有各种题记 6051 则。有明确纪年的达 1467 则，其内容极其广泛，涉及隋唐辽金元明各朝。

三、反映了隋至清诸代书法以及绘画艺术发展的踪迹，近 15000 块石经和数百块碑刻中书法风格各异。

四、反映了云居寺建筑的历史以及刻经事业的缘起与继承。

“龙山文化”、“宋代墓葬”同现山东

来自央视国际消息：近日，在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的公路施工现场，工人们无意间发掘出一把花岗岩石斧，就是这件不起眼的石斧，揭开了 4000 年前的古代文明。

刚刚出土的那把花岗岩石斧，以及一同出土的花岗岩石凿和砾石刮削器、陶，经文物考古专家鉴定，这些都是龙山时期的文物。

沂源县文物管理所所长杨中华说，经过考察，现在发掘的这个遗址是距今 4000 年-4500 年的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址。”

经文物工作者小面积清理发掘，清理出灰坑一个，除了三件石器外，还有大量素面灰陶和红色鸟喙形鼎足出土，其中伴有部分蛋壳陶片。就在距离遗址 200 米处的公路施工现场，工人们又发现了一处宋代墓葬群，这个墓葬群与龙山文化遗址交织在一起，约有 0.6 平方公里。经部分抢救性清理发掘，出土陶瓷瓶、瓷罐、瓷碗等多件器物。

杨中华介绍，这个宋代墓葬群对研究宋代葬俗、葬制及对沂源宋代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目前，龙山文化遗存和宋代墓葬群的清理工作仍在继续。

阿炳故居修复方案已确立

来自江苏文化网消息：在崇安寺改造的隆隆机器声中，沉寂已久的民族音乐家阿炳的故居即将开始修复。从无锡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获悉，阿炳故居的具体修复方案已基本形成。

阿炳故居位于无锡市旧城区的中心，阿炳一生以道观为家，故居原有房屋 20 余间，包括修行的雷尊殿，火神殿及居住的一和山房三组建筑，其中一和山房是阿炳的出生地，为现在的图书馆路 30 号。在修复方案中，这三组建筑整体均属于阿炳故居，其保护范围包括为今图书馆路 24 号至 30 号以及 42 号至 50 号。目前，阿炳故居尚存 9 间原建筑，包括雷尊殿 3 间和附房 6 间。其中，雷尊殿比较高，晚清特征也很明显，而一和山房内约 20 平方米的阿炳居室依然留有小阁楼，仍保留着破败潦倒的面貌。故居的修葺方案由东南大学古建筑专家朱光亚教授完成。在对故居进行测围和现状考察后，拟定了不改变文物原貌的的修缮原则，并将尽量保留历史信息。为保持故居完整性，故居建筑的原材料将给予保留。由于建筑残损情况比较严重，且雷尊殿多处受白蚁侵蚀，因此对雷尊殿和火神殿将进行落地修缮。整个修复工程预计年内开工，目前的修葺方案也会随着改造工程的进行不断调整。

据无锡市文管会办公室副主任杨建民介绍，市政府将阿炳故居作为重点建设项目纳入崇安寺改造工程中，与其同步进行。在修葺方案中，不仅要故居主体进行修复，更要以故居为中心形成周边的文化氛围，在繁华的市中心突出故居的历史面貌。因此，可能会拆除故居

前的商业建筑，并将周边高层建筑放低，同时对这些建筑外部进行整修，加入传统民族特色，使其符合故居的风格。阿炳故居旁将建成二泉广场，与故居品位相契合，市民在参观休闲之余能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氛围。

修复后的阿炳故居内将作陈列展示，30号的一和山房作为复原陈列，将再现阿炳生活环境；雷尊殿和火神殿则成为二泉音乐馆，展示道教音乐，并用声、光、电等现代化效果介绍阿炳生平及其所创乐曲。目前正在征集陈列物品，由于阿炳生前大部分用品已遗失，因此只能从民间寻找同时代的物品和器具。杨副主任表示，如果市民对阿炳故居的修复或者陈列方案有更好的想法或建议，也欢迎来电畅言，希望通过大家的集思广益更好地修复名人故居。

百色出土旧石器时代手斧 东方文明不逊西方

最近，有关考古人员在广西百色盆地又采集到一批旧石器时代加工精细的手斧，加上先前发现的手斧，百色发现手斧总数已逾二百余件，百色因此成为中国目前发现手斧最多的地方。此间有关专家认为，这更加充实了东方古人类文明水平不逊于西方的证据。

广西文物工作队最近在地处百色盆地的坛洛至百色高速公路施工路段进行文化遗物普查时，采集发掘到近三百件旧石器，这批旧石器包括砍砸器、手镐、手斧、石粒、石片等，其中手斧有二十余件。这些手斧引起了国内外专家的浓厚兴趣。中国科学院、美国史密森研究院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及广西自然博物馆的专家对这批手斧的特征进行研究考证发现，这些手斧打制工艺比较复杂、加工精细，其中一件长三十四点八厘米，宽十六厘米的大手斧与先前发现的另一件手斧十分的相似，令人称奇。有关专家认为，这些八十万年前手斧反映了亚洲古人类的文明智慧。

据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黄慰文介绍，手斧此前被认为是非洲及欧洲的一种标志。手斧体现的是人的行为能力和技术进步，由于过去在亚洲、特别是东亚很少发现手斧，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一些学者认为亚洲大陆是“文化滞后边缘地区”。

布达拉宫九成文物有了“个人档案”

西藏布达拉宫90%的文物有了自己的“个人档案”，每件文物的形状、大小、年代、质地等特征都被明确、详细地记录在册。布达拉宫自1989年开始启动文物清理、登记、造册工作以来，截至目前，已完成了60240件文物的登记造册工作，占布达拉宫所有文物的90%。布达拉宫管理处已对16个殿堂进行了清理，并按质地分铜器库、瓷器库、唐卡库、典籍库、服装库和综合库6大类、10多个专库。同时，对历年拍照的相关布达拉宫照片进行整理，已完成了2万多张照片和底片的核对分类工作，并装柜保管。所有文物登记造册工作估计到2009年完成。

千年文物遭殃 江西修水黄庭坚文物在呻吟

耗资上亿元整体搬迁张飞庙、连根带起挪走古树，三峡工程建设注重文物保护，令国人交口称赞。而同是受建设水电站影响，江西修水南山黄庭坚文物就远没有这么幸运。自2000年4月，一场罕见的文物保护纷争在这里发生。围绕水电站淹没区内的文物保护问题，当地文物保护部门和电站建设单位据理力争。

黄庭坚是北宋著名诗人，江西诗派始祖。其文章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书法亦为“宋四家”之一。修水县南山是黄庭坚的游憩地，1959年，以黄庭坚作品为代表的南山石刻碑刻被列为江西省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目前正在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

5年，修水县在南山建立黄庭坚纪念馆。现存的主要文物景观有：“钓矶”等6处黄庭坚手书摩崖石刻，其中临江岩壁上丈余见方的“佛”字，纵横奇倔，苍古遒劲，历经千年风雨仍见雄健笔力，在书法界享有盛誉；黄庭坚摩崖石刻下罕见的岩石，有雪花样和玉线样斑纹的积雪石、玉溜石；黄庭坚亲手种植的两棵重阳木，一雌一雄，装点修江，人称“鸳鸯树”。最近，备受社会瞩目的江西省修水县南山黄庭坚文物保护问题骤然严峻：抱子石电站在没有对文物采取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悍然关闸蓄水。截至目前，库区水位已达90.5米，南山多处文物景点已浸泡在大水中，如再不采取措施，千年文物将毁于无形！抱子石电站是在修水县修江上建起的一个水电站，被列为江西省重点工程，建设单位为江西省赣能有限公司。

1998年，中南勘测设计院承担工程设计时，忽视遗漏了库区淹没区范围内的文物保护问题，而江西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黄庭坚书法石刻群正处于淹没区范围。自2000年4月这一严重失误被发现后，修水县、九江市、江西省三级政府及其文化部门与工程建设单位屡屡协调未果。今年1月上旬，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级媒体披露了此事，全国上百家媒体予以转载，对黄庭坚文物的命运予以关注。在舆论的压力下，建设单位稍稍推迟了蓄水时间。据修水县黄庭坚纪念馆馆长黄本修介绍，在建设单位既不依法进行文物调查，也一直不制定文物保护方案的情况下，修水县组织专家制定了《淹没区内文物保护方案》，其中特别包含了由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王江林教授论证的黄庭坚手植重阳木的保护措施，江西省文物局审核后，同意了这一方案。可是，建设单位既不同意这一方案，也不制定新的方案。1月18日，建设单位自作主张，抱子石电站7个闸同时下闸蓄水。目前，库区水位已上升3米多，黄庭坚文物开始淹没。记者在现场看到，著名的文物景点——黄庭坚当年钓鱼的钓矶、有雪花和玉线样奇特斑纹的积雪石、玉溜石的大部分已被淹没。黄庭坚手植的至今有900多年历史的一棵重阳木遭殃，其根基裸露部分已被淹1.6米。如果按设计水位93.5米再涨3米，黄庭坚手书的“佛”、“钓矶”等石刻和明代跨浦桥也将陆续被淹。据专家介绍，这棵重阳木古树的根系如继续浸泡在水中，终将因缺氧导致死亡。由于移栽很难保证其成活，因此要保护好黄庭坚手植重阳木和石刻、跨浦桥等文物，修水县制定的修建拦水护堤的方案是可行的。相对于3个多亿的电站投资，113万的文物保护投资并不算多。记者与负责处理文物保护问题的抱子石电站负责人刘德发联系，他三缄其口，称自己对有关事项并不知晓。而据修水方面反映，他就是牵头处理此事的建设单位协调人。在文物受淹的紧急情况下，修水方面要求电站要么接纳已由专家论证的文物保护方案，在汛期之前尽快修好拦水护堤，要么在保护原址的情况下，制定并实施更好的文物保护方案。由于建设单位对文物保护态度漠然，修水方面正寻求社会舆论和上级政府的关注。

费用高达20多个亿 平遥古城搬迁陷入困境

来自中国网消息：1997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位于有“华夏文明摇篮”之称的山西省。始建于公元前827年至前782年间。在中华文明帝京、州府、县城的形制中，平遥是县城。经历代扩建、修葺，是保存最完整的明清时代的建筑，总面积2.25平方公里。砖石城墙周长6163米，高十多米，墙底宽十米，墙顶宽四米左右，有城门六座，角楼四座，望楼72座，垛口3000个。城内有纵横交错的大街小巷一百余条，各式古民居3800处，以及鳞次栉比的店铺、坚实巍峨的楼房，比比皆是的大小庙宇和数以千计的彩塑木雕，无不透出当时的繁荣和西部地区的风土民俗。

曾经名噪一时的山西平遥古城搬迁计划现已陷入困境。近日，到上海参加旅游资源博览会的平遥旅游局负责人透露，为填补搬迁资金缺口，平遥古城正在谋求上市融资。

位于晋中的平遥是中国目前保存最为完好的县级古城，1997 年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号称存世的“清明上河图”。当年，2.25 平方公里的平遥古城居住了将近 5 万人口，而专家认为，平遥古城合理人口的上限为 2.2 万人。为此，平遥当时宣称，到 2005 年古城内所有企事业单位将搬迁出城，城内人口将减少一半以上。7 年过去了，古城内仍有 4.5 万左右常住人口。

佛冈惊现晋代古墓——距今千年

本报佛冈讯 近日，佛冈县民安镇上岳村发现一座古墓，据省考古专家初步预测，该墓为晋代古墓，距今至少有 1500 多年历史。

该古墓是上岳村委会第八村民小组一位村民在本月 18 日上午挖掘自建房地基时发现的。发现古墓者当即通知该县有关职能部门，该县警力迅速保护现场，并向省市文物部门反映情况。本月 19 日上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到现场开展挖掘工作，第二天下午现场清理结束。

该古墓墓室分为墓道、前室、后室、耳室四个部分，全长近 7 米，规模较大，反映了当时的厚葬习俗。出土文物有残碎的陶制器皿、一批古墓砖印有纪年文字，另有印制花纹的墓砖。据在场的省考古专家分析，很早以前该古墓至少遭到三次破坏，墓室前后均有盗洞，封门被毁。古墓顶部的卷顶可能是当地修整农田时挖去的。根据出土的器物外形、制作形态及古墓砖尺寸较大，初步推测古墓主人可能是东晋年间的大户人家。

甘肃 10 余万珍贵文物建立电子档案

目前，甘肃省已有 11 万多件（组）珍贵文物有了电子档案。甘肃省作为全国 4 个馆藏文物调查及数据采集工作试点省之一，从 2002 年 1 月开始启动这项工作。省文物部门组织省内专业人员制定了“藏品定名规范”、“藏品描述规范”、“藏品分类标准”等规范和标准，在对省博物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敦煌研究院完成藏品调查和数据采集、影像拍摄任务的基础上，从全省各地抽调 32 名专业人员和摄影技术人员，对全省 84 家文物收藏单位的藏品进行调查、数据采集和拍摄工作，摸清了每一份文物的家底，为每一份文物填写出准确无误的档案。在此基础上，对鉴定出的 110685 件（组）3 级品以上的珍贵文物建立了电子档案。

南京今年投入 7000 万元整修 17 公里明城墙 太平天国壁画也将集中展示

来自人民网消息：经南京市委、市政府批准，一批重大的文物保护工程已正式开始启动，并力争于年内取得实质性成果。

据南京市文化局文物处衣志强处长介绍，新确定的文保工程方案，主要抓好三大工程：一是投入 7000 万元修缮明城墙。配合秦淮河绿化整治工作，投入 3000 万元，集中修缮东西干长巷和绣球公园等处城墙，小桃园附近的城墙也将投入 3000 多万元整修，这样经过大修的明城墙将达到 17 公里左右；二是把甘熙大院建成一个知名的旅游景点。以甘熙大院为代表的南捕厅一带是南京保存最好的古街区，除街道绿化和旅游设施建设外，30 公顷内的居民将拆迁；三是对太平天国壁画的保护。上世纪 50 年代初，在堂子街发现 18 幅珍贵的太平天国壁画，其中 10 幅是木板的，8 幅是画在粉墙上的。第一期是将 80 户居民迁出去，同时将散落在南京罗廊巷、黄泥岗、如意里等处的太平天国的壁画迁入，形成太平天国艺术集中展示区。另外，郑和宝船厂遗址挖掘和整理、秦淮区大报恩寺遗址发掘、方山定林寺斜塔修复、神策门修缮等工作也将全面启动。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库区新发现大批明清砖木建筑

新华网武汉3月28日电 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获悉，专家们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库区的十堰市张湾区新发现了大批砖木结构的会馆、民居等明清时期的建筑，对研究民俗史、建筑史、商贸发展史等有重要价值。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水库淹没区湖北省文物保护规划组在对库区文物进行复查时，于今年2月在十堰市张湾区黄龙镇发现了这批特色鲜明的明清建筑，包括黄龙镇传统民居群、黄龙镇64号民居和64附2号民居、武昌会馆、黄州会馆、江西会馆等6处，总建筑面积5437平方米。

这些建筑的高程在173米到180米之间，库区水位提高后，这些刚超过库区淹没线的砖木结构建筑大多数将成为三面环水的孤岛，受到很大影响，所以专家们将根据情况进行原地保护或搬迁保护。

湖北省考古所副所长李桃元研究员介绍，黄龙镇老街的传统民居群有16栋民居，分别位于前街和后街，保存基本完好。临街前檐多为重檐，面阔三间，进深一进或二进。屋面为小青瓦覆顶，部分房屋尚存有风火垛头，脊饰花件多已不存。房屋梁架均为穿斗式构架，单层单檐，临街为重檐硬山顶式。平面为合院式建筑，带有天井和两侧厢房。大部分建筑保留有格扇门窗及其它艺术装饰构件。整个民居群有鲜明的鄂西北传统建筑特色。

会馆是当时各地商客聚此而建的，是当地商业、手工业发展的产物，也是客居此地的同乡人聚会、联络和居住的处所。武昌会馆、黄州会馆和江西会馆都在黄龙镇上，建筑上都是抬梁式构架、穿斗式构架并用，是研究汉水流域、十堰地区独特建筑风格的重要实物。

武昌会馆整体建筑保存完好，平面格局、建筑结构仍为原状。山门面和拜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正殿面阔三间，进深三间；偏房面阔二间，进深二间二层。通面阔21米，砖木结构，砖上有“鄂君邑”二字。黄州会馆和江西会馆的风火山墙及墀头等砌作精致，四周墙上分别砌着制有“黄州”和“江西”字样的青条砖。

宁夏西夏王陵三号陵文物修复面世

宁夏西夏王陵三号陵第一期工程于2000年3月开工清理，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珍贵文物。由于当年自然、战争、人为等原因的破坏，大部分出土文物已支离破碎。经过考古工作者的辛勤工作，近万件文物修复工作已全面完成。近日，修复好的部分文物已正式在西夏王陵博物馆展出。

抢救民族文化遗产 蒙古文《大藏经》将脱尘重光

来自央视国际消息：继汉、藏、满三种文字的中华大藏经陆续被整理出版后，中国蒙古文《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也将脱尘重光。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已批准这一中国民族文化史上又一浩大工程。

中华大藏经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的珍品，有汉、藏、蒙古、满等多种文字、多种版本和抄本。

中华大藏经蒙古文版由《甘珠尔》、《丹珠尔》两部分组成，共334函30余万叶近一亿字。《甘珠尔》、《丹珠尔》堪称蒙古族历史文化进程中的里程碑，也是蒙古民族已知最大部头的古籍。

据了解，蒙古文《丹珠尔》只有一种版本，目前世界上仅存三套，两套在中国，一套在蒙古国。三套《丹珠尔》均残缺不全，不少函帙有墨迹脱落现象，有的页面已无法利用。《甘

珠尔》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整理出版蒙古文《甘珠尔》、《丹珠尔》已急如燃眉。

据悉，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于 2003 年 12 月，已把蒙古文《甘珠尔》、《丹珠尔》的出版正式纳入“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内蒙古自治区也把这项工作列为今后几年的一项巨大文化工程。旨在整理出版中华大藏经蒙古文《甘珠尔》、《丹珠尔》为主要目的的蒙古文献库总编委员会已经在呼和浩特成立。

据蒙古文献库总编委员会总编辑金峰介绍，蒙古文《甘珠尔》、《丹珠尔》的整理出版工作争取今年启动并每年整理出版 40 册，到 2007 年，也就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之时，170 册全部出齐。

清朝名将丁汝昌故居祠堂残破大量文物流失

今年是甲午战争一百一十周年，清末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以身殉国一个多世纪，安徽庐江县石头镇的丁汝昌丁氏祠堂却一片凄凉，破落不堪，大量文物流失，文物保护工作因种种原因被迫延宕。

香港文汇报报导，丁氏祠堂位于庐江县石头镇丁坎村，庐江紧邻巢湖，素来是鱼米之乡。但当地官员对祠堂修不修不置可否。一方面资金上有困难，但主要还是欠缺文物观念。

报导说，目前丁氏祠堂只剩下几间厢房，房顶上的几株枯草迎风抖动。墙壁上既有窟窿又有裂缝，正面墙上还挂着当地农家晾晒的咸肉，隔壁则是一户水泥平房，看上去很不协调。进入房间，光线很暗，丁汝昌当年行军使用的木书箱和其它杂物堆放在一起，落满灰尘。房子后面杂乱摆放农具。房顶的青瓦似乎要掉下来，历经百年的丁氏祠堂岌岌可危。

现在的祠堂大院和普通农家没有多少区别，祠堂建筑的地基清晰可见，但地上的建筑已不复存在，只剩下断墙。院子后部是户主新建的红砖住房，房屋很简陋。

丁姓屋主说，当年丁氏祠堂规模很大，远近闻名。李鸿章曾亲笔书「楼船续立」四字赠丁汝昌，匾额就悬挂在祠堂里，丁汝昌当年行军使用的头盔也曾摆放在祠堂供后人拜祭，但文革后都不复存在。

距离庐江不远的巢湖高林镇丁汝昌故居，同样因为「资金短缺，文物保护工作难以开展」，造成大量珍贵文物流失，丁氏故居也面临倒塌。

丁汝昌生于一八三六年，曾任北洋水师提督，创办水师学堂。一八九四年丁汝昌率邓世昌、林永升等在黄海与日本海军激战。

三星堆证明中国人是犹太人后裔？

三星堆位于我国四川省成都平原，自从上个世纪 20 年代开始，人们陆续在成都平原发掘到一些明显区别于黄河流域的各种文物，尤其上个世纪 80 年代前后在几个工地偶然出现的大批以青铜器和玉石为主的出土文物，不仅震撼了中国人，而且也震撼了全球考古界。这些与中国商代并行的 3000 多年前的文物特点明显有“西方”特点，比如青铜面具大都鼻子高挺、眼睛奇大，最奇特的是那里还发现了一根西方王室常用的金质王杖。一时间猜测四起：这些相貌奇特的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了呢？甚至有人说：他们来自外星文明，并且又回到“故乡”去了。

苏三是文化研究学人。她通过各种比较认为：三星堆主要属于犹太文明。如，在几个大型祭祀场所，都有摆放石子的习惯，这些石子相当于祖先牌位；另外，悬棺同样多出现在四川以及长江流域这一现象，使苏三有机地把他们联合在一起考虑：世界上只有犹太民族既有悬棺葬俗同时又有石头崇拜的传统。当然这批人并不是我们今天熟悉的犹太人，并且“三星堆

人”很明显也不信仰 3200 年前以色列领袖摩西创导的犹太教。犹太人的构成远比普通人常识概念中的要复杂，这是许多人根本不敢做此假设的原因，许多学者错失了揭开三星堆之迷的机遇。苏三认为，一直没有历史专家就这一领域提出类似看法有许多巧合因素。首先，研究三星堆的人必须对中东以及全球古文明有相当的深入了解才会把两者联系起来，换句话说：中国的三星堆研究重点不在国内，揭开其秘密的钥匙在中东。

胡适提倡做学问要“大胆想象，小心求证”，苏三的想象可谓大胆，而且岂止于大胆，简直是惊世骇俗、石破天惊，甚而不无荒唐臆断之处。苏三敢冒天下之大不违：

“三星堆”文明决非内生，它属于外来文明，其来源是“西方”。更具体而言，这个文明的创造者主体为红海沿岸古闪族人，以及沿途的伊朗人和印度人。

他们来华的路线不是北方的丝绸之路，最有可能选取的是南丝绸之路。

三星堆闪族人的迁徙有可能是一次性完成，也可能是数次积累。

迁徙的时间大约发生在 4 千年之前左右为多，最迟不会超过公元前 5 世纪。

中国的龙凤崇拜可能来源于这个外来文化，三皇五帝也与其有关。

这个外来文明的独立特征逐渐衰亡恰好在中国文字出现前后，所以在中国现有的史料中看不到对于他们根源的准确记载也是合理的。

苏三认为来到中国的以色列人主要构成了中国的夏、商、周，这些朝代很可能与中东母国曾经保持着神秘的联系。这种关系的动摇出现在东周，中国人彻底摆脱中东的控制是在战国时期。苏三对许多先秦文献提出了全新的看法，比如《诗经》等。

苏三的结论，很有些专断，但有趣味。我想苏三的意义在于飞翔的猜想，在于文学性置于历史之中。

苏三自己说，没有想象力的科学工作者肯定不是个合格的科学家，过分严谨实际上就是平庸死板，它不会给任何问题的解决留下合理的出口，只能在原地打转，只要思想不开放，我们几千年也走不出一个误区小圈圈。需要怎样的想象力来理解中国人的一贯保守倒是更需要一些想象力，常规在保守而平庸的中国人这里已经不够用了，此实为真正地保守“鲁风”真传。有些历史结论已经下几千年而没有人怀疑推翻，所以重新翻开中国的历史本身就是一场思想与学术的革命，也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心胸与自信心问题，然后才是文献与考古的技术问题。

三峡考古揭出一跨越五千年的完整“文化积层”

来自新华网 3 月 23 日报道：文物考古工作者日前在重庆市云阳县一人类活动遗址处进行发掘时探明，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代，人类在此都留下了痕迹，跨越 5000 年的掩埋“文化积层”层次非常分明，特别是自商周以来的活动遗迹十分完整清晰。此外，这里还发现了近千件文物。

这个遗址位于双江镇塘坊村码头、云阳县新县城外临江的一山崖缓坡地带。负责此项考古发掘的四川大学考古队从 2 月 28 日开始挖掘，20 余天就揭出了该人类遗址的起源和演变历史的轮廓。

据四川大学考古队领队、考古系教授罗二虎介绍，从目前出土的石器文物来看，人类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经营”这片土地，保存更为完整的文物自商周以来是“不间断”的，各个时期层面都有重要文物出土。所发掘出来的 4 个直径 1 米见方、形成时期初步判定为南宋的“螺旋式梯级灰坑”属首次在库区考古中发现，在全国也很罕见。其作用还未探明，估计与当时的一种信仰或风俗习惯有关。罗二虎认为，如此完整跨越 5000 年的“文化积层”十

分少见，应该是迄今为止三峡库区仅次于“巫山人”遗址的又一重大发现。

目前，遗址已发掘面积达 4000 多平方米，考古工作还在继续。

三峡首现唐卜甲将古代甲骨占卜史延后数百年

新华网重庆 3 月 21 日电 重庆市云阳县塘坊码头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20 日出土了一碎片状、可整理复原完整的唐代甲骨卜具，这是迄今为止国内首次发现的唐代“卜甲”。

这个“卜甲”为龟甲卜具，直径约为 15-20 厘米，上面烧制的卜眼分布规则、清晰可见。云阳县塘坊码头考古遗址为三峡库区三期文物发掘点之一，工作人员是在此遗址中一个名为“上岩寺”的地方发现唐代“卜甲”的。

据介绍，占卜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但通常的考古学认为，以龟甲或兽骨作占卜工具是远古时代的产物，尤其盛行于夏、商、周朝代，而且找到了大量物证加以证明。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华民族这一信仰文化也在演变，至魏晋时代，“卜甲”逐渐淡出。以前的考古学说认为，自唐代以来甲骨作为占卜工具的风俗可能出现了断档。

负责此处考古发掘的四川大学考古队领队、考古系教授罗二虎说，此次发现唐代“卜甲”，找到了甲骨占卜依然流传于唐代民间的实物证据，这一发现把中国古代甲骨占卜的风俗历史延后了数百年，也增补了一项考古上的空白。

山东齐国古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来自央视国际消息：具有地下博物馆之称的齐国古都临淄，3 月 26 日举行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启动仪式。

临淄有着悠久的历史，曾作为齐国的古都 800 多年。经历了春秋时期的桓公称霸、战国时期的威王称雄。姜太公、齐桓公、管仲、孙武、孙臧等一大批明君贤相、英才良将在这里施展过雄才大略。悠久的历史为临淄留下了大量的文物古迹，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3 处、省级 5 处，区内星罗棋布着 150 多座千年古墓，其中田齐王陵素有“东方金字塔”之称。另外还有“田旺遗址”等 300 多处古文化遗址，使临淄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文物大区。

作为春秋遗迹文化的代表，齐文化和西安的秦汉唐文化、北京的元明清建筑园林文化一起，构成了我国历史文化发展的完整脉络，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临淄区这次以“齐故城和田齐王陵”为主体申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工作，将进一步提高齐文化保护层次和开发水平，对保护好古人留给我们的珍贵的财富，保护好历史和现代文明传承的纽带起到积极的作用。

山西省文物保护全面推进“四有”工作

来自人民网报道：截至日前，山西省 119 处国保单位中，完成了前四批 56 处的建档工作，第五批 63 处中完成了 32 处勘查测绘工作。对已完成的档案文本，正计划进行数字化处理使整个“四有”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文物保护法》规定，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由各级政府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并区别情况分别设置专门机构或专人负责管理，称为“四有”工作。统一认识确定目标。加大“四有”力度。首先抓好国保单位，以国保促省保。明确提出了两个时间段的目标，即用二到三年时间，将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控地带全部划定并报省政府公布；用三到五年时间，完成全部国保单位和 50% 省保单位记录档案的建立工作，保证国保单位“四有”工作顺利推进。

划定保护区域范围。加快“四有”进程。省文物局采取抽调专人、组成分队、分片包干、保证经费的办法，先后抽调组织 50 余名专业技术人员，在各地建设规划部门的配合下，对 102 处除平城遗址外国保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控地带进行了逐处划定，2003 年完成了第五批 63 处国保单位保护标志的竖立工作，统一更换了前四批 56 处的保护标志。在划定晋国遗址、西侯度遗址、山阴广武汉墓群等大型遗址的保护范围后，就根据其地形特征新增竖立了保护界桩，界限分明，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保护作用。

建立健全保护机构。夯实“四有”基础。近年来，省文物局通过执法检查，推动保护机构建立，协同省人大进行文物执法检查，督促各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改进项目管理，带动保护机构建立，根据每年文物保护单位的维修计划，将建立保护机构作为硬指标，与立项、下拨经费相联系，按程序审批；注重激励引导，拉动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对于积极参与保护文物的组织和个人，不仅给予实实在在的支持，还通过选树典型、表彰先进，充分发挥示范和引导作用。

加强文博信息化建设。提升“四有”水平。省文物局对前四批 56 处国保单位的记录档案资料，进行了认真的整理、补充、完善和规范，并开始制作标准的档案文本；同时，对第五批 63 处国保单位进行全面勘查测绘。抓住全国文博信息化建设在山西试点的机会，从去年起开始将国保单位的建档工作纳入信息化建设工程中，已逐步把所有的档案文本包括照片、图纸等资料进行数字化处理。

山西首次发现一处大规模陶窑遗址

来自人民网消息：近日，山西考古专业人员在襄汾、新绛、稷山、河津等县对当地多处古文化遗址展开考古发掘工作，考古发掘又取得重大收获，将为山西省南部地区考古研究提供新的材料。

经考古界专家考证，此处陶窑年代久远，多属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距今大约在四千五百年至四千八百年之间，是山西首次发现的一处大规模陶窑遗址。目前已发掘清理出中国汉、宋、明、清时期的古墓葬五十多处，其中在新绛县孝林庄发现的古窑群极为罕见。此古窑群共有古陶窑十二座，每座陶窑均由窑室、窑底、火道、火膛构成。

该窑群遗址规模颇大，陶窑数量之多、分布密集、使用时间之长，都充分说明当时陶器制作已经初具专业化，对研究中国古代陶器生产分工化、陶窑史及陶器制造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山西闻喜发现 6 座金元时期砖雕墓葬

来自人民网消息：近日，山西运城市文物局考古工作者在闻喜东镇东三交村发现了一批砖雕墓葬，并立即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经勘察，墓葬系金元时期墓葬。

据悉，这批墓葬共有 6 座，虽出土器物不多，但其砖雕数量大，内容丰富，形象逼真，反映了金元时期晋南地区人们的生活、文化和民俗概况，为研究金元时期的社会生活、人物服饰、戏曲发展等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

山西武乡发现距今 4000 多年的龙山文化遗址

来自人民网消息：近日，山西武乡东村段发现距今约 4000 多年古文化遗址，经省文物考古专家鉴定，此遗址为龙山文化早期的生活废弃区。

经过三个多月的发掘，目前共发掘灰坑 20 多座、墓葬 1 座，初步推断死者为成年女性，

遗物有大量的陶片、少量的石器、古器等，陶片主要是灰陶，也有少量褐陶、红陶，分泥质、真砂两类，器类有盆、罐、斗、杯和石刀、石斧等，这些资料为研究当地龙山早期考古学文化与周邻文化的氏系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陕西岐山出土周人甲骨文 专家京城研讨其价值

本报宝鸡讯 日前，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故宫博物院等单位的考古学、古文字学、天文学和历史学等方面的权威专家聚集北京，就我省岐山县去年新发现甲骨文的价值和意义进行研讨，高度评价这一发现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去年12月14日，北大师生在岐山周公庙周围进行田野考古调查时，发现了两片共刻有55个文字的周代甲骨，经本报独家报道后，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在这次由北京大学等单位发起召开的研讨会上，专家认为这两片甲骨出土地点具体、地层关系明确，从钻凿形式和刻辞文体来看，其属周人甲骨无疑。从整治的痕迹来看，两片龟甲均是从背甲中线对剖开的，这种切割方式也见于殷墟甲骨。甲骨刻辞内容丰富，首次在周人甲骨文中发现的“哉死霸”月相辞，将改变学术界对西周初期历法的认识。特别是结合该遗址曾屡出商末周初的青铜器和周代砖瓦等建筑材料分析，说明周公庙遗址是一处大型聚落遗址。有的专家预测，此处很有可能是周太王迁岐最早落脚之处。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两片龟甲的发现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为研究周人早期历史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同时，他们还建议要做好该遗址的保护工作，开展深入的勘探发掘，掌握更多的资料，推动研究工作。

据悉，岐山县人民政府已将该遗址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竖立了保护标志碑，成立了保护小组。周原考古队已进行了初步勘探，全面发掘工作也将于下月正式开始。

四川发现我国年代最早的汉代摩崖石刻

来自新华网成都3月27日电：一块距今已有1900多年历史的东汉石碑“何君阁道碑”日前在四川雅安市荣经县被发现。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东汉摩崖石刻，其记载极有可能改变人们对“南丝绸之路”路线的认识。

据四川省荣经县博物馆馆长高俊刚介绍，“何君阁道碑”位于距荣经县城约20公里的烈士乡冯家村穿山洞，是这个县民建乡小学教师刘大锦和牟建在河里游泳时发现的。而此碑至今得以完好保存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碑体被一个上凸下凹的岩石腔保护着，从而免受了风雨的侵蚀。

记者在冯家村穿山洞看到，篆刻在光滑平整岩石上的“何君阁道碑”呈正方形，边长约0.8米，碑文记载了东汉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蜀郡太守何君令人在此修建古栈道的事迹。碑文中的52个隶书字，字迹清晰，笔画简洁，字形方中带圆，雄浑古朴。

高俊刚介绍说，此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汉代摩崖石刻是陕西省汉中的“郾君开通褒斜道碑”，刻于东汉永平六年（公元63年），这一石刻记述了汉中郡守郾君及其部属开通“褒斜道”（古代著名的跨越秦岭的通道）的情况，是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雅安市文物管理所所长李炳中介绍，“何君阁道碑”不仅是研究古代栈道修建的珍贵文献资料，同时在汉字的发展演变史研究上，也是极其重要的实物研究资料。

李炳中所长称，这块摩崖石刻的发现还极有可能改变人们对“南丝绸之路”路线的认识，对研究西南地区的交通史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从一定程度上说明，汉代以来经过荣经县的“南丝绸之路”与现在的国道108线荣经段相一致。据史书记载，“南丝绸之路”经荣经县安靖

乡和凤仪乡，翻越大相岭到康定的路线始于秦汉时期，但从发现的这块石刻看，这一路线很有可能是隋唐以后才出现的。

目前，“何君阁道碑”已经被有关部门保护起来，有关专家已赴荣经作进一步的考证。

新疆搜救出 9000 多件民族古籍

来自央视国际消息：我国少数民族古籍搜救工作近日在新疆取得突破性进展，目前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间收集到的即将失传的少数民族古籍已达 9000 多件。

搜集到的这 9000 多件民族古籍由回鹘文、察合台文、波斯文、乌孜别克文等 13 种文字写成，内容涉及语言文学、历史、宗教、医学、数学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为各学科的学术研究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

新疆地处亚洲腹地，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中亚文化曾经在这里会合交流，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此次搜救成果将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提供宝贵的科学依据。据了解，目前在新疆民间还保存着大量少数民族古籍需要进一步搜索。

重庆发掘三峡库区“墓葬王” 所葬何人仍未知

来自新华网消息：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日前在重庆市万州区内发掘出一个规模特别大的墓葬。负责发掘工作的彭学斌告诉记者，这是目前三峡库区考古发掘中发现的最大墓葬，是名副其实的“墓葬王”。在万州区武陵镇下中村发现的这个“墓葬王”，是西汉时代的墓葬。整个墓葬长 11.2 米，宽 9.4 米，深 9.5 米，沿着墓葬边沿，还有一条长 11 米的墓道。在墓葬里，考古工作者发现了 20 多件东西，包括陶器、铜器，不过都是残片。从发掘的情况分析，考古工作者认定这个墓葬曾经被人盗过。发现墓葬后，考古工作者通过多种渠道，极力想找到这个“墓葬王”的主人，但一直没有结果。

据彭学斌介绍，这个“墓葬王”是在一个名叫大丘坪的墓葬群里发现的。大丘坪墓葬总面积有 6 万平方米，属于三峡库区三期考古范围，计划总发掘面积为 2 万平方米。从去年 11 月至今，考古工作者已经在这里发掘出了 28 座古代坟墓，出土陶器、瓷器、铜器、铁器、漆木器等 800 多件。从这些器物可以看出，这些坟墓分别属于战国晚期、西汉早期、新莽时期、东汉时期、三国时期和南北朝时期。彭学斌说，从这个墓葬群可以分期比较研究不同时期三峡库区的历史。

目前，考古工作者一方面正在抓紧野外发掘，另一方面正在清理和修复已经发掘出来的器物。他们要根据不同的器物组合和墓葬形式，研究三峡库区不同时期的丧葬习俗、经济水平和文化现象。

郴州西晋简牍是宝贵遗产

来自央视国际消息：自 2 月 10 日湖南郴州出土第一枚西晋简牍开始，至今已经出土了 600 多枚埋藏了 1700 多年的西晋王朝简牍，超过我国历年出土西晋简牍数量的总和。由于西晋王朝历史短暂，史料记载不多，这批简牍对研究西晋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书写在简牍上的政府文书、档案，将成为我国书法爱好者的学习宝库。

一批书法研究专家、考古专家经过研究认为，简牍上的文字反映出晋代书法艺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大部分文字字体属于楷书，但笔法、结构还有很多隶书的痕迹，显示当时的书法正是从隶书向楷书转变的阶段，楷书已经基本成形。这样多的简牍文字对于研究隶书、楷书的演变过程具有重要意义。这 600 多枚西晋简牍在我国书法史上将占有重要地位，是宝贵

的书法遗产。

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大突破：陶寺城址考古

对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的考古发掘,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世界意义。历经3年探测,已获重大成果(见人民日报2004年1月30日有关报道)。它不仅确证了5000年中华文明及其生生不息的延续性,而且为我们托出了一个清晰可鉴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广泛认识价值的尧及尧的时代,并以其自身长久积淀的文

明印痕遂使4700年前的人文社会景观突现眼前,在强烈的视觉冲击中引发出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与古代文明的诸多现实回应与理性思考。

—

陶寺,位于襄汾县东南隅。这次陶寺古城址的发掘自2001年春天开始,迄至2003年秋天,已获得重大成果。3年来,共发掘面积1500余平方米,钻探面积30多万平方米。发掘位置介于襄汾县陶寺村与中梁村、宋村、沟西村、东坡沟村之间。从考古发掘中所获得的重大成果,主要是发现并确认了陶寺早期小城、宫殿区和中期大城及墓葬,从发掘出土的陶寺城址的南墙和东墙遗迹中可以作出推测和判断其城址平面为圆角长方形;发现并确认了陶寺城址中的祭祀区和宫殿核心建筑区;发现并确认了陶寺城址的中期墓葬群和大量史前珍贵文物;发现并确认了陶寺遗址中的古观象台、仓储设施和此前发现的扁壶朱书的“文字”符号、龙盘、土鼓、特磬、彩绘陶簋、玉琮、玉璧、玉佩、玉兽面、玉钺、玉戚等礼器、祭器与陪葬品;另外,还出土了一件至为宝贵的铃形青铜器——这是中原地区龙山文化中惟一的一件具有成熟造型的青铜器。

从陶寺考古发掘中获得的所有成果,都具有重要价值,它们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也都是划时代的。

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大抵都遵循了一个规律,即从“部落联盟”进入到“国家文明”。而酋邦制则恰恰正是这一飞跃式过渡中的中间环节,它既具有一定的部落联盟的痕迹,同时又更具有国家的特点和性质。陶寺考古发掘的重大收获和重要意义,就在于它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实物与资证。

1.城邑

城邑是伴随着部落的出现而出现的,但真正意义上的城邑的建构则是始于酋邦制社会之初的。因为城邑,特别是都邑,往往是国家形态的构件和国家文明的象征。《帝王世纪》中曰“自黄帝以上,穴居而野处”,“及至黄帝,为筑宫室,上栋下宇。”这说明,人类在进入部落时代后,就已开始筑屋而居了,但还未形成城邑。只有在进入了酋邦制社会之后,才逐渐出现了功能较为齐全的城邑。城邑的出现,一方面固然是为了聚居的需要,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为了适应国家机器能够得以集中而正常地运作的需要才应运而生的。它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正如恩格斯所说“在新的设防城市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

陶寺城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同时也确实秉有这样的性质和功能。

对于一个初具国家形态的酋邦之城邑来说,其必备的要素是街区屋舍、宫殿群落、祭祀建筑、墓葬区、观象台、水井、道路和仓储设施等。所有这些,在对陶寺城址的发掘中不仅都找到了,而且其规模之大和典型性也都是超乎寻常的。尽管陶寺城址在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时期中是不断地发生着局部的迁徙和变更的,但还是发掘出了城址的大致范围和主要建筑物的遗迹。如中期宫殿核心建筑区的道路、壕沟、墙基、台阶、桥墩、豁口、斜坡、槽壁等,都从夯

土与生土的间隔、堆积层的迭压,以及人工筑成的版块中约略显现出来,特别是从这些城址遗迹中,还可以明显地看出当时是采取了先进的仰斜式基底逆坡挡土墙式的夯筑方法,在做夯土桥墩时则又采取了先进的柱下杯形单基础的形式。从这些城址遗迹中,人们可以清楚地辨别出哪是宫殿,哪是屋舍,哪是祭坛,哪是宗教设施和观察天象的特殊建筑,哪是具有仓储功能的仓储区和分为不同阶层的墓葬区。在城址的祭祀区,人们甚至还可以清楚地看出由三道呈月牙状的夯土墙和台基组成的以观天授时功能为核心,兼有祭坛功能的大型建筑。对于陶寺早、中期宫殿核心建筑区的认识,尽管只是发掘出一条位于其北围沟边缘的北出入口的路基,但也足以证明这里就是宫殿核心建筑区的所在。

由于年代太久远了,加之即使是在尧的时代,陶寺城邑也经历了早期、中期的多次变迁、扩建和重建。在这样的情况下仍能够留下现在这样的遗迹,确实是难能可贵的。更重要的是,从这些城址遗迹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当时城邑的建筑规模和宏伟气象,特别是各种标志性建筑,如宫殿、祭坛、天象台,以及仓储区、墓葬区、街市区和道路等遗迹的出土,更说明陶寺城址在当时不仅是典型的城邑,而且是一座气势宏大的“王都”。由此可以证实,尧确实是建都平阳。陶寺距离临汾古平阳大约 30 公里,由于历史上行政区划和地域称谓的差异所致,我们完全可以判定陶寺城址即尧建都的地方,也即平阳之所在。

2. 文字

文字,是文化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元素符号,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的原创性标志和初始性记录。人类社会的真正的文化与文明,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正是从文字的诞生而开始的。当然,文字本身也是随着文化与文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据传,汉字的最早发明者为仓颉,他是黄帝的史官,大概是为了记录历史才发明了文字符号吧,在我国早期的文献典籍中,如《韩非子》、《淮南子》、《史记》等,都有“仓颉作书”的记载。

虽说仓颉造字始于黄帝之时,但由于漫漫岁月的湮没,于今已很难寻觅踪迹。可幸的是,在陶寺城址的考古发掘中居然发现了迄今为止中国最为古老的文字遗迹,这就是在陶寺城址的晚期居址中所出土的一件陶扁壶上用毛笔朱书的字符。这件残破的扁壶,出土于陶寺城址内 I 区的灰坑 H3403,在陶质扁壶的正面鼓腹部用毛笔蘸红颜色写有一个“𠄎”字,而在扁壶平直背面另有同样用毛笔蘸红颜色书写的两个字符,即“𠄎”。对于前者,可以隶定为是“文”字;对于后者,有一种观点,认为是甲骨文、金文中“𠄎”字的古写。这样一来,扁壶上的三个字符,就可以隶定为“𠄎”字和“文”字两个字。用这两个字组词,便可成为“文”,而“文”又即“明文”也。“明文”则可以解释为是记述尧的功绩与德慧,并用朱书的方式传诸于后世,弘扬于九州的。此外,另有学者比照甲骨文的字形字义,将这三个字符演绎为“建在黄土高塬(兀)上的高大的夯土城”。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三个字符可以隶定为是“文尧”二字,其义为对尧的懿赞和尊称,因为《尚书·尧典》中说“曰稽古尧帝,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克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这意思就是说,尧的治国方略、淳尚道德和崇高威望,必将光照四方,必为后世钦敬。即使在尧离开帝位之后,人们也怀着崇敬之情尊其为文祖,并修建祖庙以祀其文德(见中国文物报 2003 年 11 月 28 日何弩文)。

不论哪一种隶定和义释,都是对尧的文治武功和懿行嘉言的肯定与颂扬。当然,这三个字符的重大意义显然并不只在于它的具体含义,而更重要的还是在于它的存在和出现。因为它的存在和出现的本身,就已经把中华文明推演到了 4700 年以前。还因为在任何时候,文字都总是文化与文明的最基本和最典型的表征与体现,更何况这三个字符是迄今为止考古所发现的中华民族的最早和最古老的成形的文字记录。当然,单从字符的意义上说,陶寺扁壶上的朱书文字,是不能算做最早和最古老的,因为在它之前,从山东丁公龙山文化遗址中就已发现过更为简单的

字符,甚至在距今 7000 至 4500 年的仰韶文化遗迹中也已发现过字符,如郭沫若就曾对从半坡遗址中发现的字符作过如下评说“其意义至今虽未阐明,但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如花押或族徽之类。”但是,陶寺字符与所有此前发现的字符相比,均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字”的成分多了,“符”的成分少了,且变随意刻划为正式书写;二是陶寺字符不但是伴随着趋于定型的社会形态和国家形态的出现而出现的,而且也明显地赋与了富于社会性和智慧性的文明含义。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认为陶寺字符是迄今为止在考古中发现的中华民族的最古老和最典型的文字符号。它的价值,绝非此前所发现的所有字符可以与之同日而语。正如恩格斯所说,人类由愚蛮向文明的过渡,正是“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才得以实现的。

3. 器物

器物是劳动的结晶,是智慧的创造,也是文化与文明外化和物化的标志。因此,认识、衡量和评价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形态,其所制造和拥有的器物是非常重要的依据,特别是在对人类早期社会形态及其发达程度的认识与评定上,器物的重要价值和作用就尤为突出与显赫。比如从石器到青铜器再到铁器的制造和使用,就成为划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重要尺度与界标。因为器物既是人类智慧和劳动的产物,又是促进人类智慧和劳动进一步发展的工具与动力。阿基米德曾经说过,只要给他一只杠杆,他就能撬动起整个地球。这虽然不无夸张,但也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说明了工具即器物在促进生产力发展与社会进步中的巨大作用。

尧所处的时代,是龙山时代早期,也是人类冶铜、锯木、制陶、砺玉的时期。所以,在陶寺城址及墓葬中所发现的器物已经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和精致性的特点来。当时,陶器的使用已经相当普遍了,以致至今在陶寺城址的发掘现场人们还随处都可以捡到破碎的陶片。从这些随处可见的陶片中,完全可以看出当时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在尧的时代,墓葬也已相当讲究了。有墓圻,有墓龕,有尸床,有船式的棺板和大量的随葬品。从这些墓葬中所出土的器物主要有玉钺、玉璜、绿松石饰件、子安贝、白玉管、天河石、骨镞、漆木器、彩绘陶器、草编物、青石大厨刀、木案板、红彩漆筒形器、漆柄玉石兵器、漆木盒、彩绘陶簋、彩绘漆觚形器、玉兽面、大圈足盆、折肩罐、玉璧、小口圆肩罐、直口盆形器、釜灶、单把鬲、圈足罐、石钺、玉琮、璜形玉佩,以及“仓形器”、铜器等。

所有这些器物,在当时来说,都堪称是空前丰富和精美的,这也从一侧面反映了尧的时代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和人的智慧所开发的程度。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仓形器”和铜器。

在陶寺遗址所发掘的 1300 余座墓葬中,其中有 6 座大墓中均置有“仓形器”各四五件。“仓形器”为一圆柱体,顶上呈蘑菇形,圆柱体周围等距离凿有 3 个凹形小洞,外壁敷施红彩。每个“仓形器”旁边皆附置有骨质匕首一件。骨匕呈扁平状,外表光滑,柄端钻孔,另端磨为钝刃,体长 22.3 厘米,体宽 2.2—3.4 厘米。此“仓形器”作何用呢一种倾向性的认识是将其视为“棖”的代替物。“棖”乃为在缫丝过程中为缠丝所用之器物。以其作为陪葬物大约是代表一种身份和一种享受吧,因为丝绸在当时是一种高贵的奢侈品,而缫丝在当时则代表了先进的生产技能和高度的经济水平。

如果说“仓形器”在陶寺遗址中是一个罕见的发现,那么,一件铃形铜器在陶寺遗址的出土就更是一个罕见的发现了。因为在龙山文化遗址中虽然多次发现了铜,但成形的铜器却极少。例如在龙山文化的中枢地带河南淮阳平粮台、郑州牛砦、临汝煤山等遗址中所发现的铜,就均为渣、块状,概无成形的器物。而如今在陶寺遗址中所发现的铜,却是一件近乎精美的铃形的铜质器物,这也可以说是龙山文化中惟一的一件成形的青铜器。它长 6.3 厘米,宽 2.7 厘米,高 2.65

厘米,其化学成分为含铜量占 97.8%,含铅量占 1.54%,含锌量占 0.16%。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陶寺文化属于龙山文化的初始阶段,在这个时候竟能冶炼和铸造出如此近乎精美的青铜器,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

4. 礼仪

礼仪的形成,不仅是文化与文明的产物,而且是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而不断地趋于完备的。“礼”之所以能够成为孔子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实在是当时的社会实践使然。因为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从部落时代开始礼仪就已经出现了。图腾崇拜、太阳崇拜、祭祖祭神、会盟结社、占卜观象、设坛立庙等活动,远在仰韶文化时期就已经广泛地渗透在人们的生活与意识之中了。在距今 6000 年之久的半坡遗址中,就有杀头祭屋的考古发现。至于太阳崇拜之类现象,则可以上溯到原始社会的肇始时期了。正因为如此,美国学者伯恩斯与拉尔夫在《世界文明史》中才特意指出“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最重要特点也许是制度的发展。一种制度可以下定义为就是群体信念为了满足群体的某种需要而以比较固定的形式组织在一起的群体行动的结合物。制度通常包括这一套习惯和传统,一系列法规和准则,以及物质的延伸,如建筑、惩罚手段、沟通和训诫机构。由于人是社会的人,这些成分有些大概是从很早的时代就开始即已存在,但完整形态的制度看来是新石器时代的一项成就。”

陶寺考古发掘中的礼仪遗迹,就从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证实了当时社会的文明程度、发展水平,以及国家形态与生产力所达到的高度。

首先是庞大的祭祀区遗址的面世。在陶寺城址祭祀区内,不仅建筑面积大,而且祭坛、台阶、路沟、角门等一应俱全,设计和夯土都十分讲究,出土的祭祀器物也十分丰富。有龙盘、玉钺、特磬、土鼓、肥足鬲、小口折肩罐等,特别是其中的彩绘龙盘,不仅色彩艳丽、图饰精美,而且尚有代表酋邦首领权力的象征意义。我们完全可以从商周时代青铜器上的花纹设计样式作出判断陶寺彩绘龙盘对后世礼仪文化的发展,乃是产生过重大影响和具有着深远意义的。

其次是庞大的墓葬群和丰富的陪葬器物。在陶寺城址发掘中,先后发掘出墓葬 1300 余座,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不仅出土了大量文物,即陪葬品,而且从墓葬中坑与棺、尸与物等的设计和摆放中,还可以看出是很有讲究的。其大都为竖穴土坑墓,一般墓坑为圆角长方形,如中期大墓 M22,开口长 5 米,宽 3.65 米,底 5.2 米,宽 3.7 米;墓底距地面 8.4 米;墓向 140 度。在陡直的墓壁四周均敷以草泥,并伴有精良的装饰。大墓的四周掘有壁龛若干,用于放置随葬物品。棺,是由一根整圆木挖凿而成的船形物,一般长约 2.7 米,宽约 1.2 米,高为 0.16—0.3 米,板材厚度 0.03 米,头端挡板与壁板和底板连为一体,脚端挡板向里回缩 0.9 米,嵌入棺体之内充当挡板之用。整个船棺的内外皆涂以红色。尸床平形嵌入船棺底部,尸床上除置以墓主尸骨外,还另外放有一些随葬品。船棺底下铺有一层厚约 1 毫米的絮状物,现已变为朽灰,大概是为了预防潮湿侵蚀棺木而特意放置的隔潮物吧,从棺内坑内及填土层中所发现的物品,主要有苇杆、红色绸块、子安贝、绿松石珠等。从整个墓坑、墓棺及随葬物品的布局与摆式中,可以看出完全是遵循礼仪之规而为之。特别是在陪葬物品中,更是按照墓主的不同身份而大有区别。有的随葬玉器、漆器、彩绘陶簋,有的随葬骨簋、公猪、兵器、青石厨刀,有的甚至在墓室中摆放着一劈两半的猪肉坯子多达 20 片,合计有 10 头猪之多。所有这些,都说明在陶寺文化的中期,人们的丧葬观念和礼俗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一改往日随葬陶器、木器、石礼器的习俗,而以玉器、漆器和彩绘陶器等取而代之了。当然,发生这种变化的基础,是生产力的空前发展和文明程度的空前提高。

再其次是观天象、祭天神。这一点在陶寺文化中的表现尤为突出。从陶寺城址中发现的“观象台”就是一个最为典型的例证。尧的时代对天文历法的贡献是空前巨大的。尧不仅自己“其仁如天,其知如神”,而且亲自下令派遣羲和、羲仲去管理历法与授时,并测定了一年的

天数、二十四节令和四季。毫无疑问,“观象台”遗迹的发现,证实了《尚书·尧典》上所说的“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真实历史背景与社会现实。在史前时期,由于科学不发达,所以王者往往是将为政与为巫结合在一体的。只有这样,才能更有威望和更具号召力。正如基庭所指出的那样“宗教可视为一种启动剂或催化剂,它提供了控制群众的一种途径,从而奠定了控制重要生产资源的基石。”特别是在古代酋邦社会中,几乎酋长与巫师就是一个等同的概念,“民神杂糅”的现象十分普遍。观天象在当时并不是作为科学而是作为巫学的,而巫学在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确是不可低估的。这无疑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特定社会涵负与精神现象。事实是,如若没有“巫”的配合,也就不会有发达的中国古代文明的出现。因此,观象与崇“巫”,在史前社会中都应当归属于礼仪的范畴,也都会产生礼仪的效应。显然,“礼”在史前社会中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也是一种很重要的制度与民俗。《通典·礼一》中对“礼”的特点、性质和功能曾作过如下概括性描述“夫礼必本于太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其降曰令,其居人曰义。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理人之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故圣人以礼示之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

由此可见,陶寺城址所出土的各种与礼仪相关的遗迹和器物的意义之重大、之非凡。

二

文化是文明的果实,文明是社会的结晶,社会是历史的寒暑表与脚步声。而从科学的意义上作考察,人类社会有文字以前的一切历史都必然和必须是经过考古佐证的文化与文明的产物。陶寺考古的意义正在于此。它以自己独到的发掘和发现,不仅证明了山西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根祖之源,而且也证明了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惟一赓延至今的最古老和最优秀的人类文明。

从 2000 年我们提出“华夏文明看山西”的文化理念和旅游主题,至今已有 3 年多的时间了。3 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有意义的工作,并收到了预期的效果。特别是通过常家庄园的历史博览、“百名山西历史人物画展”、确立和建构“晋文化”学术地位与历史格局、寻访龙山文化遗迹及加强对尧、舜、禹历史地位的探寻与认同等一系列活动,使山西成为国内外瞩目的历史文化的荟萃之地与关注焦点,在引发学术界热情眷顾的同时,更招徕了络绎不绝的考察者、参观者和旅游者。

华夏文明看山西,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命题和时代命题。我们在提出和回答这个重大命题的过程中,不仅有着坚定的信念和巨大的热情,而且也始终保持了冷静的理性思维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我们说“华夏文明看山西”,当然并不是说只有山西才有华夏文明,而只是从特定的视域出发,给予山西所拥有的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以充分的理论诠释与合理的历史定位。作为历史唯物论者,我们对任何历史的评判与诠释,都应当以事实为根据。而正是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给我们的设论作了极为有力的确证与支持。这就是陶寺考古的新发现和尧文化的丰富遗存。

显然,我们现在再说“华夏文明看山西”,无疑要比 3 年前更自信和更有理有据了,因为陶寺考古发掘已以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证明了中华文明最早、最有根据和最完整最庞大的社会文明遗迹就在山西。

陶寺文明遗迹作为文明国家的序幕和起源的历史见证,其重大意义有二一是为中华民族 5000 年文明史作了考古确证,将中华民族有考古成果资证的历史向前推进了 2500 年以上,从而改变了长期以来以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 841 年作为中华文明纪年之始的传统做法,遂使 5000 年中华文明从此得到了初步的考古证明。二是证明了中华民族不仅有 5000 年的文明史,而且这 5000 年尚是一环套一环,一直延续发展至今的。在过去,所谓“三皇五帝”,也都只是民间传说,甚至只是神话传说。这就使 5000 年中华文明有一大半悬了空,得不到史迹证实,一段时期国际上一些学者只承认中国有 2300 年的文明史。陶寺考古发掘的巨大意义就在于,它通过对尧及尧

的时代的都邑和墓葬遗址的发掘,寻获了当时的大量文物遗存,从而使尧、舜、禹的时代不再是传说,而是成为了确凿的历史。从尧的酋邦制时代到夏,大约 700 年左右,夏、商、周三代到公元前 841 年,大约 1300 年左右,从共和元年至今,大约 2800 年左右。这三个数字加起来就是 4800 年左右,中华民族 5000 年文明史,由此得以确定。陶寺考古的意义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如若单从文明史的久远程度上看,在世界范围内起始于公元前 2000 年以上的并非绝无仅有。但无一例外的是,所有这些古文明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都发生了断裂,也都早已成为失落的文明。而只有中华文明从萌生至今不但未曾有过丝毫的断裂,而且一直在环环相扣、步步相衔的丰富和发展中延续至今,迤邐绵亘了 5000 年之久,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特别是像我们今天所沿袭的文字、历法、礼制,我们今天所遵从的道德规范和审美矩度,可以说有相当一部分早在尧的时代就已经出现了雏型。换言之,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中,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从尧的时代就开始形成并经过不断发展而来的。

在陶寺考古发掘中,大量遗存都在为这个事实提供着极为有力的佐证。特别是文字、礼制、城墙、宫殿、祭坛、器物、仓储、“王墓”、“观象台”等,都是极为罕见的文物瑰宝,也都是我国迄今为止年代最为久远的最具代表性和最典型、最丰富的发现。这些遗存,不仅在有力地资证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悠久而灿烂的历史,而且也在显豁地阐释着我们中华民族的坚定的前进步履和丰富的精神内涵。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尧的时代虽然是一个酋邦林立的时代,但多数酋邦也已具有了国家的特征与性质。这其中,尧的酋邦无疑是当时最为发达和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因为从对陶寺遗址的发掘中可以看出,它已初步具备了文字、城市、礼仪和青铜器等作为国家文明标志的四大要素。一般说来,在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社会的组织形式为“游团”;在仰韶文化时期,社会的组织形式主要为部落;在龙山文化时期,社会的组织形式为酋邦。尧、舜、禹的时代属于龙山文化时代,其社会组织形式自然以酋邦为主了。所谓“酋邦”,实际上就是国家形态的雏形,或者说是为建立完型国家形态而所经由的必不可少的探求与演试。事实是,紧接着尧、舜、禹的夏、商、周,便已经正式进入了国家形态,成为中国历史上典型的奴隶制社会的开始。黄帝、颛顼都只是建立了部落,而从尧开始建立酋邦,则标志着一个巨大的飞跃——向国家形态的过渡和对国家形态的构建。

对于此,从陶寺考古发掘中便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丰富的尧之都邑文物证实了《尧典》中的记载大体上是准确的、可信的。这也进一步反证了陶寺考古的巨大价值与重要意义。

陶寺城址的考古发掘及其丰富的出土文物,不仅确证了中华民族 5000 年的文明史,而且为我们提供了一幕远在 4700 年前的轮廓清晰的贤能的帝君形象与昌明的时代景观。它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同样都是深刻的和巨大的。

这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这更是山西人民对中华文明的巨大贡献。因为陶寺在山西,尧都在山西,那个虽然逝去了但却永生着的贤能帝君与昌明时代在山西。



“地方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征文

以地方志和家谱为主要代表的地方文献,对于地方建设和学术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如何更好地利用这部分文献的价值,是所有地方文献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也是需要从事此项工作的人进行广泛交流的课题。据此,中国国家图书馆兹定于2004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地方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诚请海内外地方文献收藏及研究的单位与个人,共同就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研究和利用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现将研讨会征文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征文主题: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研究与利用

二、征文分主题:

- 1、地方文献的收集和整理
- 2、地方文献专题研究
- 3、地方文献与社会发展
- 4、地方文献的研究现状与前景
- 5、地方文献的数字资源共建共享理论与实践

三、征文要求:

1、国内作者提交中文稿件一份,海外作者同时提交中英文稿件各一份。另外通过E-mail或3.5寸软盘,寄送文稿电子版,稿件编辑请使用word97或word2000,打印统一用A4纸。

2、文章正文中文不超过6000字,英文不超过6000词。同时提供中英文摘要。中文不超过500字,英文不超过500词。另附关键词3-5个。

3、书写顺序:标题,作者姓名,作者单位,邮编,摘要,关键词,正文,注释,参考文献。

4、截稿日期:2004年6月30日(以当地邮戳或E-mail发送日期为准)。

5、征文经审阅后,入选者将参会交流,并结集出版。

6、请自留底稿,入选与否概不退稿。

四、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国家图书馆分馆

邮编:100034

电话:010-66126165

传真:010-66174367

E-mail: dfwx@nlc.gov.cn gqzljz@nlc.gov.cn

联系人:张廷银 石剑

中国国家图书馆
二〇〇四年二月一日

近代史所召开关于“中国知青与口述历史”学术报告会

本报讯 近代史所政治史研究室日前召开关于“中国知青与口述历史”学术报告会，刘小萌研究员做了“中国知青问题与口述历史”的主题发言。

刘小萌在学术报告中介绍了中国历史上的口述史和西方口述史的由来发展以及国际上流行口述史的有关情况；介绍了目前国际上口述史的理论和方法；介绍了他用一年时间从事中国知识青年口述史实践的原因、内容和特点，以及口述方法的价值与局限。

学术报告后，与会学者就口述史与文献资料的关系、口述史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中国史学研究与国际接轨、如何解决口述史的真实性等问题进行了研讨。有学者认为，口述史与文献资料可以互证，刘小萌采访撰写的《中国知青口述史》从学术规范来评价，是目前最地道的口述史。有学者认为，口述史可以弥补文献资料的不足。文献资料也有不真实的，辨别真伪是任何一个史学工作者无法回避的问题，口述史同样也存在真实性问题。因此，写出真实的历史是一件艰苦的工作。

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在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历史中，经学一直是社会的指导思想，自《庄子·天下篇》、《汉书·艺文志》以及后世关于经、史、子、集的文献分类等等，有关传统的思想文化的陈述都是以经学为纲统合子学的。后世无论多么伟大的思想家，其影响都是无法与儒家六经相比的。而两千年间的一般知识分子可以不读诸子百家之书，但很少有不读儒家经典的。若一部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著作不包括经学的内容，你能说它是信史吗？即以子学而言，中国思想家（哲学家）的问题意识，多是从经学衍生出来的，许多哲学命题所讨论的正是经学中的问题，你如果不懂经学，如何能正确的理解那些命题呢？

然而，经学又确是一门难度很大且很麻烦的学问，陷入其中便难以自拔。许多学者也知道经学在中国思想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但却望而生畏，不敢去碰它，于是避重就轻，单写历史上思想家的思想，编纂在一起而名其为中国思想史（或中国哲学史）。这个工作未免简单了一些。

从事中国经学史研究的也另有其人，最有代表性的前辈学者当推皮锡瑞和马宗霍。皮锡瑞著有《经学历史》，马宗霍著有《中国经学史》。我们对这一类著作也不能满意。此类著作的基本资料和问题意识来自于正史中的《儒林传》以及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朱彝尊的《经义考》等，将其中有关经学传承演变的资料串在一起，而略以己意评断。这类经学史著作只可视为经学传承史，它的要害是缺少“魂”，即关于经学的主旨、关于经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价值本源的重要意义，未曾有所揭示和阐扬。正如徐复观先生所批评的：中国过去涉及经学史时，只言人的传承，而不言传承者对经学所把握的意义，这便随经学的空洞化而经学史亦因之空洞化。更因经学史的空洞化，又使经学成为缺乏生命的化石。……即使不考虑到古代传统的复活问题，为了经学自身的完整性，也必须把时代各人物所了解的经学的意义，作郑重的申述，这里把它称为“经学思想”，此是今后治经学史的人应当努力的大方向。（《中国经学史的基础》，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版，第208页。）

经之所以为经，就在于它所倡导的价值观。所以“经学思想”即是关于经学的“价值”和“意义”的思想，徐复观先生呼吁开展“经学思想”的研究，并认为“此是今后治经学史的人应当努力的大方向”。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无一部系统完整的中国经学思想史的著作。

综上所述，以往的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缺少“根”，即经学，而以往的中国经学史又

缺少“魂”，即价值和意义，因此要想写一部有“根”的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须先写一部有“魂”的中国经学思想史。我们应该丢掉“东施效颦”式的思想方法，写出透着中国精神的思想史和哲学史，即以意义的信仰为本质特征的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二

五经（后来增加为十三经）是中国文化的原典，它反映了中国先民对人类所关心的重大问题如自然、社会、人生的思考，具有多方面的原创性，后世许多思想都可以从中找到最初的原型，由此而形成中华民族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

在中外思想史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尽管思想在不断进步和发展，但在形式上却一次次表现为向原典的回归运动，以致西方有人说：一部西方哲学史，不过是对柏拉图诠释的历史。实则这种现象在中国思想史上表现得更为典型，我们有理由认为，一部中国思想史，不过是对儒家经典诠释的历史。诠释并不是一种简单重复的过程，而是一种再创造的过程。经典诠释活动常常反映出人们在新的与旧的之间、活的与死的之间进行选择的制度焦虑与人生焦虑。一部经典诠释的历史，即反映一社会共同体文化思想新陈代谢的历史。

以往的经学研究，着眼于记叙经学发生、传承、演变的过程，如记叙历史上哪些书被作为经典立为官学，什么人曾经传经，什么人曾为之作注作疏，不同的注疏之间的异同比较，哪种注疏悬为功令，成为钦定的科举考试科目，如此等等。

而我们所要追询的是，经学所赖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社会需要是什么？推动经学发展的持续的历史动力是什么？它所反映的仅仅是统治阶级的权力意志，抑或也是社会共同体价值规范的反映？我们的目标不是把经学当做一种古董知识来了解，而是通过经典诠释来透视其时代的精神和灵魂；不只是对经学演变的历史轨迹作跟踪式的记叙，而是对经学演变的历史原因作出解释；不只是流连那汗牛充栋的经注的书面意义，而是把它当做中国古代价值理想的思想血脉来理解。

开展“经学思想”的研究，要克服“五四”以来对经学认识的片面性和武断性。“五四”以来，经学被当做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被简单地称为“经学教条”和“封建性的糟粕”。当时激进主义的学者吴稚晖曾说把线装书放进“茅厕”，三十年以后再研究。可是七十年已过去，研究经学的人仍寥寥无几，经学几乎成为绝学。近二十年来，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即经学研究一直没能走出“五四”以来的低谷，因而对经学的认识一直停留在原有的陈旧的观念上。我们认为，儒家经学是中国文化的根干和价值本源，经学研究倍受冷落的局面亟待改变，应将经学的研究纳入思想史的范围，并给予它应有的历史地位。

首先应当对“规范”加以规范

近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出版，又一次引起了人们对语言文字规范的关注，也引发了学界的争论，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对于“规范”的不同认识。

某些媒体宣传说，《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是我国第一部规范词典”、“意在全面贯彻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语言文字方针政策”、“严格按照国家颁布的所有规范标准编写”、“以汉语言的规范为使命，并在语言规范上下了很大工夫……不同于以往任何一部辞书”、“在语言规范方面，这本词典应该取得了更高的成绩……在语文生活中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等等。

对于此等宣传，人们自然要了解，这部词典究竟贯彻执行了哪些国家标准，并将在汉语言规范方面起到怎样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先后颁布的主要规范标准有：《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1955）、《汉语拼音方案》（1958）、《简化字总表》（1964）、《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1985）、《现代汉语常

用字表》(1988)、《现代汉语通用字表》(1988)、《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88)、《标点符号用法》(1990)、《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2001)等。可以看出,这些国家标准主要体现在字形和字音以及拼音和标点方面,没有涉及语言中词汇和语法以及词典的核心内容——释义和举例。那么用字和读音的规范能不能等于语言的规范呢?很显然,规范用字不能等于规范用词、用语,也不能等于规范的书面语,更不能等于规范地使用汉语,因而即使执行了这些标准的词典,也绝不能与规范型词典划等号。如果仅执行了用字与读音的标准就可以称为“规范词典”的话,那么几乎所有的现代汉语的字典、词典都可以称为规范字典、规范词典,所有的报刊、书籍都可以称为规范报刊、规范书籍,因为出版界大多是能够自觉遵守国家在这方面的规定的。这样说来,媒体所谓《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以汉语言的规范为使命,并在语言规范上下了很大工夫……不同于以往任何一部辞书”之类的宣传都属于夸大其词,它把用字的规范暗中换成了语言的规范,混淆了语言与文字的界线。

众所周知,语言的三大要素是语音、词汇和语法,文字只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不识字不等于不会说话,没有文字的民族不等于没有语言的民族,语言的规范要比用字的规范复杂得多。字典和词典不是字表,它的任务不仅在于为社会提供字、词的正确写法和读法,还要提供字、词、语的正确解释和用法。一部语文词典包括收词立目、注音、释义、举例,以及义项的划分和排列方式、词性的标注等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是它对词语的释义,这也是检验词典质量高低的最根本因素。但是这方方面面的内容都不是上述国家标准所能涵盖的。显而易见,如果认为全面贯彻执行上述国家规范就是对语言的规范,那就是把促进语言规范化这一艰巨的任务简单化;如果认为这只是一种营销策略,那就是对广大读者的误导。较真起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连上述的国家标准也没有完全遵守,比如它就没有贯彻《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中有关大写的规定。

那么,语言的规范标准是什么呢?现代汉语普通话作为汉民族共同语,它的标准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除了上述国家有关部门业已颁布的具体标准以外,语言规范的最根本原则是“约定俗成”的语言实际,已有的和将有的任何国家标准都是以此为基础的。约定俗成的语言实际才是检验所有字典、词典的惟一标准。

从语言实际这个标准来看,凡是国家有明确规范标准的,都要全面贯彻执行。然而,国家标准也有一个需要不断修改、不断完善的问题。就连我国的基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在不断修改,与时俱进,何况许多语言文字方面的国家标准是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制定的,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和人们认识的限制,必然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国家在不同时期颁布的标准也有不尽一致的地方,以前的标准必然要服从以后的标准。例如国家语委1986年发布了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的通知,并在重新发表的《简化字总表》中对个别字作了调整,恢复了曾经作为繁体字的“叠、覆、像、囉”等字的规范字地位;在重新发表的《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中,恢复了曾经作为异体字的“翦、邱、黏、凋”等字的规范字地位。除此以外仍然存在一些有待修订完善的地方,例如“脩”字在异体字表中作为“修”的异体字加以淘汰,但事实上,这两个字在“修饰”、“修理”、“修长”等意义上自汉代以来就可以通用,而在“干肉、肉脯”的意义上,“脩”绝不能写作“修”。对此,词典有必要根据语言事实做出变通处理,以待国家标准的修订。《现代汉语词典》将这两个字单立字头,分别注释;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仍然将“脩”作为“修”的异体字处理,尽管在提示里说明“在‘束脩’‘脩金’等词中,‘脩’是干肉,给老师的酬金的意思,习惯上仍作‘脩’”,但还是错了——“习惯上仍作‘脩’”就是应写作“修”的意思,跟语言事实不符。因此,随

着时代的发展和语言的变化,根据客观实际对国家标准中个别不适宜的地方进行必要的变通处理,为这些标准的修订提供依据,这才是一部负责任的词典所应具有的科学的态度。

儒生与关羽崇拜

郭小霞在 2003 年第 6 期《株州师范高等专科学院》上撰文说,关羽崇拜是中国最为普遍的民间信仰形态之一。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崇拜的形成、形象的塑造、崇拜的区域性以及传播等方面。部分学者将关羽崇拜及其塑造纳入国家正祀与民间传统的互动中来考察,也有学者注意到关羽崇拜是由最初的英雄崇拜逐渐转向“青史对青灯”的儒家风范,儒生群体与关羽崇拜之间的关系尚无专门的研究。

文章指出,关羽崇拜之最初,其形象在官方与民间的差距较大。宋以前,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关羽的形象都不足以使他成为一个全民信仰崇拜的全能大神。关羽的英雄形象并不足以打动儒生,而厉祀形象的关羽则更不可能为儒生所青睐。宋朝以后儒生们以儒家学说为标准,介入了关羽形象的重塑。把关羽渲染成儒家的理想人格。这种历史现象的出现主要是由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是由于儒家内在理路变迁,其正统观念转变并逐渐深入人心的结果。第二是对儒生而言,关羽偶像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儒生介入之后的关羽形象自然十分契合有宋一代的士风。宋儒也自然而然的将其忠义神勇同尊王诛贼的春秋大义联系在一起,再造出了一代儒将的形象。明清之后,关羽崇拜达到了顶峰,儒生更是将关羽和孔子相提并论。

关羽崇拜的兴起与儒生参与塑造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关羽崇拜凭借儒生所赋予的合法性得以迅速的发展;另一方面儒家的道德理念也通过对关羽的崇拜逐渐渗透到基层儒生和一般百姓中间。而科举将成为无法避免的话题,因为科举对儒生而言意味着晋升台阶和实践儒家入世思想的跳板。关公显圣庇佑科考乃使其信仰日趋隆盛,再加之科举的盛行,扩大了信徒层面与层次。总的说来,由于唐宋时期儒生的参与,关羽崇拜得以从地方性的民间厉祀信仰转变为受官方支持的全国性的教化大神,并在明清两代风靡一时。儒生对于历史上关羽与儒家相关资源的发掘以及关羽形象的儒化创造出一个道德完美的新神。作为官方教化神的关羽与作为民间信仰保护神的关羽在儒生心目中的相逢,为我们揭示出中国历史诡异趣致的一面。

中国史学家考证平定“安史之乱”的首次大捷

来自新华社消息,中国历史地理学家经过多年实地考察研究证明,史书上未做详细记载的静边军之战,其实是唐王朝平定“安史之乱”中极具战略意义的首次大捷,以至成为唐军由战略溃退到战略反攻的转折点。

汉朝、唐朝在中国历史上并称为汉唐盛世,唐朝先后经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社会发展到全盛。但是到唐玄宗李隆基执政后期,在长期和平繁荣的条件下,满足于已经得到的功绩,政治日趋腐败,特别是荒废府兵制,削弱了中央集权,放纵了边镇割据势力,以至酿成了天宝十四年(公元 7 5 5 年)爆发的长达 7 年之久的“安史之乱”。时为平卢(治今辽宁朝阳)、范阳(治今北京)、河东(治今山西太原)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及其部将史思明乘机发动叛乱,率 1 5 万大军由范阳南下,直指洛阳和长安。史书记载叛军“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戮,无敢拒之者”。这场浩劫,对唐朝社会生产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也使唐朝由此转入衰败。

正当唐廷一筹莫展之际,朔方(治今宁夏灵武西南)节度使郭子仪避过叛军主力和主攻方

向，率朔方镇军向东循黄河北岸，环绕河套，插入敌后，从侧翼突击，攻占振武军（单于都护府，今内蒙古和林格尔），突破长城天险杀虎口（今山西省右玉县西北），一举攻占河东战略要塞、进入塞内的桥头堡——静边军城（今山西省右玉西北右卫镇）。静边军一役，郭子仪击杀胡骑7000。由此，唐军乘胜收复云中（今山西省大同市）、马邑（今山西省朔州东北），进而攻下雁门关，打通了南下河东、东下河北的战略通道。

靳生禾、谢鸿喜教授研究认为，过去史家和史籍的注意力都在叛军的主力和主攻方向上，即安禄山由范阳南下，渡过黄河，直指洛阳、长安一线，而对叛军侧翼战场的静边军之战，或只字未提，或一笔带过。其实，这场战役却是唐王朝平定“安史之乱”的首捷。郭子仪攻占静边军，使唐军成功地进入河东，进入河东则成为唐军由战略溃退转入战略反攻的转折点，对于唐平定“安史之乱”的战略全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

靳生禾教授认为，静边军之战后，唐军开辟了全新的战略局面：在敌后，唐军的进攻像是给安禄山惨淡经营多年的老巢三镇嵌进一个巨大的楔子，使叛军后路断绝，失去依托，再也不能肆无忌惮地长驱南下而无后顾之忧了。不仅如此，只要叛军无力拔除这个致命的楔子，那么楔子造成的突破面势必越来越大，以至把叛军腰斩为二，使其北线与南线失去战略联系，从此首尾失顾，其发展趋势只有被各个击破了。

靳生禾现为山西大学黄土高原地理所教授，长期以来和太原师范学院历史地理所谢鸿喜教授合作，致力于中国古战场研究，迄今已先后发现并考证出战国古雁门关、春秋战略重镇羁马、长平古战场等十余处遗址。



“中国文物保护标志征集大赛”日前启动

来自光明网消息：近日，由国家文物局主办，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承办的中国文物保护标志征集大赛在北京拉开序幕。本次大赛将确立新中国成立以来文物保护事业的第一个标志。

大赛面向海内外，通过征稿、评选的方式，宣传全国人大和国务院新修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以树立文物保护法治观念，使文物保护意识深入人心，成为公众心目中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据了解，大赛公告将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文化报》、《中国文物报》、《北京青年报》及网上发布。整个赛程将持续 5 个月，决赛采用大赛评选委员会评奖与网上评奖相结合的方式，最终选出获奖作品。来自文物界及工艺美术界的专家组成的评选委员会，将对参赛作品进行评审，一般读者也可在搜狐网上投票选出自己喜爱的作品。大赛还将组织网上专题、专家在线答疑、西部行文物保护公益演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并有丰厚的奖金、奖品。

城市地理：北京古建中隐藏着多少“秘密”？

东华门门钉为何少一排？

金水河走向为何呈弓背形？

紫禁城名字取自哪里？

通过形形色色的例子，我们不难发现隐喻文化有这样四个特点：其一是它的寓意多是讨人喜欢的，有趋吉避祸的倾向；其二是有些隐喻文化的作品带有迷信色彩，又不尽然；其三是隐喻文化的实现大多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其四是隐喻文化的载体可能有用，其寓意却毫无用处。比如金水河的弓形并没拦住任何人，从李自成到八国联军不是都杀进来了吗？而“刚强”、“豪横”、“英雄”等说辞既不妨碍明英宗成为战俘也不妨碍清末屈辱性条约的签订。偶尔弄出个说辞风雅一番或讨个吉利倒也无可厚非，若是一个民族由皇帝带头儿一味长期沉迷于这些玩艺儿，让聪明才智走了旁路，舍本而逐末，只怕离危机就不远了。

有这么多例子垫底儿，再看看前文对门钉的解释，如果说它仅仅是一个隐喻文化的作品，为的是引出一个说法儿来，您大概不再觉得牵强了吧？至此故事还没完，据说刘伯温(仍借用他的名字)因偷了天宫的图样，自知触犯天条罪不容赦，不如自罚还算落个好态度，于是他给自己造了一副枷以示服罪。这副枷不是别的，正是东华门的门扇。据说这个门扇的做法与别处不同，是先造出边框，模拟两爿枷的形状，再把空缺处填实。如果东华门的门扇还是明朝的原物，那么这个传说就还有验证的机会。

故宫东华门的门钉之谜

封建社会等级森严，举凡服饰、车轿、府第等方方面面皆有定规。本文要说的门钉本是无关紧要的结构件，皆因它在一座府第中处于最显露的位置，又经历年演化形成夸张的造型，所以兼具了炫耀权势的功能。至明清，已从制度上对门钉数目加以限制。比如按清代典制，

规定皇家宫苑的宫门“朱扉金钉，纵横各九”，因九为阳数，又是数字之极，九九八十一颗门钉最能体现帝王的尊贵，亲王府第的门钉即减为“纵九横七”，亲王以下递减。明代虽无如此具体规定，但各项待遇仍尊卑有序，随爵而定。这样看来门钉的作用似与今天军官肩章上的星相仿，是等级的标志，含糊不得。奇怪的是竟有一处例外：故宫东华门的门钉居然少一排，是为每扇门八九七十二颗，而且仅此一处例外。这就令人费解了，皇帝主动放弃一排表征地位的门钉究竟用意何在？

大约十几年前某报曾就此组织过讨论，我还记得其中的两种说法。其一是说东华门的门钉与别处不同，尺寸稍大。由此推断当年必是有一批门钉做大了，若仍用九排就显得拥挤，去掉一排看着舒服些。这其实是用百姓的思维来解释皇家的事务。封建社会为一个尊号都能争个你死我活，更何况是代表等级的门钉了？照这样说佛香阁的拆塔改阁耗资巨万该怎么解释？所以这话应该倒过来说：因为设计上要求少一排，为避免显得稀疏才特意将这批门钉尺寸做大一些。

另一种说法是皇家成员死了以后灵柩、卤簿皆出东华门，所以该门主丧，属阴，门钉就不能是阳数，故去掉一排。但是又有人考证说，据记载也有从西华门抬出灵柩的情况，且皇帝外出巡幸也走东华门，不能认为东华门只办丧事，所以此说也难成立。总之讨论的结果仍是莫衷一是，这区区一排门钉竟成了难解之谜。紫禁城是刘伯温“偷”来的吗？

我曾听故宫博物院的一位早期职员对此现象的解释，而该职员是听原宫里的太监说的。说是当年刘伯温建北京(其实刘伯温不曾参与北京和紫禁城的营建，至永乐十五年兴建紫禁城时，他已故去四十多年。只因刘伯温颇具传奇色彩，所以明初的许多大事便都附会到他身上。姑且不管姓字名谁，总之系指北京和紫禁城的设计者)，他自称是偷了天宫的图样来建紫禁城的，为了表示对天帝的敬畏，只好去掉一排门钉以示人间帝王与天上玉帝的区别。那位读者说了，人家是在探讨问题，你这不是说故事吗？我说，谁能说谜底就一定不是故事呢？当年紫禁城的设计者以如此郑重的方式讲述出一个荒唐的故事，其政治用意是明显的：即强化臣民对皇帝的所谓“天子”的半人半神身份的认识。

要解开这个谜得先从民俗说起。原来中国民俗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叫做隐喻文化，就是利用谐音或其他表现形式给事物赋予一种特定的寓意。对隐喻文化做出最精辟解释的当数侯宝林先生，他把这叫做“说辞”。例如用苹果和马鞍来喻“平安”。有时不借助谐音，例如给新生儿挂金锁，以求锁住他的性命毋使夭折，等等。皇帝亦不能免俗，而且简直是乐此不疲。所以在中国古建筑包括宫廷建筑中处处有隐喻文化的痕迹。如果说封建统治者玩物丧志，这大概也是一种玩儿法。紫禁城中究竟有多少故事？

古建中隐喻文化的实例真是不胜枚举。比如故宫金水河的走向，在武英殿前、太和门前和文华殿东侧形成三个弓背形，而三组金水桥恰如搭在弓上的箭，取“坐北镇南”之义。无独有偶，颐和园东宫门外的御河也呈弓背形，虽不指向南方，却仍不失对外震慑的用意。

再如紫禁城这个名字取自紫微星垣，紫微星垣系指以北极星为中心的星群。古人认为紫微星垣乃是天帝的居所，而群星拱卫之。所以自汉以来皇宫常被喻为紫微。为佐证这个说法紫禁城内设有七颗赤金顶(分别是五凤楼四颗，中和殿、交泰殿、钦安殿各一颗)，喻北斗七星。有七星在此，谁能说不是天上宫阙？

紫禁城内有许多消防用的太平缸，这些缸原是镏金的，亦称金缸，谐“金刚”音。而其数目非四即八，喻四大金刚或八大金刚。按说这些缸若放在大殿前后救火时取水最近便，但在故宫里(颐和园除外)却大多舍近求远靠墙摆放，为的是取谐音“刚强”。殿前的陈设中有铜鹤和铜龟，除象征长寿外还有另一层含义，鹤字旧北京方言读“豪”音，而龟旧时俗称“横”(读

去声)，二者合起来是为“豪横”（这个词今天已不常用），与“刚强”正好对仗。故宫御花园内有一石圈，它的上方过去罩着一个大铁笼，上养鹰下养熊，为的是取谐音“英雄”。

紫禁城的主色调为红黄二色，据说皆出于五行的考虑，以示帝王的尊崇。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收藏《四库全书》的文渊阁却用了黑琉璃瓦，而且故宫以外所有皇家存放书籍文档的地方，都用黑琉璃瓦。盖因书籍忌火，而按五行之说黑色属水，取镇火之意。北京城门和城墙的另一种解释

出了故宫，再说说北京城。谁都知道，北京的城门是内九外七，喻三头六臂的哪吒。而北京城墙为什么缺西北角，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曾经有过多种解释。愚以为这或许也是隐喻文化的产物。我国古有“天倾西北，地陷东南”的说法。既然是天倾西北，筑城墙时避让一下方可显出敬天的诚意。

曾经有人测算，若将城墙的缺角补齐，则北京内城近似于矩形，而该矩形对角线的交点即其重心距离景山万春亭的顶子只有数米之遥。但若按照北京内城缺一个角的真实图形求其重心，则该重心恰与万春亭的顶子重合！这就是说景山万春亭不但是景观的制高点，还负担了挑起北京城重心的重任。

北京城的平面分布基本是轴对称的，其对称轴今天叫做中轴。在正阳门前曾埋有石马一匹，地安门前曾埋有石鼠一只，孤立地看皆难解其意，但是把二者合起来就有讲儿了：鼠为子，马为午，原来是北京城子午线的地标，也是北京的中轴线。若仅仅是两个普通石桩则可认为只是一般工程营造的技术标志，若一定要不惜工本弄出个艺术造型以便引出“地支”中子午两个字来，则当数隐喻文化的作品。

在东便门以北的城墙外曾露出半个赑屃，人们一直以为这一定是驮石碑的赑屃，早已有之，筑城墙时不移动开，有一半就砌在城墙里。乃至“文革”期间拆了城墙，人们才惊讶地发现城墙里什么都没有，城墙外露出的原本就是半个赑屃。考古人员想到，若如此，西便门外应该有另外半个，结果在预期的对称位置果然找到了。所谓龙生九种，种种个别，赑屃喜负重，按我国古代的认识，大地是由赑屃承载的。那么此例的寓意是说，北京的城垣系构筑在一个巨大赑屃的背上，与古人对自然的认识相合，必然稳固。

以上各例是官方的玩儿法，至于隐喻文化在民间的存在，则更是花样繁多数不胜数。因与门钉关系较远，恕不赘述。

读北京文化建设的“不求所有 但求所用”

来自千龙新闻网报道：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委副书记龙新民在谈到如何发挥北京文化资源优势、参与首都文化中心建设的问题时说，

凡在北京地区的文化单位，我们都应当支持好、利用好、服务好，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调动他们参与首都文化中心建设的积极性。不求所有，但求所用。

“不求所有，但求所用。”这是一种气魄，一种策略，也体现了一份责任感。北京的文化资源丰富到什么地步，别说外地人听起来会吃惊，就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恐怕也并不清楚生活了几十年的这座城市，“文化家底”有多厚。6 处世界文化遗产、264 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532 处区县级的文物保护单位；123 个博物馆共有馆藏文物 226 万件；出版社 238 家、报纸 248 家、期刊社 2735 家、文艺院团 119 个；北京还汇聚了一大批国内外优秀的文艺人才……。可是，这么多的“文化”扎堆在北京，创造的有形与无形价值，与其消耗的综合资源能成正比，有些院团一年也没听说演出过一场，有些行业报刊萎缩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一些从小练下“童子功”的优秀艺术家，有不少都在旧体制、旧机制的束缚下，难有登台机会，一身

技艺无从施展。

目前，北京的文化资源，如同数台马力不足的旧车，单个拉出去，哪个都跑不远。而如果把每辆车上的好部件拆下来，组装成一台马力强劲的好车，其能量将大出很多。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就是要打破部门、行业限制，以城市辖区为单位，将各类文化资源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进行组织整合，最大限度地释放能量，彰显北京“文化之都”的雄浑高雅，在推动北京及全国的文明建设中体现价值，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

每年的“五一”、“十一”黄金周，不少来北京旅游的外地人，并不是都来游山玩水，也有不少是来看平时难得一见的、国家级或国际级演出的。而北京的文艺团体到外地演出，同样也很受欢迎，笔者曾在外地的观众席上对此有所感受。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就观众的欣赏心理来看，单一艺术形式的演出，市场越来越小。这就给组团出了一道难题：只有将京剧团、杂技团、歌舞团……，各团的名家名作杂揉在一起联合组团演出，才能真正吸引观众。可是，这样的组团方式又要受到种种条框的束缚，谁能担起这样的重任呢？

“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但是如何才能“所用”，确实取决于我们有多少通晓文化专业知识和市场经济运作的经营管理型人才；眼界开阔、善于谋断的创新型人才；能够熟练掌握文化领域最新科学技术的高科技人才。可是这三种人才的缺乏是历史造成的，不可能很快得到解决。我们在吸纳引进的同时，也应注意调动现有艺术家、艺术管理者的积极性，让他们大胆地闯与试，以尽快把“但求所用”落在实处。

国家大剧院等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来自央视国际消息：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重点工程建设速度继续加快，西电东送、西部铁路、大型水利和城市轨道交通等一大批重点工程项目取得了重大进展。

国家重点工程中国国家大剧院的施工现场，目前工程的主体已经竣工，施工人员正在全力以赴对工程的内外进行装修。

据国家大剧院建筑安装总承包联合体有关负责同志介绍，总投资 26.8 亿元，建筑面积 15 万平方米的中国国家大剧院是我国投资最大的现代化文化设施，大剧院室内外的装饰质量和工程难度均属世界一流，为确保工程质量和工期，北京、上海和香港三大施工企业采用世界先进的安装技术，使工程的球体屋面拼接、音响灯光系统设置、防火等三大装饰难关一一被攻破。

此外，铁路、公路、机场和大型水利建设等国家重点工程也取得全面进展，全长 625 公里的西部大开发重点铁路工程已经进入最后攻坚阶段，现在正以日铺轨 3.5 公里的速度向前推进；陕西黄陵至延安高速公路的桥梁和路基工程已基本完工，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 22 座黄土隧道已经贯通了 13 座；随着三峡电站 4 台新机组、台山电厂 1-5 号机组以及上海外高桥 2 期等一批电源项目的投产，今年我国可投产发电装机容量 3730 万千瓦，同比增长 9.6%。“西电东送”输电通道和区域电网主干网架的建设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三峡至广东 500 千伏直流工程已经实现单极投产，近期就可实现双极投产。

建设部要求各地五月底前完成世界遗产监察报告

来自中新社消息：为迎接第二十八届世界遗产大会，中国建设部要求五月底前各有关遗产地对保护状况进行自查，并提交保护监测报告。同时建设部也将对有关遗产保护地状况进行抽查。

建设部城建司副司长王凤武在北京三月二十二日召开的二十八届世界遗产大会筹备工作

会议上说,世界遗产的保护是历届世界遗产大会的主题,今后也是永恒的主题。为向世界遗产大会交一份满意的答卷,各有关世界遗产管理单位要在五月底前对有关遗产地保护状况进行自查,并提交保护监测报告。

王凤武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将于六月二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在苏州规划展示馆举办“世界遗产展”,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二十八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在中国召开之际,向世界各国代表集中展示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文物古迹、自然风光;展示中国各级政府对文化与自然遗产的积极保护;展示全球的世界遗产风采;提高保护世界遗产的意识。

据悉,世界各国已有七百五十四处世界遗产,其中中国有二十九处世界遗产。

龙新民:文化产业要成首都新经济支柱

来自北京青年报消息:龙新民代表在北京团会上说,北京作为全国的文化中心,要坚决落实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要求,把文化建设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近些年来,北京市的文化建设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但由于体制、机制、政策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首都丰富的文化资源还没有形成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发展的优势。”龙新民代表说,我们要通过深化改革、创新机制、调整政策等办法,加快文化发展的步伐。特别要注重把首都的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优势,努力推动精品创作,积极开展基层群众文化活动,培养和吸引更多的优秀文化人才,做大做强一批文化企业,使文化产业成为首都新的经济支柱。

全结构式网上中国现代文学馆正式运行

来自中国网消息:当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金炳华3月1日用鼠标点击一个大屏幕上的 www.wxg.org.cn 网址时,舒乙对两百余位来宾宣布

全结构式网上中国现代文学馆现在开始正式运行。

首次面世的网上文学馆,共有17个大栏目:文学馆简介、巴金论文学馆、报道剪报、文学馆大事记、咨询服务、文学馆游览、文学馆展览、义务讲座、研究丛刊、馆藏目录、文库目录、文学馆动态、专家介绍、文学馆珍藏、文学馆建筑艺术、网站编后语和文学链接。通过这些栏目,可以清晰地了解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产生和发展,了解文学馆的机构建制并可获取服务,轻松方便地查阅资料。

全结构式的网上文学馆,采用先进的计算机VR虚拟技术向社会全面地、立体地展示出文学馆的过去和现在,展示出文学馆的外表和内容。在“文学馆游览”栏目的虚拟空间里,可手持鼠标移动观赏文学馆实景,足不出户就能漫步于文学馆的殿堂之内,徜徉于文学馆的园林之中,移“步”换景,赏心悦目。在“文学展览”栏目里同样采取了计算机虚拟现实技术,目前推出的四个常设与五个非常设展览,即20世纪大师风采展、巴金百岁喜庆艺术大展等九个展览,全部采用环景制作,“参观者”可身临其境地行进在一个个展场内。

人文地产渐成时尚

来自中国文化报的消息:3月21日,国际诗歌节。北京依莲轩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人民大学文艺思潮研究所《新诗界》编委会在继2月28日巨资向社会征集诗歌楼书后,又联合举办“国际诗歌节格调·新诗界诗歌朗诵会”,唐晓渡、西川、王家新、李青松、谯达

摩、海啸等诗人如约而至。引人注目的是，依莲轩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刘博所在的“甘草部落”诗社的7位女诗人也悉数到场。同时，已经在京城地产界炒得炙手可热的人文地产项目——格调宣布当日封顶，以准现房正式开盘。

《新诗界》主编李青松在会上说，《新诗界》在与依莲轩公司共同发出向社会征集诗歌的消息后，反响十分热烈，说明现在仍有许多人有着很深的诗歌情结。诗歌朗诵会这种形式，可以把诗歌的积极作用发挥出来，提升大众的生活品位，真正发挥诗歌净化灵魂、鼓舞信心的作用。

首届中国收藏界年度排行榜入围名单揭晓

来自中国文化报消息：由中国收藏家协会、中国《收藏界》杂志社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收藏界年度（2002-2003）排行榜”入围名单近日揭晓。

经排行榜组委会专家、顾问，全国各省、市收藏协会以及业界权威机构经过5个多月的征选工作，共从全国上万个候选单位中推选出170个机构、个人入围中国十大民间收藏协会（组织）、中国十大艺术品拍卖机构、中国十大古玩城、中国十大画廊、中国十大民间博物馆（收藏馆）、中国当代画家排行榜之新锐榜、中国当代书法家排行榜之新锐榜。

入围名单通过各大平面、电视、网络等媒体向全国公布，由广大收藏爱好者及公众进行有奖投票评选，上榜名单将于5月正式公布。这是我国首次以排行榜的形式推选中国收藏界最具代表性、典型性的组织、机构、人物的大型公益活动。

文化保护 立法先行

来自人民日报文章：自我国全面启动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以来，全国各地的文化部门、艺术机构或团体都不同程度地加强了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各民族人民群众对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保护工程的全面进展出现了好势头。但是，由于在较长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我国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曾遭到种种破坏，现在又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冲击和环境恶化的威胁，面临消失的危险，再加上我国在这方面的工作起步太晚，既缺乏应有的科学方法，又没有成套的经验，因而，很有必要认真学习国际先进经验。

学习国际先进经验，当务之急就需要从制定并颁布文化遗产保护法和推行保护措施的经验入手。

一、文化保护，立法先行。这是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首要的成功经验，其中以日本最有代表性。日本的传统文化遗产直到19世纪中叶的江户幕府时代，几乎保护得完整无缺；明治维新以后，资本主义的大发展使传统文化受到剧烈冲击。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日本文化财产遭到惨重破坏。1945年战后，日本在废墟上重建国家的最初阶段，政府广泛采纳社会开明人士和学术界的强烈呼吁，实施了复兴日本民族文化的战略方针。1950年颁布了《文化财产保护法》，规定不仅由国家保护有形的文化遗产，还着重强调由国家保护无形的文化艺术遗产，规定了国家保护的文化财产五大门类：一是有形文化财产。二是无形文化财产。三是民俗文化财产。四是纪念物。五是传统建筑物群。在这部法律中确定的无形文化财产和无形民俗文化财产，在今天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标准文件中，一律称之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这部法律在突出保护具有很高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同时，还强调优先保护那些濒临消亡的文化财产。

过了10年，韩国在出台《无形文化财保护法》方面也创造了好经验。上世纪60年代，现

代化进程加快，西方文化来势迅猛，严重冲击了韩国本土的民俗文化，使得许多有价值的文化艺术遗产濒临消亡。1960年，在一大批民俗学者的倡导和参与下，韩国政府颁布了《无形文化财保护法》。经过40年的上下推动，韩国的民族民间文化得到全面保护和振兴，很大一批民俗艺术被国家认定为“重要无形文化财”，并使他们在保护过程中得到传承。

此外，在欧洲各国，诸如法国、德国、芬兰、挪威等国，在近半个世纪中，先后都颁布了相关的文化保护法案，建立了严密的保护机制，形成了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制秩序和良好的人文环境。

二、推行保护，重在措施。这是国际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先进经验中的基本经验。许多国家都采取了有效的措施，建立了一些有效的机制，创造了不少有效的方法。在这里日本的经验也很突出。他们采取了科学的认定程序，用来认定“重要无形文化财产”的项目和“人间国宝”的命名。项目的认定多属于综合认定或持有团体认定。几十年来，文化激励机制的推行，已经使日本戏剧、乐舞、曲艺等表演艺术类的“能”、“文乐”、“狂言”、“讲谈”等都在强有力的保护措施下从濒危到重生再走向新的繁荣。日本还建立了从县市到乡村覆盖全国的保护重要无形文化财产的专业协会，凝聚了千万民俗文化艺术的传人，从事乐舞表演和传承活动。法国为了发动民众投入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定期举办“国家遗产日”活动。德国为保护古民居建筑艺术，每年都举行全国传统民居艺术大赛，吸引国内外游客参观各地参赛的不同年代的民居艺术。在德国，几乎每一个乡村都有几座或十几座古老的民居被政府认定为保护单位，政府给予民居主人以资助，定期由专业民居技工指导修缮保护。

总之，值得学习借鉴的文化保护措施很多，只要认真汲取和借鉴，一定会对我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产生巨大的助力。

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发出通知 要求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向未成年人等社会群体开放

今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对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2004]8号）要求：“各类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烈士陵园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要创造条件对全社会开放，对中小集体参观一律实行免票，对学生个人参观可实行半票。”为了落实文件精神，充分发挥公共文化设施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提高政府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水平，文化部、国家文物局于2004年3月19日就公共文化设施向未成年人等社会群体免费开放，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厅（局），文物局（文管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局，各直属单位发出通知，要求公共文化设施加大开放力度，向未成年人等社会群体免费开放。

《通知》要求，从2004年5月1日起，全国文化、文物系统各级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要对未成年人集体参观实行免票；对学生个人参观可实行半票；家长携带未成年子女参观的，对未成年子女免票。对持有相关证件的现役军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社会群体，也要实行门票减免或优惠。被确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各级各类公共文化设施要积极创造条件对全社会开放。

《通知》强调，公共文化设施在向未成年人等社会群体免费开放的同时，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积极开展未成年人喜闻乐见的文化艺术活动，把思想道德建设内容融于其中，充分发挥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引导功能。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要加强陈列设计，根据未成年人的心理特点和教育需求，举办学术性、专业性和知识性、趣味性、观赏性紧密结合的陈列和展览，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有条件的地方可根据本地实际，创办少儿图书馆等未成年

人文化设施或场所。公共图书馆要通过开设少儿阅览室、举办面向未成年人讲座与培训、设立少儿集体参观接待日等方式，有针对性地向未成年人提供服务，培养未成年人使用图书馆的意识，积极开展适合未成年人实际需求的各种文献信息服务。文化馆、文化站要加强少儿文化活动的辅导和培训工作，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少儿文化活动。

《通知》强调，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要根据未成年人成长进步的需求，精心制作知识性、趣味性、科学性强的文化信息资源；基层网点要完善服务环境，规范服务内容和方式，努力让健康的文化信息资源通过网络进入校园、社区、乡村、家庭，丰富广大未成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各级博物馆、公共图书馆、纪念馆、美术馆等要积极利用互联网站，开设专门为未成年人服务的网页、专栏，提供为广大未成年人喜闻乐见的文化服务内容；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网上文化活动。

《通知》指出，各级文化部门可通过媒体，公共文化单位可在设施或场所的显著位置向公众公示，宣传和介绍公共文化设施向未成年人等社会群体免费开放的有关情况，方便群众了解、使用和监督。公共文化设施要充分发挥文化志愿者的积极作用，在售票窗口接待、参观场所引导、图书音像材料提供以及讲解安排等方面规范服务，为未成年人等社会群体参观创造良好的服务环境。

针对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可能造成的文物安全、文化单位收入减少等问题，《通知》强调，古遗址、古建筑文物单位，特别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和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文物保护单位，要妥善处理好扩大开放和有效保护文物安全的关系，根据本单位具体情况，落实免费开放措施，合理调控流量，积极预防可能出现的文物损坏、群体安全等问题。各级文化、文物部门要积极争取财政部门的支持，落实公共文化设施向未成年人免费开放所需资金，落实配套设施建设和设备更新经费，对因免票或优惠所减少的收入，给予必要补偿。

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设施作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向全社会提供公益性文化服务的重要渠道，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充分发挥这些文化事业的重要作用，对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弘扬民族精神、传承历史文化、提高全民族素质、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目前来看，由于受经费不足、管理滞后等因素的制约，公共文化设施在活跃群众文化生活，提高人民群众文化生活质量等方面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公益性文化事业如何建设、发展和发挥作用的问题越来越受到广大群众、新闻媒体和社会的关注。2004年元旦，浙江省博物馆、中国丝绸博物馆同时推出免费开放的消息在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报道之后，北京、上海、武汉等地博物馆、纪念馆相继宣告各种免费措施，向社会公众敞开大门，提供良好的文化服务，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好反响。故宫博物院自3月1日起，允许全国的中小學生集体在每周二（不含法定节假日）免票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也在3月1日起对社会公众实行免费开放。浙江省内的105家博物馆将逐步实行全部免费开放，北京市大觉寺以发放学生免费参观券的形式对中小學生参观实行免费开放，上海72家博物馆、纪念馆也在拟订措施，向学生免费敞开大门。国家图书馆从2004年3月起，采取设立“少年儿童接待日”、重新开放国图分馆少年儿童阅览室、聘请未成年人教育专家举办培训讲座等措施，进一步扩大对未成年人的服务。

中央领导同志对公共文化设施向社会开放问题非常关注。李长春同志在2004年1月17日下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调研时指出：“各类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要最大限度地向广大群众开放，逐步对中小學生集体参观实行免票。”2004年2月10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指出：“要办好博物馆、图书馆、青少年宫、科技馆等文化事业，为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服务。各类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科技教育基地、德育基地、法制教育基地等要充分发挥阵地作用，促进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这些设施，对中小集体参观要实行免票，个人参观实行半票。”文化部长孙家正在今年 2 月 12 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也表示：“为了加强公共文化事业公益性质，公益性文化单位，比如博物馆，要免费向有组织的青少年团体开放。随着政府投入的增加和社会赞助的增加，以后可能陆续会有一批公益性文化单位向全体社会成员免费开放。”

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就加大公共文化设施开放力度提出要求，对于加强公共文化设施的规范化建设和管理，推动公共文化单位深化改革，切实提高公共文化设施的服务水平，促进公益文化事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这个《通知》既是去年文化部研究起草的《关于进一步扶持和加强公益文化事业建设的若干意见》的具体措施，也是贯彻落实《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的一个实际步骤。

安徽省历史文化名城得到有效保护

来自《安徽在线》消息：近年来，安徽省坚持以保护为主、保护与利用并重的原则，在加快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大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力度，并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内涵，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

安徽省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现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3 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11 座，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地段 11 处。此外，在黄山市还保存了比较完整的明清时代村落百余处，明清古建筑 5000 多幢。

省委、省政府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高度重视，制定出台了有关政策，明确了具体的保护措施。各级政府加强了历史文化名城的规划管理和规划实施，先后有 25 座国家级和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完成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工作，使各项建设活动都处在规划控制下有序开展。同时不断加大对历史文化名城内基础设施、古建筑维修和环境整治的资金投入。仅“九五”期间，全省投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维修和环境整治资金就超过 1 亿元。在保持遗产真实性、风貌完整性和建筑风格统一性的前提下，各地严格按照原结构、原材料、原工艺，对一大批古城、古街、古村落进行了合理整修，延续了其生命力。

作为历史文化资源大省，安徽省积极推进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经过规划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当地政府多年不懈努力，2000 年底安徽省申报的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填补了国内本类型世界文化遗产的空白，加快了“两山一湖”自然和人文资源的开发。此后不久，省政府又批准成立了由黄山市政府和省建设厅主要负责人为组长的“西递、宏村”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领导小组，进一步加强了皖南古村落的规划、建设和保护管理工作。

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工作的加强，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于各地管理科学，措施到位，古城、古街、古村落不仅得到有效修缮和保护，而且带动了当地旅游、服务等产业的发展，赢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已成为安徽省经济发展的一个新亮点。

河南信阳保护民间文化成为热门话题

来自中国文化报报道：河南省信阳市继去年成立了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领导小组，以市委宣传部和市政府文件印发了抢救工程《实施方案》，召开了全市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工作会议之后，近期，此项工作再次引起了信阳市委、市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以及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并成为信阳近来一个时期的热门话题。

信阳市市长王铁在信阳市二届二次人大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了“要重视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工作”的要求。市委副书记胡玉成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军甫在听取了“关于信阳民间文化抢救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建议”的专题发言后，给予热情评价，刘军甫当即要求财政局今年拨出经费10万元专门用于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和开发，并表示，不仅今年解决10万元，今后要根据抢救工作需要连续每年给解决一定经费。由于信阳党政领导的高度重视，加之信阳各新闻媒体的集中宣传报道，一时间，信阳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成为了政协会议和社会舆论的中心话题。据悉，信阳有关单位和组织正在抓紧时间制定有关具体工作计划和实施措施，全面推动抢救工程各项工作的开展。

昆山市周庄喜获“文化遗产保护奖”

来自人民网消息：2003年11月27日，国家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公布了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镇”名单，昆山市周庄镇榜上有名。这是周庄今年继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部授予的“文化遗产保护奖”之后获得的又一殊荣。

近年来，周庄以千年水乡古镇为依托，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充分利用古镇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旅游经济，走“旅游兴镇”之路。为有序开发建设，周庄以科学的规划为基础，对全镇的文物古迹采取了严格的保护措施，对全面保存古镇的历史风貌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九五”期间，周庄共投入1亿多元，对古镇风景区的景观和新建成的设施进行整治，投入1800多万元，对古镇的“三线”实施地埋。这一系列措施不仅从根本上改善了周庄的人居环境，也充分优化了旅游服务设施，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保护与发展并举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周庄有关负责人表示，周庄将以获得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镇”为契机，进一步完善古镇区的文物保护措施，加大保护力度，坚持建设和管理并重，大力发展古镇的旅游业。

据了解，全国共有10个镇荣获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镇”称号。

建设部、国家文物局日前联合公布我国首批历史文化名镇（村）。山西灵石县静升镇等10个镇、安徽省黟县西递镇西递村和宏村镇宏村等12个村榜上有名。

建设部、国家文物局联合下发的通知中说，为了更好地保护、继承和发展我国优秀建筑文化遗产，弘扬民族传统和地方特色，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决定，从今年起在全国选择一些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革命纪念意义，能较完整地反映一些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和地方民族特色的镇（村），分期分批公布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和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入选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的是山西省灵石县静升镇，江苏省昆山市周庄镇、吴江市同里镇、苏州市吴中区角直镇，浙江省嘉善县西塘镇、桐乡市乌镇，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重庆市合川县涪滩镇、石柱县西沱镇、潼南县双江镇。

入选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有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川底下村，山西省临县碛口镇西湾村，浙江省武义县俞源乡俞源村、武义县武阳镇郭洞村，安徽省黟县西递镇西递村、黟县宏村镇宏村，江西省乐安县牛田镇流坑村，福建省南靖县书洋镇田螺坑村，湖南省岳阳县张谷英镇张谷英村，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大旗头村、深圳市龙岗区大鹏镇鹏城村，陕西省韩城市西庄镇党家村。

南京将举办“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博览会”

来自人民网消息：“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博览会”将于4月30日—5月6日在中国南京举办。“名城会”是一次国际性的文化盛会。它将确立“打造具有区域性、民族性和国际性的特色文化品牌”的活动定位，体现“集古都精华，汇世界精彩”的办会理念，凸现“南京人民的节日、走向世界的南京”的主题，营造“相聚在文化名城，狂欢在博爱之都”的节庆氛围。

“名城会”拟邀请国外历史文化名城巴塞罗那、大田、佛罗伦萨、京都、莱比锡、马六甲、墨尔本、名古屋、巴黎、圣彼得堡、维也纳，中国七大古都北京、杭州、西安、郑州、洛阳、开封、安阳和世界遗产城市承德、丽江、平遥等国内外20多个城市的市长、知名人士及艺术家汇聚南京，举行国际名城对话、国内文化论坛、文化主题活动、名城文化展览、文艺晚会和狂欢节等六大类共计50余项活动。届时，将在对话的基础上联合发表世界历史文化名城文化交流与遗产保护南京宣言。

此届“名城会”由国家文化部、建设部、文物局和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办，由南京市政府、江苏省文化厅和建设厅共同承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代表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作为其支持单位。目前，“名城会”专题网站已经开通，网址为：www.whcce.org。

我国发现最古老的凤凰图案

新华网长沙3月25日电凤凰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神鸟，但它的产生一直是个谜。湖南省洪江市高庙文化遗址日前出土的一个白色陶罐上，戳印有我国最古老的凤凰图案，距今已有7400年的历史。这一发现为揭开凤凰“诞生”之谜提供了异常珍贵的实物资料，震惊了考古专家。

主持高庙文化遗址考古发掘工作的湖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贺刚说，在对高庙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与宗教祭祀、巫术有关的“艺术神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戳印有凤凰、兽面和太阳图案的一个白色陶罐，这说明中华民族有关神鸟凤凰的神话传说至少追溯到7400年前。

记者在高庙文化遗址看到，白色陶罐的颈部和肩部，戳印着两只飞翔的神鸟凤凰，一只是正面的，一只是侧面回首的，姿态雄健，活灵活现。它们具有神话传说中凤凰的鲜明特征：有冠，有非常长的喙，长颈，有漂亮的长尾。最为奇特的是，两只凤凰的食囊部位还戳印有獠牙、吐舌的兽面纹。

贺刚爱不释手地摸着凤凰图案说：“如果不是亲手将陶罐从地下挖出来，我真不敢相信这是7400年前的人类杰作。可以断定，当时有专门的工匠——艺术家的存在。这次发现的凤凰图案不仅比河姆渡遗址中发现的图案要精美，而且还早了400年。”

在此之前，考古界普遍认为，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双鸟朝阳”象牙雕刻碟形器中有着我国最早的凤凰图案。这件器物两侧各有一展翅欲飞的风鸟，圆眼，钩喙，伸颈昂首相望，拥戴着太阳。形象地反映了原始农业发明以后先民对知时鸟和照耀万物的太阳的崇拜。

凤凰“诞生”之谜是否因此迎刃而解呢？贺刚说，凤凰在历史上、现实生活中，都是不存在的，和龙一样，它是人类想像出来的。人类借助于龙、凤，沟通和大自然的联系。凤凰是原始社会的人类对神灵的虔诚、崇拜、顶礼膜拜而创造出来的一种神性的动物。

贺刚介绍说，龙、凤同为中华民族两大图腾系统。中国人赋予了凤凰很多美好的特征：美丽、吉祥、善良、宁静、有德、自然。崇凤，是一种浓厚的民族情结。凤凰在现实中并不存

在，但它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中却是最真实不过的形象。

高庙文化遗址位于洪江市岔头乡岩里村，是沅水一级台地上保存完好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分布面积约 1.5 万平方米。2004 年 2 月至 3 月，湖南省考古研究所对高庙遗址进行了主动的考古发掘。考古专家们认为，高庙文化遗址作为一个有浓郁宗教色彩的文化遗址，对探讨中国古代史前人类的宗教意识、宗教信仰、宗教艺术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无锡开创文化事业新局面

来自无锡日报报道：16 日，无锡市召开文化系统目标管理工作会议，总结去年文化系统所取得的成绩，下达本年度的目标责任书。市委副书记周解清到会并讲话。

去年，无锡市文化系统成功承办了“中国无锡·太湖国际民乐展”，无锡市歌舞团民族舞剧《阿炳》列为全国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初选剧目，创作、修改、加工、提高了一批艺术作品参加省戏剧节、音乐舞蹈节、五星工程奖等活动，共获 66 个奖项；历史文化名城的创建有了新成果，编制了《无锡市历史文化保护规划》，起草并实施了《无锡市历史街区保护办法》，无锡市各级文保单位数量由原来的全省第九位跃居为第三位。今年，该市还将迎来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如第二届太博会开幕式大型文艺活动、国际合唱节、薛福成故居二期建设、东林书院 400 周年纪念等活动。

周解清对无锡市文化系统去年所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他指出，目前文化事业面临著新机遇，新形势对文化工作也提出了新要求。今年无锡市文化系统大事多、任务重，文化工作者要以高度的责任心开创市文化事业的新局面。

西安将举办文化产业博览会

来自中国文化报消息：在国家文物局、文化部文化产业司等的支持下，由第八届中国中西部合作与贸易洽谈会执行委员会主办，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等承办的第八届中国中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文化产业博览会将于 2004 年 4 月 5 日至 10 日在陕西西安举办。

本届文化产业博览会，是第八届中国东西部洽谈会的主要展会之一。博览会以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精神为指导，依托各参展省市区的文化资源优势，努力创新东西部地区文化产业的宣传、展示、开发、促销、交流和合作的途径，搭建文化产业招商引资的有效平台，开展多种形式的投资洽谈及展销活动，促进文化资源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增强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博览会将重点展示参展单位的新形象和突出成就，展销各类文化艺术作品、演出节目、影视节目、出版物、音像制品、民间艺术品和旅游工艺品等。

新疆木卡姆被列入民族民间文化保护试点工程

来自央视国际消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如果说蒙古族有《江格尔》、藏族有《格萨尔》，那么维吾尔族有“木卡姆”。木卡姆是新疆少数民族民间的传统艺术，近日这一艺术被列入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试点工程。

木卡姆为阿拉伯语，有“古典音乐”的含意，是信仰伊斯兰教诸民族的一种音乐形式。十二木卡姆就是十二套大曲，分别是拉克、且比亚特、木夏吾莱克、恰尔尕、潘吉尕、乌孜哈勒、艾且、乌夏克、巴雅提、纳瓦、斯尕、依拉克。木卡姆分布地区很广，种类繁多，阿拉伯、波斯、土耳其、印度以及中亚等地区均有木卡姆。新疆的木卡姆种类最多，结构形式也最完整。

目前，新疆艺术研究所计划在喀什、阿克苏、吐鲁番、哈密等地建立木卡姆传承中心，组织一批木卡姆艺人专门演唱、传播这种艺术。

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试点工程于2003年启动，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10个保护试点，木卡姆是新疆惟一入选的项目。

研究表明千年前敦煌是国际大都市

来自新华网消息：中国的西部开发和旅游热潮，正在使敦煌这个东方美术之都散发出国际气息，而相关研究表明，在千年之前的中国唐代、甚至更早的时候，敦煌已是一个“国际都市”。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郑炳林教授说，这一现象在商贸流通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敦煌藏经洞

出土的晚唐五代时期的籍帐文书表明，当时的敦煌贸易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区域性经济交流，而是具有了国际性，许多外来使团、商人在这里常年定居或从事贸易活动，使“地不产珍，献无奇玩”的敦煌变得商品琳琅满目，各类生产、生活物资应有尽有。

从散见文书的记载来看，当时与敦煌发生贸易关系的地区范围非常广泛，除来自中国中原、新疆及西藏地区的物品之外，还有来自高丽、波斯、印度、东罗马等东亚、西亚、南亚及欧洲等地的货物，商品种类有棉布、丝织品、铁器、银器、玉器、竹器、畜牧产品、药材、化妆品、食品、颜料、兵器等20多种，贸易之兴盛可见一斑。

这些物品除了部分为敦煌当地消费之外，大部分易手后再销往其他地区，在敦煌和丝绸之路沿线，除了往来不断的朝贡、外交使团在从事官方贸易之外，当时已经有一批职业商人在从事长途贩运贸易，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来自中亚地区的粟特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在敦煌定居，除了从事经常性商业活动之外，还在敦煌开办了酒店、旅馆等。

郑炳林教授说，一个城市的商品贸易具有国际性，必须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市场上用于交换的商品具有国际性；二是从事商业贸易的商人具有国际性；三是贸易市场上使用的货币具有国际性。从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来看，这些条件在当时的敦煌都已经具备，随着外来商人、物资的不断涌入，中国自产的铜钱退出了敦煌市场，来自西域、中亚的金钱、银钱和金银器皿成了晚唐五代敦煌对外贸易的主要硬通货，它们同丝织品一道，被当地人认可和普遍接受。

其实，除了商业贸易的国际性之外，当时敦煌的城市规模和语言种类也能反映出它“国际都市”的一面。据有关学者推算，当时敦煌的人口有3万之多，这一数字对于千年之前中国西部边陲的小县来说，已经足以反映其城市规模之大。另外，在敦煌文书保存了一大批民族文献，从中可以看出，除了汉人之外，当时还有回鹘、粟特等多个民族在敦煌活动，为了交流需要，当时已经有了一批职业翻译，这些，都反映出敦煌国际化的痕迹。

2000多年前，张骞凿空西域，打开了中国通向西域、中亚乃至欧洲的门户，汉代设置张掖、酒泉、武威、敦煌四郡，进一步从军事和设施上保障了这条横跨亚欧的贸易通道的畅通，从此，外国使团和商旅频繁地出现在“丝绸之路”上，这时的敦煌已经是“华戎所交一都会”。隋朝大业年间，隋炀帝在张掖召开盛会，宴请西域27国首领，这一史无前例的“国际招商”活动，促进了“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七世纪后，大唐王朝的富庶和开放，使“丝绸之路”贸易达到了鼎盛。千百年来，由于地理位置重要和佛教文化昌盛，敦煌无疑成了这条亚欧大通道上最闪亮的一颗明珠。

张廷皓等三十一名代表呼吁我国“世遗”保护应立法

来自中国文化报报道：在陕西代表团，张廷皓代表关注历史文化名城、世界遗产保护是出了名的。现任陕西省文物局局长的他，去年两会期间牵头提交的关于制定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法的议案，已由承办单位建设部转为建议给予答复。“令人高兴的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有望年内出台。一旦该条例出台，将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起到积极的作用”，张廷皓欣慰地说。

我国现有 29 处世界遗产，居世界第三位，但是保护现状不容乐观，相关立法滞后。这次，陕西团张廷皓等 31 名代表提交了关于制定世界遗产保护法的议案，呼吁有关部门尽快为我国的世界遗产保护立法。

张廷皓等代表认为，这个专项法规应当明确 10 项内容：一、世界遗产是珍稀的或唯一的不可再生的文化和自然资源，以保护为主作为其工作方针；二、世界遗产的国家所有权不能变更；三、各级政府负有保护世界遗产的责任；四、遗产地的保护、利用项目必须有明确的审批程序，最终由国务院主管部门或国务院审批；五、应设立统一、权威、高效的世界遗产管理部门；六、国家设立世界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对遗产地的规划、保护和利用项目进行科学咨询；七、遗产地的保护、管理、利用应由省或省以上的专业机构承担；八、遗产保护所需资金应列入国家财政预算，并建立世界遗产保护的专项基金，吸纳社会资金保护遗产，同时明确对捐资者减免税收的法律条款；九、引导遗产地群众发展保护遗产的产业，对群众因保护遗产付出的代价，国家应予合理补偿；十、加强对申报世界遗产工作的指导，制定世界遗产地的环境标准，要有预警机制。

政协委员吁保护杭州话 方言普通话之争引发讨论

来自中国网消息：在前不久召开的杭州市政协八届三次会议上，政协委员毛海涛递交了《关于保护杭州方言，防止历史文化名城内涵缺失》的提案。他认为，在城市外来人口日渐增多的趋势下，讲杭州话的人越来越少，久而久之便会使杭州丧失其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所独有的个性，提出要在非正规场合“提倡用方言交流”；同时还建议对全国 99 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及所有的省会城市的方言都进行保护，“不要让有地域特征的非物质性历史文化缺失掉”。

连日来，有关方言是否需要保护、该怎样保护的问题，成为很多人关注的话题：国家倡导推广普通话，怎么可以强调保护方言？“拯救”方言的呼声，是排外情绪在作怪，还是文化生态保护的 Need？的确，不少专家学者早就呼吁保护地方方言。社会学家郑也夫曾撰写过一篇题为《是保护方言的时候了》的文章，他不无尖锐地指出，人们对语种保护的意识甚至落后于对动物的保护。文化储藏积淀在语言中，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储藏在其多样的语种中。

在采访中笔者也发现，几乎所有的“老杭州”对杭州话都怀有深厚的感情，对它的日渐衰微感慨万千，都非常赞同想办法保护杭州话。70 多岁的林立峰老伯固执地用他熟悉和喜爱的语言说：“格么大家都说普通话，杭州就不是杭州了。”但也有很多人反对或不赞成保护方言，他们认为，推广普通话是国家语委的既定“国策”，推普符合时代要求，保护方言则背道而驰，是人为地阻挠普通话的推广。特别是不少由外地来杭州工作、生活多年的人认为“不需要”保护方言，因为语言上的差异给他们融入这个城市人为设置了一道无形的障碍。在杭经商多年的王丽亚女士说：“如果说杭州话作为方言需要保护的话，那么我们温州话，还有宁波话、绍兴话等等要不要保护呢。如果大家都说家乡话，那还不乱套了。”

而不少专家学者和普通市民在接受采访时认为，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推广普通话是非常必要的，在公众场合必须推广普通话。特别是在当今这个人员广泛流动的社会，不用或不会说

普通话，就会出现交流障碍，甚至是寸步难行。但他们也同样认为，在公众场合推广普通话与在一定人群、一定场合使用杭州话并不矛盾。从事 40 多年教育工作的杭州市八一中学教师王藻说：“推广普通话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消灭方言。我们必须及早对方言消失这一问题有清醒认识，及早开始保护杭州话。”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王岳川在接受采访时说，全世界每天都有几种语言在消失，每年都有几种文化死去，如果不加以保护，那么最后只剩下英语和美国文化，岂不是很可悲的事情？保护方言，同时也就保护了个体文化和村落文化，保护了文化的多样性。目前，中央电视台正在拍摄反映口头文明遗产的十集专题片《草根中国》，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杭州话属于吴方言的一种，承载了很多历史文化的遗存，因此从历史文化保护的角度来看，需要保护杭州话。

保护杭州话，并不是硬要规定大家都讲杭州话，对保护杭州话需要合理理解。浙大中文系方一新教授、池昌海教授等学者指出，保护杭州话应当是在一定人群范围内或通过一定载体来进行，而不应当把此理解为否定在公众场所推广普通话。保护和传承杭剧、杭州大书、小热昏等地方戏曲，就是保护杭州方言的一种有效形式。现在杭州多家新闻媒体开辟了方言栏目或节目，如电视频道“阿六头说新闻”等，也同样是保护杭州话的一种载体。保护方言也可以学日本、美国等一些地方的做法，通过光盘刻录等方式保存在博物馆里。

“我们民族共同语的走向是普及普通话，不必强求所有的人都使用方言。就好比古董虽然是宝贝，我们必须把它们保存好、保护好，但是我们不必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使用古董。”浙大中文系的另一位教授祝鸿熹这样风趣地说道。接受采访的几位专家学者同样强调，身处开放的时代，身处开放的城市，在公众场合推广普通话，与在一定范围保护地方方言，应该是同样值得重视并为之努力的两件事。

中国传统戏曲“活化石”——秦腔亟待抢救

来自新华网报道：提起中国的传统戏曲艺术秦腔，宁夏秦腔剧团团长朱正雄一脸尴尬：“地下找出来的化石人们都当成国宝，为什么没有人来拯救秦腔这颗‘活化石’呢？”

秦腔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在古代陕、甘、宁一带民间歌舞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形成的，流行于陕、甘、宁、青、新、晋南、豫西、内蒙、川北等地区。目前，秦腔保留的剧目约为 700 个，为各剧种之首，“国粹”京剧里面就含有秦腔的成分。相传唐朝乐师李龟年作的《秦王破阵乐》是最早的秦腔乐曲。

秦腔的唱腔、道白、板路、脸谱等自成一统，唱腔高昂激扬，保持了原始、豪放、粗犷的特点。秦腔的角色分老旦、老生、正旦、花旦、武旦、大净、毛净和丑角等，喜、笑、怒、骂、悲、愁、怨、爱、恨和憎等表演强烈而真实，能充分反映出劳动人民的爱憎、痛苦与欢乐，有着纯朴深厚的生活根基，是真正的民间大众艺术。

朱团长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现代化的文艺、娱乐方式蓬勃兴起，占领了很大一部分文化市场，使秦腔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目前，由于创作、演出经费缺乏，秦腔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许多秦腔剧团的职工生活十分困难，导致人才外流现象严重。年轻人大都改行了，秦腔中的“七梁八柱”变成了“二梁三柱”。上世纪 60 年代，宁夏全区共有秦腔演出团体 300 多家，而到现在只剩下固原秦腔剧团、银川秦腔剧团和宁夏秦腔剧团 3 家，而且演出的秦腔传统剧目有迅速减少的势头，取而代之的是歌舞、表演唱等，秦腔剧团成了空架子。

虽然秦腔受到很大冲击，但秦腔的市场还是有的。朱团长说，宁夏有近 600 万人口，有一半的人喜欢看秦腔，有 80% 的南部山区农民、60% 的川区农民喜欢看秦腔。朱正雄团长呼吁，

作为高雅艺术的秦腔是十分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国家应该加大对它的扶持力度，否则，这个“活化石”一旦失去了，就永远也找不回来了。

中国复原唯一的早期真人类型化石

来自新华网消息：根据已有 35000 年历史的四川“资阳人”头骨化石，四川两位艺术家经过两年努力，已于日前复原了“资阳人”胸像，并完成了“资阳人”母子全身泥塑主体雕像创作。据参与复原创作的青年雕塑家廖飞平介绍，“资阳人”头骨化石是中国发现的唯一早期真人类型，是旧石器晚期的真人类化石，是南方人类的代表，是古人类发掘中唯一的女性。但享誉中外的“资阳人”头骨化石已出土半个多世纪了，在历史教科书和大小百科全书上，仅有文字记载，没有像“北京人”、“山顶洞人”那样的概念性形象，这无疑是一大缺憾。

参与复原创作的两位艺术家除了廖飞平，还有曾任《资阳人》月刊杂志主编五年之久，对“资阳人”文化情有独钟的资阳市雁江区委宣传部的孟基林。

在复原创作过程中，他们依据世界级专家裴文中、吴汝康等教授对“资阳人”个体特征的描述，如额结节突出、眉脊显著且相连、前额狭窄、鼻根部高而狭窄等，认真测定“资阳人”头骨化石复制件，并参考“北京人”，特别是“山顶洞人”复原像特征，完成了“资阳人”复原雕像创作。

“资阳人”全身泥塑主体雕像高 3.1 米，刻画了 35000 年前“资阳人”母子同大自然作斗争的形象。聪灵可爱的赤身小男孩右手抱着母亲的右腿，左手拉着母亲臀部的草裙，惊惧地侧眼凝视着正前方；母亲挺身而立，赤裸上身，两眼炯视，她一手护着孩子的头，一手握拳在腰，表现了原始“资阳人”的生存环境、母子连心的母性心态及同自然环境抗争的精神。雕像采用虚实结合的手法，粗犷处大刀阔斧，气势如虹；细微如触肌肤，能见经脉。“资阳人”头骨化石复原雕像和母子全身泥塑主体雕像的完成，填补了“资阳人”研究史和历史教科书上无具体形象的空白。

“资阳人”头骨化石发现于 1951 年 3 月，当时在修建成渝铁路时，重庆大学张圣樊教授在四川资阳九曲河一号桥墩发现了远古人类头骨化石，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派专人将古人类头骨化石送北京，由世界级专家、古脊椎动物研究所所长裴文中、吴汝康等教授经过长达 6 年的研究，认定化石为 35000 多年前的女性头骨化石，是目前已知的四川人最早的祖先，年龄在 50 岁左右，并命名为“资阳人”。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北方“北京猿人”的发现把中华民族的历史从黄帝炎帝的年代向前推进了几十万年。1957 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资阳人》，引起全世界轰动。

冯骥才：中国应确立一个国家文化遗产日

来自人民网消息：身为中国文联副主席的著名作家冯骥才，在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上提交一个有关确立遗产日的提案。

作为我国当代著名作家，冯骥才一直关注现代化冲击下的都市个性的存亡问题，包括文化的市场化、文化的传媒化、文化的趋同化以及纯文化的命运。十几年前，冯骥才就开始从一个作家的角度出发去关注传统文化，一手在抢救，一手在保护。令他感到欣慰的是，在他和其他有识之士的共同倡导和努力下，“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于 2003 年 2 月 18 日正式启动，这一工程还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这个工程是我国首次对民间文化进行国家级抢救、普查和整理，工程将耗时 10 年，已经建立了两个民间艺术专项抢救中心，一个是在北京的中国木版年画，一个是在河北蔚县的中国民间剪纸。同时，中国历史上第一部

《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正在加紧制定之中。

冯骥才认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也加速了外来文化的融入。这一次融入和历史上以往的融入不同，这次融入是以市场为背景的流行文化唱主角，这种传播符合市场规律，但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商品文化，并最终导致了在不是很长的时间里，国民精神迅速粗鄙化。流行文化像沙尘暴一样弥漫了整个中国社会，人们觉得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失去了魅力，从而失去对传统文化的信心和光荣感。因此，承载民族文化与情感的传统节日和民间艺术，不知不觉中已经淡出我们的生活，濒临消亡。“充满中国民间文化气息的春节本是民族凝聚力与亲和力的体现，而我们现在却不知道该如何去过了！如今节日没有了文化的载体，文化内涵变得越来越空泛，人们也就对节日失去兴趣了，所以商家把春节叫黄金周，让人们都去旅游。中国年文化的典型代表木版年画已由家家户户过年的必备之物，变成偏远村民或收藏者研究者之需。富有民族精神、民族情感、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在大量消亡，因为人们不关心它了。”

为此，冯骥才忧心忡忡，“我们正处在一个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时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我们的文化没有载体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人们对外来的东西觉得特新鲜，把原来的东西都扔掉了。现在很多少数民族的村寨都变成了洋楼，历史的记忆和传承都没有了。如果这样继续发展，十几年后，我们传统的东西就都没有了。”

冯骥才认为，中国民间文化就是中华民族情感的载体，是中国民族文化的一半，永远是民族文化的源头与根基。他感到遗憾的是，“文化遗产一旦消失将不可再生，而我们过去并没有好好地去认识它、保护它。”

从历史传承来看，民间文化分为物质的和非物质的。物质的文化比如长城、故宫等，要保护好比较容易。而非物质的文化，比如老艺人做的剪纸，他们的知识、情感、精神是靠口头、记忆来传承的。“无数的民间老艺人在无声无息地逝去。作为文化的携带者他们带走的是一种中国民间艺术的断绝！”冯骥才认为，应该有人去传承这些中国文化中最宝贵的民间艺术，留住中国文化的土壤。

随着农耕文化和农耕社会的逐渐消亡，很多优秀的民间文化遗产可能烟消云散。“我们对自己民间文化的家底并不清楚。历史上也没有做过摸底，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这么大一个根的文化，这么多元灿烂的文化，我们一无所知。我觉得通过我们所做的抢救性的普查，要把家底摸清。”去年，“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已经在15个省展开，并对其中重要的民间文化进行保护，今年该工程将在另外9个省市进行。冯骥才还和地方学校合作编写乡土教材，培养青年学生的民族文化情感。

冯骥才认为，“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遗产日。”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冯骥才放下了手中的笔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拯救民间文化的工作中，他甚至将自己积攒的几十万元的稿费都贡献出来用于拯救民间文化。他所进行的普查工作将构筑起一座中华民间文化的大厦：上千卷的《中国民俗志》、数百卷的《中国民间美术集成》以及民间分布地图集等。在今后的10年间，冯骥才还将计划把中国56个民族的民间艺术进行“地毯式”的登记、拍照、录像；出版2000多个民俗县集本；出版120卷中国民间美术全集；出版中国民俗民间艺术分布地图册；向联合国推荐一批文化遗产名单；命名一批文化艺术之乡……

冯骥才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投入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工作，组织多次大型文化抢救行动，对当代中国文化界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古籍图书展览在美举行

来自文通网消息：由全国古籍图书整理领导小组组织的中国古籍图书展览于3月12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蒙特利公园市长青书局举行，全国20多家出版社参与展览，共展出图书1300多册，其中不乏精品、珍品。当地出版界和广大业内人士对展览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蒙特利公园市市长弗朗西斯科阿朗索和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文化领事陈怀之及当地从事汉学研究的专家、学者100多人出席了开幕式。中国图书代表团团长、全国政协委员、文物出版社社长苏士澍简要介绍了建国以来中国古籍图书的整理出版情况。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古籍图书的整理出版工作，来宾们对此给予高度评价。这是中国首次在美举办古籍图书展览。

据悉，展览结束后，这批图书将分别捐赠给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当地大学图书馆。

广东历代书法展览在京举行

来自光明网消息：由广东省政协主办的“广东历代书法展览”日前在北京中国美术馆拉开帷幕。

此次展览展出规模大、征集范围广、学术性较强、岭南风格浓郁，共分为秦汉—宋元广东书法、明清广东书法、近现代广东书法、岭南丛帖及碑刻、广东书法研究等5个部分。展品包括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28家文博机构和粤、港、澳、台50多位收藏家的广东历代名家书法精品和青铜铭文、印玺、钱币文、陶文、碑刻、摩崖拓片以及汉晋文物、丛帖、学术著作等近800件，展品始于秦汉迄于近现代，时间跨度达2000多年。

“中国京剧艺术图片展”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开幕

来自文通网消息：为庆祝“国际三·八妇女节”，由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市政府、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馆及厄中友协联合主办的“中国京剧艺术图片展”于3月5日在基多市政大厅隆重开幕。该展览被列为“2004基多伊比利亚美洲首都文化年”活动项目。

展览由50幅全方位展示京剧艺术的靓丽照片组成，辅以精美的中国贝雕画和鲜艳夺目的大红灯笼，加上市政乐队欢快激昂的乐曲使展览现场充满了浓郁的节日气氛。市政大厅里挤满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基多市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几十位从外省特意赶来的厄中友协妇女会员。她们远道而来欢庆自己的节日，表达对中国文化的热烈向往，传递增进厄中友谊的美好心声。

开幕式上，基多市文化官员、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夫人及厄中友协妇女代表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该展览将于3月10日结束。

陕西：第八届全国书法篆刻展在西安开幕

来自央视国际消息：荟萃当今书法、篆刻精华的第八届全国书法篆刻展03月27日在陕西美术博物馆开幕。

入展的一千件作品，是从三万六千六百三十件投稿作品中精心评选出来的。本届展览评选

首次采取分书体评选方法，共评出篆书、行书、楷书、草书、隶书及篆刻获奖提名作品 100 件。入展作品“坚持传统、鼓励创新、风格多样”，艺术水准整体超过了往届，称得上是当今书法艺术最高水平的展览。

《世界文化遗产在中国》图片展在里斯本开幕

来自文通网消息：由中国驻葡萄牙使馆和葡萄牙文化部联合举办的《世界文化遗产在中国》图片展，3 月 4 日晚在里斯本“水之母博物馆”正式开幕。

中国驻葡萄牙使馆临时代办居华、文化参赞吕德胜等出席了开幕式酒会。图片展吸引了前来参加开幕式的葡萄牙政府官员和各界朋友，他们通过画面领略中国的自然景观和灿烂文化，赞扬中华民族为世界所作的贡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葡萄牙委员会主席在参观中称赞道：“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具有深奥的文化底蕴和神奇感，是中华民族智慧的写照”。葡原驻澳门总督和前陆军总参谋长称展览是增进中葡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的便捷方式。

葡华报、欧华报和葡萄牙媒体对展览进行了采访和报道。该展将持续到 3 月 20 日结束。



关于拍摄电影、电视有关文物的暂行规定

近年来，拍摄文物古迹电影、电视和使用文物古迹作为场景拍摄故事片、电视剧的现象日益增多，从而损坏文物古迹，损害国家权益的事件亦时有发生。为了确保文物古迹的安全，维护国家权益，特对利用文物古迹拍摄电影电视片的问题作如下规定：

一、关于拍摄故事片（电视剧等，下同）

1.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古建筑（包括古建筑、古墓葬、石窟寺和革命纪念建筑物等，下同），可以使用其室外作为拍摄场景，室内一律不得作为拍摄场景。
2. 省、自治区、直辖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以适当放宽。但有壁画、彩塑、悬塑、浮雕、雕龙柱、楠木殿（房）等重要文物的古建筑，不能提供作为拍摄内景。哪些古建筑可以提供作为拍摄内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具体决定。
3. 市、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尚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的提供问题，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按第2条所述原则决定。
4. 古建筑之屋顶，宫墙、院墙之墙脊，有壁画、雕刻之墙壁、走廊，以及保护范围内之古塔、古树、石碑、假山、雕刻物等附属文物，均不得作为演员格斗、攀登、跳跃、碰撞等的实景使用。亦不得因拍片而变动或损伤原物的色泽和形状。
5. 文博单位的馆藏藏品，一律不得提供作为拍摄电影、电视片的服装、道具使用。

二、关于拍摄纪录片（科教、风光片等，下同）：

1. 拍摄纪录片，一般不得移动原有文物的陈列位置；确须移动文物时，应征得管理文物的基层单位同意并由他们委派专业人员进行。

拍摄壁画、彩塑、书画、纺织品、漆器、彩绘等文物，不得使用强光灯。

三、审批权限：

1. 拍摄故事片，须一月前提出申请并提供分镜头剧本，列明使用某古建筑室外场地拍摄某场戏，由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部门审批。北京故宫由文化部文物局审批。
2. 拍摄纪录片，须一个月前提出申请并提供分镜头剧本。申请须开列拍摄文物的具体项目、镜头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中央直属博物馆，由文化部文物局审批；省、自治区、直辖市、及以下文物保护单位和博物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部门审批。
3. 国内单位要求拍摄考古发掘现场，由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部门审批。
4. 有外国人、华侨、港澳台同胞参加的摄制组去非开放地区拍摄的，应先征得外事、公安、军事部门同意后，始得向文物部门提出申请。

四、拍摄单位在开拍前，应向文物管理的基层单位交验授权单位批准的函件并与基层单位签订保护文物的协议书，由基层单位安排拍摄时间。在保证文物不受损坏的前提下，基层单位应积极协助拍摄单位做好拍摄工作。不交验授权单位批准函件的，基层单位有权拒绝拍摄。

五、拍摄过程中，拍摄单位负责消防、安全等方面的工作人员必须严守工作岗位防止发生意

义；文物基层单位应指派本单位工作人员在场监督，以确保协议的执行和文物的安全。

六、文物基层单位如发现拍摄单位有超出批准项目或不遵守协议书的行为，有权制止继续拍摄。

七、不论拍摄那种类型的文物片，拍摄单位应向管理文物的基层单位支付文物保养费；对协助拍摄的文物基层单位工作人员，应支付劳务费；为拍片影响观众参观造成文物基层单位减少收入的，应支付补偿费。支付费用的标准应适当，由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部门制订（北京故宫由故宫博物院制订）。

八、凡违反本规定有关条款进行拍摄者，文物基层单位可给予没收胶片、罚款等处分，对文物有损伤者，要追究摄制组负责人和直接责任者的法律责任。文物工作者徇私造成违反本规定有关条款进行拍摄和对文物有损伤者，从重处理。

九、本规定适用于国内和中外（包括港、台、澳）合作拍片，过去颁发的有关拍摄文物电影、电视的规定同时废止。

关于使用文物古迹拍摄电影、电视故事片的暂行规定

近年来，国内、香港以及外国一些电影、电视厂，在单独或联合拍摄电影、电视故事片中，使用文物古建筑作为场景，使用馆藏文物作为服装、道具的现象日益增多，从而损坏文物古迹的事件不断发生。为了确保文物古迹的安全，又为一些摄制单位提供可资使用的文物古迹场景，特作如下规定：

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古建筑（包括古建筑、古墓葬、石窟寺和革命纪念建筑物等，下同），可以使用其室外作为拍摄电影、电视故事片场景，室内一律不得作为拍摄场景。

二、省、自治区、直辖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以适当放宽。但有壁画、彩塑、悬塑、浮雕、雕龙柱、楠木殿（房）等重要文物的古建筑，不能提供作为拍摄内景。具体哪些古建筑可以提供作为拍摄内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部门决定。

三、市、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内定尚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的提供问题，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部门按第二条所述原则决定。

四、古建筑之屋，宫墙、院墙之墙脊，有壁画、雕刻之墙壁、走廊，以及保护范围内之古塔、古树、石碑、假山、雕刻物等附属文物，均不得作为演员格斗、攀登、跳跃、碰撞等的实景使用。

五、文博单位的馆藏藏品，一律不得提供作为拍摄电影、电视片的服装、道具使用。

六、拍摄单位要求使用文物古建筑的，须事先提出申请并提供分镜头剧本，列明使用某古建筑场地拍摄某场戏，由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部门审核批准。有外国人、华侨、港澳同胞参加的摄制组去非开放地区拍摄的，应先征得外事、公安、军事部门同意后，始得向文物部门提出申请。

七、拍摄单位在开拍前，应向管理古建筑的保管所（或相应机构，下同）交验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部门的批准函件并与保管所签订保护文物的协议书，由保管所安排拍摄时间。在保证文物不受损坏的前提下，保管所应积极协助拍摄单位作好拍摄工作。不能交验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部门批准函件的，保管所有权拒绝提供拍摄场地。

八、拍摄过程中，保管所应指派本所工作人员在场陪同，以确保文物古建的安全。如发现拍摄单位有超出批准项目或不遵守协议书的行为，保管所有权制止其拍摄活动。

九、拍摄单位使用文物古建筑拍摄电影、电视故事片应向保管所支付文物保养费；对协助拍

摄的保管所工作人员，应支付劳务费；为拍片影响观众参观造成保管所减少收入的，应支付补偿费。支付费用的标准由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部门制订，报文化部文物局备案。

关于拍摄文物的几项暂行规定

为了有利于国内研究出版工作和对外宣传，开展国际文化交流，发展旅游事业，保护文物安全和我国出版权益，特对拍摄文物提出几项暂行规定如下：

一、国内宣传、出版、研究或教学单位因工作需要，拍摄文物保护单位和博物馆的陈列品，应予协助、支持、不收费。但从陈列室或库房提出文物拍摄，应从严掌握。对盈利单位可酌情收取劳务费。易损的珍贵文物，尽可能由文物部门提供照片，收取成本费。

拍摄未公开发表的一级品应经省以上文物主管部门审批。

国内宣传、出版、研究、教学单位在文物部门拍摄的文物照片或由文物部门提供的文物照片，一般不得转交国外使用，如因特殊需要，必须转交国外使用时，应事先征得原文物单位的同意。

二、公开开放的文物保护单位和博物馆的陈列品，原则上允许国内外观众拍摄，不收费。但不准全面系统的拍摄，也不准将文物从陈列柜中提出拍摄。少数不宜拍摄的珍贵文物，应树立“请勿照相”的标志。

经有关单位批准去非开放地区和考古发掘现场参观的外宾，如需拍摄文物，应经国家文物局批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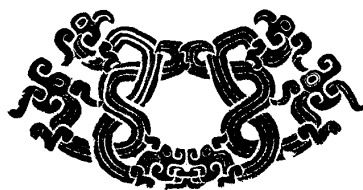
三、拍摄易损的文物（如：壁画、彩塑、书画、纺织品、漆器等）一律禁止使用强光灯，并应切实遵守保护文物的有关规定。

四、凡国外出版机构或我与国外合作出版的单位，如需拍摄文物，应事先将拍摄文物计划（包括拍摄文物范围、项目、数量）以及权益分配办法送国家文物局，审核同意后才可拍摄。

国外要求拍摄文物专题电影或电视，应由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或中央电视台提出拍摄计划（包括拍摄文物的范围、项目、数量）以及权益分配办法，经国家文物局会签，报国务院批准后才可拍摄。

五、西藏、新疆和敦煌的情况特殊，拍摄文物办法由西藏、新疆自治区文化局、甘肃省文化局参照以上原则提出意见，报国家文物局批准后实行。

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
一九八一年四月八日



首都博物馆 2004 年 3 月动态

3 月 1 日起, 依据 2004 年首都博物馆新馆展陈大纲的要求, 我馆征集部开始走访了局系统 13 个单位, 各单位都表示支持首都博物馆新馆展陈工作, 同意在下周内对借展(调拨)文物给予文字形式的回复。我们以电话形式联系了西藏布达拉宫、萨迦寺两个单位, 这两个单位表示支持, 希望我馆依据有关规定, 逐级上报给国家文物局、国家民委, 我馆正在拟定申请, 上报北京市文物局。

3 月 2 日, 我馆崔学谕常务副馆长、高凯军副馆长等一行 7 人与英国贸工部贸易投资总署文物部门负责人率领的文化访问团, 就北京博物馆建设动态、双方合作的可能及方向等问题进行了座谈。

3 月 3 日, 艺术博物馆来我馆资料信息研究中心交流文物图片管理工作的相关经验。

3 月 4 日, 我馆邀请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有关专家、学者, 就《北京通史》展览中北京史与世界史对应展示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研讨。与会专家、学者从展示原则到具体展示内容都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本周内我馆接受了北京奥组委移交的有关文物三箱, 清点、造册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月 11 日, 我馆邀请专家彭小瑜、许平就“北京通史与世界史对应展示问题”进行了讨论, 与会专家在会上提出了具体的对比方案和比较点, 为下一步的深化工作打下基础。

3 月 8 日—13 日, 由广州大学、瑞士爱玲珑公司、丹麦飞思公司、瑞士格林达公司、惠普公司联合举办的“数字摄影摄影师提高培训班”在广州大学开课, 我馆派出 3 名摄影师参加了此次培训, 主要对专业数码后背到色彩管理从系统理论到硬件操作都进行了系统的培训。

3 月 11 日—13 日, 我馆一行 4 人赴上海进行考察, 考察了上海博物馆信息化建设以及上海博物馆对外开放和社教工作。

3 月 16 日, 由北京市对外友协欧美处谢正女士陪同荷兰籍华人黄敦品先生来我馆商谈推荐荷兰莱顿市古代收藏博物馆《古埃及木乃伊及出土文物展》, 我馆王武钰副馆长及相关人员进行了接待。

3 月 18—19 日, 为提高干部职工的安全意识、培训对突发事件处置能力, 进一步落实市文物局搞好“安全月”工作的各项指示, 我馆举办了安全员培训班, 由消防中心教官进行授课, 参加人员有: 安理副馆长和 16 名安全员。19 日, 又组织安全员熟悉首博突发事件预案并进行演练。

3 月 19 日, 为筹建安阳市博物馆, 安阳市人大副主任、筹建处主任杨学法一行 12 人特来我馆考察、交流博物馆展陈经验, 高凯军副馆长等有关人员热情接待了客人并进行了有益交流。

3 月 21 日, 北京收藏家协会将召开“第一届第一次会员大会”, 200 余位收藏家和文化界、博物馆界代表, 以及国家文物局、市文物局等有关方面领导将出席。会上王金鲁会长将介绍北京收藏家协会的来历、韩永副会长宣布北京收藏家协会组织机构、祁庆国秘书长宣读北京收藏家协会章程等等。